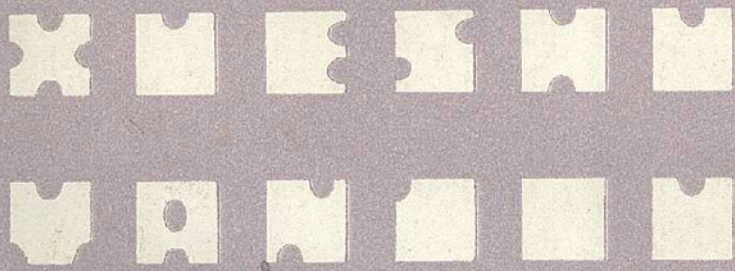


学术
研究



学术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目 录

社会主义 辩证法	5 9	开拓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的新领域……《学术研究》 《现代哲学》评论员 论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 ……………张江明
精神文明 建设	16 18 25 30	改革、开放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座谈纪要) 浅议我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几个问题……石成桂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范英 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价值……丁长青
新兴科学	35	浅论新兴科学的含义与特点……张尚仁
有计划 商品经济	39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与蔡馥生同志商榷……杨永华
经济体制 改革	45 50 57	我国财政——银行体制改革初探……郑炎潮 略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关其学 关于初级产品价格改革与加工企业消化能力问题……赖智勇
经济特区 研究	61	珠海特区建设的实践和认识……方苞
华侨史	69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华侨为何聚资于房地产……李杨
广东 地方史	74 79	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沙东迅 明代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蒋祖缘

史学论文 选登	84	试析蔡牵集团的成份及其反清斗争实质	叶志如
教 育	90	把成人教育纳入企业经济发展的轨道 ——佛山市成人教育调查报告	柯峤文
港台文学	95 100	旅美作家李黎及其小说的现实主义思想	方风雷 张硕城
		余光中乡愁诗的民族意识感断议	刘学工
古代文学	105 110	有无之辨与自然雕饰之争 ——魏晋南北朝两种审美情趣的玄学根源	袁济喜
		论东晋的山水诗	李文初
综 述	115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史 能
新书评介	119	一部有新见的外贸史论著 ——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袁耀文
书海酌蠡	84 109 89 17	顾见山小考	官大梁
		荆蛮浅释	李 默
		释“以妥以侑”	刘运兴
		释“干戈戚扬”	刘运兴
学术动态	122 128 124 60 88	广东税务学会召开税收理论座谈会 广东图书馆学会召开图书馆改革专题讨论会 我国首次社会学国际会议论点综述 我省《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西南军阀史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封面设计			王造星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 1, 1986)

CONTENTS

Open Up a New Field for the Study of "Dialectics in Socialist Society"By Reviewers of the <i>Academic Research</i> and the <i>Modern philosophy</i>	(5)
On the Research Object, Content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Dialectics in Socialist Society"	Zhang Jiangming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annels for Business Connections with Foreign Counties" and "the Building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ummary of a panel discussion)	(16)
A Cursory Discussion on a Few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i Cheng and Gui Quan (18)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Building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China's Countryside	Fan Ying (25)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the Value of Its Products.....	Ding Changqing (30)
Some Superficial Views on the Impl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and Developing Sciences	Zhang Shangren (35)
How to Understand Commodity Economy in Socialist Society --- A discussion with Comrade Cai Fusheng.....	Yang Yonghua (39)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Reform in the Financial-Banking System of China.....	Zheng Yanchao (45)
Some Cursory Remarks on the Reform in the System of Foreign Trade	Guan Qixue (50)

A Problem Concerning the "Primary Products Price Reform" and the Offsetting Power of Processing Enterprises	Lai Zhiyong (57)
The Practice i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uhai Special Economic Zone.....	Fang Bao (61)
The Reason Why during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Overseas Chinese at Guangzhon Made Their Investments Mostly in House and Landed Properties.....	Li Yang (69)
Contributions Actually Made by Chen Jitang during His Eight Years' Administration in Guangdong	Sha Dongxun (74)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Such Pro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Jiang Zuyuan (79)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Armed Bloc Headed by Cai Qian and Its "Anti-Qing Government" Essence.....	Ye Zhiru (84)
Bringing Adult Education into the Orbi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adult education in Foshan	Ke Qiaowen (90)
Li Li ---An Overseas Chinese Writer (now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alist Thinking as Revealed in Her Novels	Fang Fenglei and Zhang Shuocheng (95)
Comments on Yu Guangzhong'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Shown in His "Poems of Homesickness".....	Liu Xuegong (100)
"Sensuous Enjoyment" versus "the Natural Way", and the Dispute between "Naturalness" and "Ornateness".....	Yuan Jixi (105)
On "Landscape Poems"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Li Wenchu (110)
The Latest Attainments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Shi Neng (115)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A New Ingenious Book o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Trade --- A review of the book <i>A History of Foreign Trade in Ancient China</i>	Yuan Yaowen (119)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Recent Academic Trends

开拓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的新领域

《学术研究》评论员
《现代哲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推动下，广东哲学界解放思想，联系实际，逐步开展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日益得到全国哲学界不少同志的关注和重视。1983年11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和广东哲学学会等单位在广东省东莞县，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的学术讨论会。1985年4月，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省社联、哲学学会和广东省社联、哲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检阅了社会主义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成果，交流了有关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而且把这一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近几年来，广东哲学界在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提交有关会议讨论的学术论文近二百篇，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有七、八十篇。另外，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的译作和学术动态。先后出版的全国第一、二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也共收入广东的科研论文二十余篇。此外，还开始出版有关著作。其中，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江明著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将出版的由高齐云、刘景泉主编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概论》，广东省高教出版社将出版的由高齐云、张庆主编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概述》等。还有一批有关专著也正在出版或撰写中。

从内容上看，广东哲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探索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一般理论。

社会主义辩证法是一般辩证法、特别是历史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形态。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同时又应该探讨一般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形态和表现特点。广东哲学界率先从这方面开始研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问题，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作用。此外，还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等问题。并结合对实践提供的新经验进行了概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也是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指导方针。许多同志遵循这一方针，着重探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也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变化问题，关于当前新的发展时期中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特点，等等。这些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有的同志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问题、新鲜经验的研究，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的探索结合起来，力图从整体上揭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结构和变化的体系。他们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存在条件，矛盾的性质及其制约因素和辨定方法，矛盾的分类和矛盾的体系，矛盾变化的形态、过程、特点和趋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新见解。

第二，研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法。

全面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实践，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全面的深刻的变动。正确地认识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引起的变化，并且从哲学上加以科学的说明，这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东哲学界的同志们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

首先，运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则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观点，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哲学的论证。其次，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搞活的辩证关系，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性质、特点以及改革的方法论，还有改革者的哲学等问题。再次，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实际矛盾及其辩证发展等问题。诸如，社会主义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特点和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的规律系统及其运动机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关系，以及特区经济建设的辩证法和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性等。这些研究不仅有利于阐明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一般理论，而且对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逐步注意探讨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在奔腾向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又是一个新的机遇。近三年来，广东哲学界一部分同志逐步注意探讨新的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吸收和应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所包含的一般方法论的观点，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矛盾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机制等，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探讨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影

响和作用，诸如，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人们的观念、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系统的结构、运动和功能的影响等。这些探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四，把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同对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同样，要在社会主义辩证法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创新，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并且做到善于在新的条件下抛弃那些过时的结论，坚持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用新的思想去丰富、发展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宝库。在这方面，广东哲学界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通过考察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历史，不仅初步明确了历史上的得失，而且概括出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这对于当前的新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的作用和意义。

以上的概括只是近几年来广东哲学界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成果，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相比较，同建设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学科的要求相比较，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大力开展和逐步深入对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的理论任务。我们应该从下述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在指导思想，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双百”方针和学术民主。在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上，人们思想上还存在不少禁区，其中有的禁区是由我们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造成的。其一，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统统当作不可变动的“终极真理”，不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予以改正、丰富和发展，而是要求社会主义的新现实新发展去适应已有的现成结论。其二，把哲学教科书阐述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系当作理论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去剪裁社会主义社会的丰富而又复杂的现实和建设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学科体系，并且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其三，把学术问题上的不同争论，简单地提高到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歧之争，甚至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争，使不同的理论见解难以提出或难以展开争鸣。其四，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是极少数的“个别天才人物”的事，普通的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只能为现有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的证明，从而大大的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可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调动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必须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对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结构和运动进行多方面的整体性的研究，力求完整地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活的机体，经济是这个机体的结构的主干和变化的基础。我国正在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社会主义

义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和迅速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因此，对社会主义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必须紧紧地抓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急需广大的理论工作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稳定、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多样性和系统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量和质的辩证关系的问题，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中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步骤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方面、环节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等等。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活的机体，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剖析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动，而且要揭示这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的机构和变化，社会的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的结构和变化，以及它们同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动的相互关系，即要对社会主义社会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整体性研究。根据以往研究中的不足，特别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人）的探讨。诸如，社会主义社会主体中的个体、群体、总体的相互关系，主体的心理、观念、理想、智力和知识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主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演变，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同群体、总体的进步与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的问题，等等。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运动和整体性的研究，在于完整地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停止在现象的罗列，满足于经验的解说。必须从现象揭示出本质，从经验上升到理论，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性。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通过成功和失败的多次比较，我们对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已经开始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但是，我们对有些规律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入，我们对某些规律甚至没有认识，我们还未能完整地把握社会主义的规律系统。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和规律系统，正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重要任务。

在研究方法上，必须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要求，提倡多样性和多元性。研究的方法是被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任务规定的，适应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要求的研究方法就是正确的研究方法。社会主义社会是多要素、多侧面、多层次、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的动态结构，它的研究方法当然应该是多样的和多元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辩证法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和定量的方法，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方法等等，我们必须运用一切科学的方法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服务。我们要特别重视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积极成果，应用于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我们深信，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也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论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

对象、内容和方法

张江明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便共同探讨。

一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科学

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上，有两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有一种看法，不仅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一门科学，而且连这个概念本身也看作不科学，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只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因而不承认它的科学性。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概念是科学的哲学概念，因为它有科学依据。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思想虽然早已蕴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之中，但作为哲学概念是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提出来的。这门新兴科学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来的，担负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及其辩证规律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和经验的总结，随着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必然更丰富，必将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辩证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需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善、不全面到比较完善和成熟的逐步发展过程。当前，我们仍然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者准确点说，是在过程的起步，距离过程的最终目标还很遥远，很需要共同努力，开展研究，使这门新兴科学一步步地完善起来。

列宁曾经指出，有一般形态的辩证法，也有特殊形态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一般形态的辩证法，它的基本原理是普遍地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领域的。而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等等，属于特殊形态辩证法。它们是一般形态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列宁还说过：“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即是说，资本主义社会辩证法是特殊形态的辩证法。所以，在

哲学上既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而且还有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存在和发展。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中，有基础理论经济学，又有部门经济学，如商业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财政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等等。同样，哲学也是如此的，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当然，它比部门更为宽广。

还有一种看法，无限夸大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适用范围和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辩证法是“辩证法原理最完备的、包罗万象的表现”，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不完备的。这种看法也是不恰当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是从总结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辩证发展而提出来，包括人类历史中各个社会形态，如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也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作了科学预见。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原理是很完备的，也是“包罗万象”的。当然，还有不够之处，仍须发展，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备，包罗的面会更广，并将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是这门新兴科学日趋成熟的表现。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又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现代科学发展有一个特点，在两门或几门科学之间形成了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中间科学、边缘科学，或在几门不同科学之间形成了将其综合起来的综合性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所要研究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应用，而且对特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综合的、立体的、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找出它的内在辩证发展规律，因此，相对于只研究某一类社会现象的学科来说，它是综合性的科学，需要在各方面、各部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目前无论就其体系结构上，理论形态上，认识深度上，探讨途径上，还不完备，也不成熟，正如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或象一个要从“七通一平”搞起的开发区。它的前景是动人的，放射着希望之光的，而它的道路是崎岖的，要有马克思所说“下地狱”的精神，进行刻苦的研究、调查、探索，才能攀登上理论高峰。

要开展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还应掌握它的特点，才能取得更大效果。它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时代感、现实感鲜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从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在它里面，必须听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音响，感到时代的脉搏，同现实有血肉联系。如果同社会主义时代保持距离，脱离实际，成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这就没有时代气息，缺乏生命力。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首要特点在于有更其鲜明的时代感、现实感，应该努力把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精华概括起来，努力成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活的灵魂之一，把人民中最珍贵的精髓集中起来，融化到社会主义辩证法之中。

开拓性、创造性突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找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现成的完备的答案，只能提供精神武器和认识工具。它要求人们具有很突出的大无畏的开拓性、创造性精神，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坚持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导下，敢于言前人之所未言，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对于哲学工作者来说，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这个研究领域是有待人们进一步来开垦、创造、建设的新天地。在创立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中，哲学上的一些观点、概念、范畴、提法会有发展和更新。但是，这个“新”，并不是“闭门造车”所能达到的，它必须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土壤，以群众实践中来，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的新观点、新理论，才是真正的创新。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这门新兴科学，是一个开拓性、创造的工程，它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哲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长期努力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应用性、实践性强烈。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与实践和应用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也更强烈。我们固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理论，同时要着重于从应用中、实践中探讨和丰富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及其体系，使之逐步完善。如果它不能应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只有在实践中、应用中，才能显示具有强大生命力，才能茁壮成长。

二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为了在实践中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理论，很有必要对它本身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

有同志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不然，无从确定它的研究对象，也无从着手开展研究。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呢？可不可以这样简单地说：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辩证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运用和丰富。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任何人都不能把主观臆造的规律、范畴强加给社会存在，硬套到客观现实中来，只能从社会存在中引出客观规律。正如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本身一样，它的定义也有个逐步完善过程。

从这个简单定义中可以看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普遍地适用于各个社会形态，无一例外的，但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即特殊性；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外，另一种不同性质的辩证法，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和发展；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统一起来，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机的

组成部分，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在研究对象方面，从总的来看，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既一致，又有区别，它的范围没有那样宽广，但也有特定对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统一的新特点，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如何经过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而不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教育、军事等方面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从不发达到发达、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矛盾变化及其辩证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提供辩证的论证和哲学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新型社会矛盾，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但由于旧社会的残余还存在，国际上的帝国主义还存在，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还长期存在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以矛盾为发展动力，而同一性的作用日益增强。由于矛盾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量变、质变两种状态，通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新质因素的逐渐成长和旧质因素消亡的途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也有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经过自我否定、自我完善、自我改革，螺旋式、波浪式地向上发展的。这都是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一些新特点，需要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来研究的。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内容比较宽广，既有中心，又包括各个有关方面，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主要是：

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按照辩证法而产生，又是按照辩证法向前发展的。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就有可能出现僵化停滞或急躁冒进的现象。因此，必须充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从始到终的辩证发展过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及这些阶段中的矛盾变化和辩证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及其辩证规律。这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首要内容。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以及改革和建设的辩证关系。这两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必须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有一个很长的辩证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的革命，以便克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因素，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改革来进行，所以，社会主义改革是又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体制改革有局部改革，也有全面改革。要真正搞好改革，必须正确认识、掌握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辩证法。这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全面性的概念，从经济到政

治和思想文化，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社会生产到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都包括在里面；它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而集中的则是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既要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主要矛盾，又要照顾次要矛盾，结合解决其他矛盾，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关系，等等，它们是有矛盾，又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应用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来分析和处理这些辩证关系，就能使中心和一般相结合，相得益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前进。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学、军事等领域的辩证探讨。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要着重研究经济建设方面的辩证关系，还要广泛地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科学教育、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辩证探讨，寻求它们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动力，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按照“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领导体制和干部体制，使人民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又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的关系、人的素质、创造能力、主人翁精神及其全面发展的关系，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课题。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思考。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要从哲学上进行探讨，尤其是掌握矛盾问题的精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借鉴、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相结合，总之，从辩证法上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着重于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特点。这是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理论研究得深，功底厚，才能运用自如，但不能以此为满足，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为指导，花气力，用功夫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问题，力求取得有突破性的成果，这才是目的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范围还长期存在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比较完全比较成熟的形态展现在人们眼前。正如马克思所说：“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页）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统一，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都是有新特点的。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工作需要上都迫切要求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

作充分研究，回答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事业大有裨益的。

三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意义和方法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可以加强哲学和实际工作的联系，尤其是和我国的最大实际——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更好地贯彻哲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可以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上来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证方向、道路的正确；可以弄清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辩证发展规律，领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改革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过自我否定、自我改革而实现；掌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可以从思想理论上引导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上升到哲学上来，可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呢？

第一，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贯彻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必须实事求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能把科学理论变成僵化的教条，用来剪裁现实生活。应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规律，经历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贯彻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是矛盾分析方法。要从矛盾的产生、发展、运动和解决中来剖析社会的有机体，找出矛盾的发展规律。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首先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还要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及当代世界的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放到当代世界矛盾总体中进行研究，以认清矛盾的结构、层次、地位、功能和内外关系，作出正确处理。

第二，坚持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力求做到多视角、多沟道、全方位地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活的有机体。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研究的探索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方法多样化。只要是科学方法，有助于深入研究，都可采用。所以，应该多视角进行研究，全方位地应用各种方法，不要把某种方法看成是唯一的、排他的。我们的目标是一个，而达到目标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例如，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析和现实生活矛盾出发的方法；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范畴进行研究的方法；《矛盾论》的方法；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以及吸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可以相比较而存在，也可以互相渗透。当然，各种方法都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经过综合各家所长，择优采用，使科学方法更完善。我们要吸取“新三论”的方法，但是不能简单照搬，更不能用“新三论”来代替或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各门学科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

第三，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用比较法进行研究。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没有现成答案，这就靠深入调查研究，以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基础，作出哲学概括。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晶。离开了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这门科学。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是否研究得好的关键，也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最重要方法。在进行经验总结时，可以采取比较法：一是不同社会的历史比较，即各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比较，从中吸取教训，继续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同一性质社会的历史比较，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作历史比较，以便认清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找出辩证发展规律，作出哲学论证。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重要来源。当然，在运用比较法时，应防止简单类比。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也是比较法的活的灵魂。

第四，从历史进程中把握时代精神，开辟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的广阔领域。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努力从历史的进程中掌握时代精神，倾听时代的呼声，追踪实践的足迹，以强烈的进取精神广泛地开展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各种辩证关系的研究，力求有新的突破。当前研究的内容，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为重点，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稳步前进。研究的系统要开放，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不断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吸取科学因素。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作为历史进程的理论表现之一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逐步地开拓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要建立社会主义辩证法同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自然科学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联盟，进一步扩大视野，互相促进，使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获得更大成果。

1979年12月初稿

1985年11月大修改



改革、开放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座谈纪要）

如何认识在改革与开放条件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这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围绕这一重大课题，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社联于最近邀请了省内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座谈。广东省委副书记谢非同志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与同志们一起共同探讨有关问题。

一、必须正确估计和评价改革与开放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与开放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什么作用，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这是与会者首先触及到的议题。普遍认为，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改革和开放，就一定能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不是利少弊多，而是利多弊少，必须充分肯定。有的同志指出，广东在执行改革与开放政策方面，主流是好的。广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在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展的。与会者认为，广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当然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执行了改革与开放政策造成的，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有些问题就是不改革、不开放它也在存在着；有些问题是由于理解和执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不力所致，需要时间和实践不断纠正；有些是开放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一些消极因素。重视和消除开放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是十分必要的，广东也正在努力纠正这些东西。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分析利弊关系，才能恰如其份地估计和评价改革与开放对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作用。

二、必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总体概念进行全面的认识，才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座谈会上，同志们根据当前存在的问题，认为有必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来一个再认识，这样可以防止片面性，有利于把广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好。党的十二大文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其中的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文化建设也应当包括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群众娱乐活动，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一切文化建设都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发展。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建设，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与会的同志指出，党的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规定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方面的内涵，是非常正确、全面的。但是，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由于对它的认识与理解不同，就很容易使一些人产生片面的看法：要么只重视文化建设而不重视思想建设，要么只重视思想建设而不重视文化建设；或者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仅仅是党风的建设，或是别的一种具体东西的建设。这种狭窄的理解，不利于全面、正确地贯彻十二大有关精神，是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否则，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抓不住全局的东西。有的同志认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再认识，必然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什么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些基本的概

念。要划清楚它们的界限。不然就会造成混乱，甚至可能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或者倒过来，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却看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还是一个较新的东西，对它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必须重视改革与开放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与会者一致认为，随着改革与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也会相对复杂起来，这就要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扎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尤其是我们广东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身处开放的前沿阵地，更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自觉、

深入地展开学术讨论，下决心搞出研究成果来。在这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亟待研究的课题，如：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对外来思想的抵制与吸取的关系；发扬传统与克服旧观念的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为国家、为集体和为个人的关系；按劳分配与按酬付劳的关系；商品生产与“一切向钱看”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新时期与新观念的关系；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反“左”与反右的关系；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层次与低层次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必须发动广大理论工作者进行讨论，通过争鸣才能逐步搞清楚。与会者还认为，要搞好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有全盘的战略规划，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投资和队伍的建设等。

（哲讯）



释“干戈戚扬”

刘运兴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传》曰：“戚，斧也；扬，钺也”，训戚、扬为兵器。今案“弓矢斯张”与“干戈戚扬”相对为文，弓矢、干戈之为兵器，其义不言自明。“斯张”非兵器，则与其相对之“戚扬”亦不得训为兵器。戚当读为越，二字古通用。《国语·齐语》有“宁戚”，《淮南子·道应》作“宁越”。《说文·戊部》：“戚，戊也。”《后汉书·崔寔传》注：“戚，钺也。”皆其例证。越字通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集注云：“粤，古越字”，是其证。《汉书·翟方进传》“粤其闻日”，注曰：“粤，发语词也”。戚即粤之借字，与斯相对，同为句中虚词。扬，举也，与张并为动词。“干戈戚扬”，“干戈粤举”也。二句之义，即张弓矢、举干戈是也。

“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传》训溇为大，《笺》释溇为广，皆不以百泉、溇原为一地专有之名称。案古有以“某原”为地名者，如《大雅·皇矣》“度其鲜原”，毛、郑亦不以鲜原为一地专名，然《逸周书·和寤》云“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此鲜原显即《皇矣》之鲜原，从而可知鲜原乃一地专名。又案《克鼎》云“锡女田于隰原”，隰原即《公刘》之溇原。锡田必有固定范围，则溇原必为一地专名即毋庸置疑。百泉与溇原相对，亦应为一地之专名。

浅议我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几个问题

石 成 桂 全

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深入，我省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阶段，与之相适应，我省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也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转折点上。社会文化，从广义上说，它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则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即精神文明状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党的十二大文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区分为共产主义思想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两个层次，而且，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基础，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往往也被单独区别出来，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发展研究，只是指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教育等主导或基础部门之外的其余的精神文化生产部门及其活动，如文化艺术、图书、博物、出版、娱乐等。这仅是就目前的研究对象而言，并不代表社会文化的严格定义。

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总是受三个基本的社会因素制约的，一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三是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作为特定的区域文化发展，还有特定的区域制约因素，如所属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总体状况，该区域历史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风气习惯等。综合地把握上述各种制约因素，对我省文化发展的现状、方向和具体构想进行系统的考察，是研究我省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这里，我们仅就我省文化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谈点十分粗略的看法。

（一）目前我省文化发展现状的基本估计

广东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经济体制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对外开放和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繁荣，这点争议不大。然而，对外开放和改革给广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带来了什么？是促进还是促退？争议颇多。不对此作出正确的估计，就无法明确广东文化发展的方向，提出今后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

经过调查，我们认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文化发展的情况和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已经结束了“左”倾错误造成的文化萧条状态，并正在走向全面繁荣。文化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精神文化生产力。在文化建

设的物质基础上看，随着社会生产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不仅原有的剧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新闻出版机构以及许多公共文化娱乐场所、设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整顿，而且，出现了大量全新的现代化的文化部门和场所设施。据统计，1984年全省电影院有604个，比1978年的265个增加了640%；1984年全省公共图书馆114个，比1978年的76个增加了50%；1984年全省博物馆87个，比1978年的80个增加了190%；电视中心台1978年是一个，1984年已有6个。此外，大批音乐茶座、舞厅、游乐场、文化宫(室)、桌球室、文艺辅导站(培训站)、文化服务公司涌现，近年来共新增不下500余处。目前我省城乡的影视播放点也已发展到8,520个。在新闻、出版、书刊发行方面，1980年全省发行报纸4.8亿份，1984年增至16.35亿份；1980年全省出版发行各类杂志4,988万份，1984年增至11,005万份；1980年全省发行图书1.68亿册，1984年增至3.58亿册。国家在文化事业方面的投资(不包括科技、教育、卫生、体育以及文化基建投资)，1984年全省是4,149万元，比1983年增长28%左右。至于文化种类、形式的丰富，更是不论“文革”期间还是十七年期间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文化发展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1980年以来，我省内外文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近三十批文化艺术团体和数百人次的文化人士到港澳及国外访问、演出，每年也均有十余批外国及港澳演出团体应邀来访。在引进外资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外资是用于文化娱乐建设，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我省新增大型现代游乐场约15个，其中大多数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而用外资兴建的。由于现代通讯等传输工具的较大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繁荣，我省近几年来在文化观念、文化消费方式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更新。据广州市统计，广州市居民1984年的生活费用支出与1983年相比，物质消费支出增长了8.88%，而精神文化消费支出增长了65.98%。1981年到1983年，广州市居民的货币总支出增长了28.72%，年平均递增速度是13.45%，而文化生活的货币支出增长了89.98%，年平均递增速度是18.29%，远远高于整个消费增长率。1984年第一季度与1983年同期相比，广州市居民生活费支出增长10.79%，而文娱、书报费支出增长了58.04%。这在我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目前，居民文化消费高于物质消费急剧增长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第三，在文化发展的结构层次上，由政府独家经营的单一型文化转向“社会办文化”的多层次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一齐上的文化经营结构，据佛山市统计，市政府几年来投放于文化事业的资金是1,700余万元，而1983年以来该市社会集资的文化事业投资达1,800余万元，二者之比几乎是1:1。而且，集体、企业、个人的文化经营发展势头比国家方面发展更为明显，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目前我省各宾馆、企业注册经营的轻音乐队有89支1,234人。文化专业户大批涌现，全省大中城市里以书报租售为主的专业户就有500多户，仅韶关市个体租书摊档每天平均拥有读者就约8,000人次，为该市图书馆读者的十五倍。广州市新发展的文化业个体户856个。全省农村自办电影放映专业户623个，向区乡承包电影队的有1,067个。随之而来的，是

文化发展由纯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许多文化单位开始创收赢利，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以文养文，但也必然带来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同样，这种文化发展趋势，必然造成中低层次的大众娱乐型文化高速发展，而高层次文化发展相对较慢。

第四，文化设施、工具、手段的现代化，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靠拢，社会文化风气也明显改变。许多现代的文化技术如广播电视技术、音响技术、激光技术、自动舞台设备等为文化的丰富多彩提供了可能，也为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强有力手段。目前，我省电视有三个频道，播出总时间达21小时，人口复盖率达75%左右，电视节目的丰富多彩居全国之冠，中等以上城市正开始向彩色电视化发展，新的电视中心一期工程开始动工。广播增了立体声节目，全日6套节目共播出84小时左右，城乡广播复盖率达70%左右。录相、电影也有发展，一些传统的戏剧在种类和节目上也较文革时期大大发展。珠江电影厂近年来生产能力有较大提高，接连拍出了许多较好片子。深圳也成立了电影制片公司。我省录音事业是全国发展最快的，除各大学的教学录音录相生产点之外，社会上的音像生产公司全省已有4个，大中等城市录音机复盖率高达70%以上。

以上只是我省文化近几年发展的一些主要的特点，它充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改革与开放，使我省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对我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目前我省文化建设的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繁荣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在我省占主导地位。由于坚持了“排污不排外”的方针，注意了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因素的抵制，注意了对群众文化消费的引导和教育，注意了文化经营活动中的管理，广东文化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即使是在几个经济特区，经过多次的整顿和各种法规手段的完善，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健康的。这个基本的估计是有根有据的，不可动摇的。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首先，与日益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广东文化事业的发展仍还很不适应，国家文化投资虽年年略增，但同教育、科技事业一样，欠账还很多，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并强化它的主体功能，这方面亟待加强。其次，文化的基础建设，如文化设备、场所、文化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专业文化队伍的建设方面，相对广东经济发展速度而言，发展还不快。其三，目前的文化繁荣还是属于一种粗放型的繁荣，精优型文化发展较为缓慢，社会文化总投资流向存在趋低型流动的倾向，造成了精优型文化发展资金不足以及高、中、低文化层次的不合理结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长远发展。其四，由于文化事业与经济部门的相互结合、渗透，部分文化的商业性趋向是明显的，这也带来文化生产关系的某些不合理发展。造成这种趋向的原因，除了自发性原因之外，与文化部门体制改革尚未找到一个较佳的路子恐怕也有联系。其五，由于法制、管理方面的不完善，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复燃和渗透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是明显的。黄色录相、迷信活动等在一些地区确实曾反复多次泛滥，对社会主义文化产生过巨大冲击。其六，计划性不够，部分娱乐性文化增长过猛，造成供过于求，如大型游乐场。但是，我们认为，在刚刚结束了十年文

化萧条之后，社会“文化饥饿”空前膨胀的情况下，在改革和开放初期，各方面还未完善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足为怪。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从我省对外开放的特殊情况出发，在现有的文化基础上，发挥优势，克服不足，使我省社会主义文化由粗放型发展阶段向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阶段转换。

（二）我省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阶段转换的原则

无疑，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必须协调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健康发展，应成为我们发展文化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依据这点，我省文化发展的前途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夸大近几年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否定开放和改革带来的新的繁荣和发展趋向，退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的、单一的文化“缓进”状态；二是对现有的粗放型文化无所作为，顺其自然发展，结果必然影响社会主义主体文化的壮大和提高，搞得不好，甚至会使我省文化完全陷入由商品经济杠杆支配的“商业文化”轨道；三是因势利导，发挥初步繁荣的诸种有利因素，及时组织文化发展的阶段转换，健全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引导调节机制，使我省社会主义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向发展的成熟阶段。显然，我们应取第三条道路。

于是，我们就应综合考虑第三条道路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各种外部和内部的制约因素。主要的外部制约因素：第一，广东坚持对外开放的特殊社会环境；第二，广东商品经济及商品经济意识比较发达；第三，社会物质生活比较富裕，文化消费能力和文化消费市场较大；第四，广东沿海文化已具备了较好的物质基础；第五，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含深圳、珠海），以汕头为中心的韩江三角洲，以及粤东北、海南、粤西等山区地带已形成了特色不同的三个文化带域，呈现出文化发展水平由沿海两个繁荣带域向内地山区（含海南岛）的二级辐射梯度；第六，作为文化的直接基础的科学技术、国民教育，我省目前还不够发达，但尚有一定基础。主要的内部制约因素：第一，历史悠久的岭南文化传统以及近百年殖民主义渗透，港澳文化和东南亚华侨文化渗透而形成的某些地方文化特色；第二，以大众娱乐性为特征的粗放型民间文化形态；第三，文化艺术教育水平和文化队伍数量较少，素质不高；第四，文化管理机构系统和职能不尽完善；第五，国家文化投资比民间文化投资的增长要慢。等等。这些内外部制约因素中，有些是优势，如经济基础较好，群众文化基础广泛，广州、汕头的文化中心的形成等。有些是劣势，如文化教育落后，文化骨干队伍力量较弱，山区和农村文化发展与沿海之间的不平衡等。有些则处于可转化状态，处理得好，可能成为我们的优势，处理得不好则会成为劣势，如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发达等。

因此，我们在构想我省文化发展战略时，就不仅是一个纯文化的思路，而应是一个与广东经济、社会、科学、教育综合规划的系统思路；不是一种脱离广东现实状况的主观臆想，而是立足现有优劣势之上的可行规划。毫无疑问，在确定我省文化发展的目标

时，我们应是明确而坚定的，这就是使我们的一切政策、措施都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的综合功能，以求得广东文化在上述的特殊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有进一步的繁荣和明显的提高，建成一个适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与广东在内地和港澳甚至东南亚一带的经济、政治地位相称的现代化的区域文化体系。提出这样的目标，是考虑到今后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省份，它对内地的重要性；考虑到香港问题解决时，广东所应发挥的作用；也考虑到广东将来作为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沟通的主要窗口和桥梁，它在文化上如何“面向世界”的问题。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广东将来能否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要交融地带，确实值得作一番预测。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在构想广东文化发展时，不妨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当然，我们不能拔着头发去登天，但只把眼光局限在广东本省是狭窄了一些。我们不妨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也把文化发展规划划分几个目标阶段，例如在“七五”计划期间，应是如何，在1997年或2000年之前又应该如何？一步一步地去逼近我们的目标。这一规划，我们认为应从现在起就组织人力加以研究，逐步制定，否则，就会耽误时间，给广东文化发展带来被动，给广东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影响。

当然，文化发展的规划同经济发展规划一样，在制定过程中将会遇到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由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它会比经济发展过程更复杂，所以，更需要辩证地分析解决好各种内外部关系，例如，物质文明程度与文化发展既同步又不一定同步的关系，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内部的新与旧、传统与革新的关系，文化发展过程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化本体的发展与文化客体（即对象）发展的关系，文化事业的经营中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适当比例和关系，文化内部各种类、各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省内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文化建设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必要一一分别加以探讨，但归结起来，广东目前应突出加以重视的中心环节，是如何在处理好各种关系之中，优先发展和强化社会主义主体文化的地位和功能。

（三）突出社会主义主体文化的优先发展是 广东文化发展阶段转换的主要推动力

任何社会，都必然也必须有它的主体文化。所谓主体文化，是指直接产生于该社会经济基础，为该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所决定并为它们服务的，代表该社会性质和特点的，以国家统一管理为主的文化政策、文化基本形态、文化管理系统和机构、文化经营方式和文化风气的总和。其核心是文化的基本方向和文化的社会内容。正如一个国家有它的主体经济成份和非主体经济成份一样，一个国家或社会，也必然有多种文化成份存在，如我国现阶段，就存在社会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因素、封建主义文化因素等。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主体文化必须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理想和实践的，能鼓舞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一主体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将逐步地战胜现存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消极落后部分，并包容愈来愈多的人类文化的优秀成份。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没有明显的阶级属性的纯娱乐性文化，也将在主体文化的主导作用下长期发挥作用。

广东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到，我省的文化，比内地在构成成份上更为复杂，这一方面是呈现了文化多姿多样的繁荣，一方面则存在各种文化成份的竞争。竞争不是坏事，但如何在多种文化的竞争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体文化成份，我们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首先，是主体文化建设的投资还严重不足，必须尽力增加。我省近年来的国家文化投资仅占全省财政支出的0.8—0.9%左右（不含文化基建投资），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国家的文化投资，其实质上可以成为在物质基础上保证或主宰文化发展的方向的主要杠杆。相对于民间集资，国家通过投资的杠杆，可以调节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而集体或个人的文化资金流向，国家则相对较难直接控制，只能用税收、法律或行政手段间接控制，加上民间资金原则上是一种商业性质的文化资金，它需要按价值规律调节，而且比较分散，所以不容易在大型文化项目或基础型文化事业上产生明显作用，对文化事业的长远社会效益也不可能充分关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民间文化资金是对社会文化投资的一个重要补充来源，继续鼓励企业和群众的投资积极性，放手将一些大众娱乐性文化交给民间去办，并适当引导，使之成为文化繁荣发生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则主要将国家的文化投资集中用到社会主义主体文化的长远发展之上，如兴建各类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艺术人才培养、高层次文化的发展等等。当然，国家文化投资有一部分也要赢利，以扩大文化再生产，但绝不能因此而忘了根本的长远的社会效益。国家资金来源，应多渠道扩大，其中对大众娱乐型文化的赢利采取合理税收的所得，原则上应转化为扩大文化再生产的国家资金。为了使国家、集体、个人的文化经营更好地协调配合，特别是加强国家对集体、个人文化经营活动的引导，应提倡国家与集体、个人联营方式，通过联营、合资，使主体文化的影响扩大。

其次，要进一步调整文化政策，造成有利于社会主义主体文化发展的客观环境。对于那些严重冲击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腐朽文化，除了思想上的斗争之外，要有一套法律加以强制性的管理；对于属于人民内部的落后的文化风气和文化活动，如迷信活动、低级的舞会等要思想教育和法律并举加以处理，如教育和罚款等结合（正当的宗教文化活动除外）；对于低层次但赢利大的文化，应该适当加重税收，而对有利于社会主义主体文化发展的文化，应免税或减税，如对各种武侠小说、传奇书籍的出版，可以采取纸张印刷高价格、高税收政策加以限制，而有利于思想教育的高质量书籍，可以免税、保证牌价供纸甚至实行财政补贴政策。总之，政策上要体现经济、法律和行政命令三个杠杆的综合作用。当前文化体制的改革要十分注意改革的目标性，决不能简单地照搬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切做法，例如，对演出团体内部的“大锅饭”是必须破的，但是否要求演出团体或个人搞经济承包，则要分析具体情况而慎重地区别对待。对刊物书籍的出版发行，也要区

别种类而分别对待，绝不能一律要求自负盈亏。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对企业一般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但也不排除某些产品的社会效益)，但对文化生产单位，则主要为了提高社会效益(当然也不排除必要的经济效益)。文化体制改革政策应该是有利于文化在社会效益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求得与经济效益的相对统一，造成有利于社会主义主体文化充分发展的主客观环境。

其三，要充分发挥文化中心城市在发展社会主义主体文化中的功能，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社会主义主体文化基地，以带动文化落后地区。广州市首先应办成我省社会主义文化中心，在提高社会主义主体文化水平、培养文化骨干队伍、树立文化示范、形成健康的文化风气等各方面都走在前头。几个经济特区，也应探索如何在对外开放、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和生活日益现代化的特殊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经验，为今后全省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经验。各地区的中心市镇，也应根据本地区的文化特色，有侧重地在地方文化上成为小基地。

其四，要重视树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念，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接受水平，以提高社会主义主体文化的消费层次，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主体文化的社会风气。目前，我省一般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接受水平还处于不高的层次上，群众文化欣赏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对商品性文化、低层次文化的社会需求相对扩大，反过来便对文化生产发生影响。例如武侠小说供不应求而理论书籍和高档文学书籍购买力较小的现象，原因很多，有这类书质量还不高或娱乐性不强等原因，但根本上是对象的水平上的原因。因此，在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方面，要大大加强。在此前提下，要注意加强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大众审美能力和水平的培养、训练，进一步发展各级学校和文化站、文化宫的业余文化辅导网，提倡和推广社会主义主体文化风气。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舆论部门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正面的社会主义文化，引导群众文化消费经健康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落后消极腐朽的文化要理直气壮的进行抵制，批判的功能不能削弱，当然，绝不是过去“左”倾错误影响下的简单粗暴的做法。

广东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研究尚未真正展开，笔者上述肤浅粗疏之见，纯属抛砖之谈，旨在引发讨论。如果说，近几年社会科学界曾在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方面花了大量力气，做了许多工作，那么，在广东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方面，也应提到同样的地位，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范 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的开放与改革的方针，不仅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农村的变化。我国的广大农村，目前正处于两个大的转化，即由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之始。据统计，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之前，我国农村出现的各种专业户就有2400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6%。这些专业户，一是劳动致富的模范；二是科学技术的追求者、示范者和传播者；三是建设新农村的先进分子，在他们身上既有我国农民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一些新的品质。一九八四年八月份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已有3000多万个农民走上了务工的道路，相当于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的三分之一还多，已占我国农业总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左右。值得称道的是，这么多农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愉快地转化为工人，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完全可以说，我国农村的开放与改革，实质就在于农业的商品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仅从粮食商品率和农副产品商品率来看，一九八三年与一九七八年相比，分别从20%增长到30%和从49%增长到55%；同时，广大农民的生活消费也开始由自给半自给为主转变为以商品性消费为主。上述情况表明：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对我国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的认识与研究，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本文仅就我国广大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方面，试作初步的探讨，以祈就教于同志们。

一、农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

要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与城市一样，把它置于社会主义重要特征

的前提下，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考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这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个重要特征不仅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里面，而且也表现在广大农村之中。光有城市而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或者用城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代替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不能说，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正确理解。同时，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在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我国现阶段的广大农民在开放与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精神活动，正是这样一种状况。但同时，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在开放与改革的过程中仍会有其不同形式的表现，这又是不可不引为注意的支流问题。因此，要建设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以及我国广大农民的实际情况这一重要依据。这也是我们考察农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第一，要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建设，就一定要占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这一社会成员众多的、广阔而重要的思想阵地。

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建设，首先是工人阶级本身的思想建设，包括工人阶级整个队伍以及代表这一队伍的政党的思想建设。其中，在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城市，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建设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们强调工人阶级本身的思想建设，决不意味着排斥、否定或者削弱对于广大农民的思想建设工作。在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是相当困难的。对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

灌输、教育和训练，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工农联盟，缩小城乡差别，把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水准上来，从而克服广大农民身上的精神缺陷，激发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热情等等方面，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当然，现在我国的农民已跟旧中国或资本主义时代的旧式农民相较，甚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农民相较，有许多不同之处。随着各种专业户、各种经济联合体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农民”的概念正在逐渐变化，而且“农村”的概念也正在发生变化。农民的新观念、新祈望层出不穷。但是，如果不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指导，不加强农村的思想建设工作，工作中不讲究新时期的新特点和新方法，就不能保证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意的是，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凭主观愿望，想当然地提出脱离绝大多数农民的实际状况的过急要求和过急措施。就是说，讲究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不同层次和方法，一切从农村的现状与实际出发，乃是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具体切实的行动来逐步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进行农村思想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途径。例如，这几年，不少农村根据自身的实际，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创造了以建立“文明村”为主要形式的思想建设的阵地，归纳起来他们的做法主要是：1. 广泛制订乡规民约；2. 从基层抓起，从建设“文明家庭”做起；3. 大力提倡兴办公益事业的义务劳动和互帮互助的新风尚；4. 开展群众性、经常性评选先进、表彰先进的活动；5. 落实“包教”责任制，做好后进个人的思想转化工作；6. 关心老年人，发挥他们在建设“文明村”中的重要作用；7. 因地制宜，开展健康活泼、乡土气息浓厚的文体活动，陶冶人们的心灵，培养人们的高尚情趣。这些做法都是很实际的，也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因此，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就必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能够把广大农民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

第二，要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就一定要解决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的文化建设问题。

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表明，随着阶级社会的愈益进步，城市不仅成为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活动中心，而且也是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等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广大荒凉的农村，几乎成了文化的沙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尤其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才开始把城市文化的唾沫吐在了广阔而干旱的农村土地上。然而，以往绝大多数的城乡劳动者都不可能享有文化和受教育的权利，旧中国的情况更是严重，近代的文化建设事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迫使我们在当前，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大力发展城市的文化建设事业，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中心的巨大作用，又要大力地发展农村文化建设事业，普及小学教育，扫除文盲，改变半文盲现象，提倡和推广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医疗卫生和文体体育等项事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的要求，是我们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任务之一，也是农村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这几年农民对于文化的渴求是十分迫切的。在开放与改革的过程中，在农村的两个大的转化的过程中，广大农民要治旧变新，治脏变净，治乱变安，治穷变富，就是要治愚变智。他们深切地懂得“金山，银山，党的政策是靠山；金丹，银丹，科学技术是仙丹。”在党的正确的农村政策下面，治愚变智，便成为广大农民普遍的、强烈的愿望和行动。到一九八四年初，全国已兴办了35000多个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的农村文化站；县级农校3000多所；乡级夜校15000多间；考入中国农业广播学校的农民达460000之众。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形式的文化补习班，象雨后春笋似的方兴未艾，遍布山乡平原，改变着农民的思维。那些有文化有科学技术，信息灵交游广，善于经营的农村基层干部、复退军人、回乡知青和能工巧匠，已经成了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支以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化的生力军正在广阔的农村土地上茁壮成长，广大农村的文化建设事业一定会在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对城市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矛盾状态。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也莫不如此。

随着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城市从广漠的农村中脱颖而出。在此后漫长的阶级社会之中，其生产不断发展，其人口不断聚集，其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城市成了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和技术各方面的活动中心，变为剥削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主要的堡垒而把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远远地抛在它的后面，从而造成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畸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文明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广大农民抛乡离土，进城谋生，成了廉价的劳动力，受尽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采用精神奴役和文化剥夺的愚民政策，是一切剥削者普遍使用的手段，结果之一，便形成城乡的长期对立和差别，农村受城市的主宰钳制，为城市服务牺牲，因而成了城市的附庸和城市文明的垫脚石。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城乡劳动人民的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平等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剥削制度，也逐步在克服城市对于农村的主宰和钳制关系，城乡各自的存在与发展之间，已经逐步地形成真正的相互促进的局面。这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方面的相互促进，也表现在精神文明方面的相互促进。

物质文明方面的相互促进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城市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所在地。城市重工业的发展，不仅对于城市轻工业，国防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等等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重工业能够给予多少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程度不能离开城市重工业提供的技术改造的物质程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城市的存在，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繁荣，又得依靠农业的进步与实力。不论办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粮食；工业和其他部门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都主要是由农村提供的；轻工业原料的70%离开了农业就无法得到；就我国来说，八亿农民是工业品的主要销售者，农村的购买力如何，直接影响城市工业的生产和发展状况；国家建设需要积累资金，而农业则是积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这说明，农业的发展，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进

步，又是促进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物质文明建设进步的最先决的条件。

城乡物质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的关系，必然导致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一般地说，城市是工人阶级聚居之地。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同其他劳动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又有着血肉的联系，这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道德、纪律等等方面，易于灌输，感染，从而推动广大农民觉悟的有利条件。因此，城市工人阶级对于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众来说，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其本身的思想建设工作对农民思想的建设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并最终消灭这三大差别。从文化建设角度看，社会主义初期城乡文化的差别应该是日趋消除的。但在现阶段，城市物质文明发展的起点，一般会比农村高些，它所能给予城市文化建设的条件也就会比农村优越得多。因此，城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在社会主义很长一个时期内，还处于优先的地位，这是农村所不能一下子改变的处境，农村固然需要自己的努力，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尽快地把它搞上去，但是，城市有义务扶持、带动、促进农村的文化建设事业，为农村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教师，更多的农艺技术人才，更多的医疗卫生人员，更多的文学艺术，科学知识等等精神食粮。这是应当做到的。

城市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农村具有促进作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城市有没有促进作用呢？有的同志对此缺乏认识，认为只要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会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第一，城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管在物质条件、发展水平等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不同，但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为指导，则是一致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便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农村得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的内在力量，而且是推动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外在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许多事实也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以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的。我国农民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率先起来冲破极左路线的束缚，创造出联产承包责任制，

并且很快在全国广大农村开花结果，这不仅成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发生巨变的内在动力，而且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借鉴的东西，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农村有农村的特点，城市有城市的特点，但是生产责任制则是城乡都适用的东西。这既是对农民创造的生产责任制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广大农民的思想解放从而推动城市工人阶级和其他居民的思想解放的外在动力的充分肯定。

第二，城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管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同，但是，都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为相应的条件。农村要有这些相应的条件，必然要求助于城市的大力支援，这在客观上因农村的文化需求而促进了城市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般说来，城市的文化建设是走在农村前面的。但城市文化建设的水平，总不能停留在原有的位置上。城市文化建设持续发展，既有赖于城市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又有赖于农村文化需求的提高。农村的物质文明发展了，农民对文化的需求就更加迫切。例如，他们需要城市建立各门各类的学校为农村培养千千万万个专门人才，这在事实上就促进了城市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因此，城市文化建设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題，除了城市本身的需求因素之外，农村的需求因素决不能否定和低估。因为光有城市本身的需求因素而排斥农村的需求因素，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就是有限的。

三、农民的精神解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达到高度的标志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要从农民的精神解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达到高度的标志这一角度来考察。要说明这一点，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指的是什么？衡量这一高度的标志又是什么？弄清了这些问题，对于农民的精神解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达到高度的标志的理解，就会更为清楚一些。

从各个阶级社会的本身来说，它的精神文明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随着该社会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而出现的。所谓比较完善，就是统治该社会的思想体系比较完

整；统治阶级本身已有比较足够的文化并在这一基础上掌握比较完整的、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思想体系，来麻醉和奴役没有文化、缺少文化的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其经济上的统治和剥削。该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便是一个高度。然而，原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一旦走上反动的阶段以至于最终失去头上至高无上的皇冠，其精神文明的思想支柱便开始动摇直至倒塌，其精神文明也便从产生、发展的高度上逐步地跌落下来，而被另一个新生的统治阶级所建立的精神文明所取代。综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其精神文明的产生、发展和走向没落的过程，大至便是如此。这说明，各个阶级社会的精神文明，本身是有高度的。这个高度是处于该社会精神文明的产生与没落之间的。而达到这一高度的标志，则是代表历史进步的上升和发展阶段的统治阶级思想体系的相对完善化，以及掌握这种思想体系所具有的相应的文化基础。

不仅各个阶级社会的精神文明曾经有过自己的高度，而且后者的高度总是超越前者的高度的。这正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态不断进化的一种表征。这就是说，各个阶级社会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并非一样，原因也主要在于各个阶级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核心有所区别，文化基础有所不同。各个剥削阶级的思想是私有制的反映，为私有制服务，其本质是一致的。但是，不能因为它们本质的一致性而否定它们在本质一致性前提下存在着的各种差别和特点。尤其在它们还处于上升、发展的历史进步时期，也即创造和达到精神文明高度的时期，可以说是各自的精神文明的个性和特点的最明显最集中的反映。通过各个阶级社会精神文明达到高度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精神成果的比较，我们并不难发现，它们在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激起的浪尖，无疑是一个比一个高大。

同以往阶级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其产生和发展时期。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会走向没落，不存在没落的过程，它的高度不象阶级社会精神文明的高度那样，处于产生与没落过程之间，而是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达到接近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程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是继承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优秀精神资料 and 全体社会主义成员共同创造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高类型的精神文明，同以往

阶级社会的精神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往阶级社会的精神文明的产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尤其在达到高度之后的逐步没落乃至被新兴阶级的精神文明所取代,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这是因其思想核心由代表历史的进步而走向历史的反动所致。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是以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这种思想贯穿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没有没落或被别的什么新兴阶级的精神文明所取代的问题,它本身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人类社会历史精神文明进化到这个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是用以往阶级社会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的积累为起点,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的产生和发展为过程,以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程度为目的的。而衡量达到这个高度的标志,主要有两点:

第一,当然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全社会成员所掌握,即不仅成为工人阶级自觉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也成为工人阶级以外尤其是广大农民自觉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广大农民是否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是衡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否达到这个高度的思想标志。

剥削阶级的思想只能为剥削阶级所掌握,掌握的过程既是灌输的过程,又是自觉的过程。但是它们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只有灌输而无自觉可言。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剥削阶级的思想统治和灌输,或迟或早总是要加以反抗的。因此不可能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的一致,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掌握。与此相反,共产主义思想既然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不论是对工人阶级还是对广大农民的灌输,都会形成自觉的过程,变为自觉的行动。因而具有全社会成员在思想上达到完全一致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只有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都达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水准,才会有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我国要达到这一高度,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水准就必须有极大的、普遍的提高,否则,就谈不上农民精神解放中的思想解放,更谈不上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所要达到的那

个高度。因此,广大农民的思想解放所要达到的高度,既是农民自身精神彻底解放的重要标志,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达到应有高度的重要标志。

第二,共产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一致的指导思想,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让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享有文化来自觉掌握这种思想。广大农民是否有了足够的文化,是衡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否达到这个高度的文化标志。

以往剥削阶级既要向广大群众灌输其作为精神文明核心的剥削阶级思想,又害怕广大群众有文化,这是非常矛盾的现象。因此,各个阶级社会,那怕是资本主义社会,它们所建立起来的精神文明,能够达到的高度都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却不同。由于共产主义思想是代表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思想,用这种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同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知识的关系不存在分离、对抗的关系,它愈是要求广大社会成员要有共产主义思想,就愈是要求广大社会成员要有文化。因此,在思想的灌输和文化的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思想水准的提高和文化水准的提高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便不可估量。这说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全体社会成员在指导思想上达到一致的可能性,也具有指导思想与文化知识达到一致的可能性。要把这两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广大农民除了思想解放之外,精神解放中的文化解放便是举足轻重的事情。只有广大农民都有极高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同时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我们才能够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经达到了应有的高度。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达到高度的标志,不仅仅是广大农民思想上的精神解放,而且是广大农民文化上的精神解放,二者缺一不可。

现在,我国广大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由于种种干扰,我们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估计,必须实事求是,目前或今后较长一段时期里,还仅仅处于打基础、起步的阶段。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这就要求我们要特别加以重视并给予精心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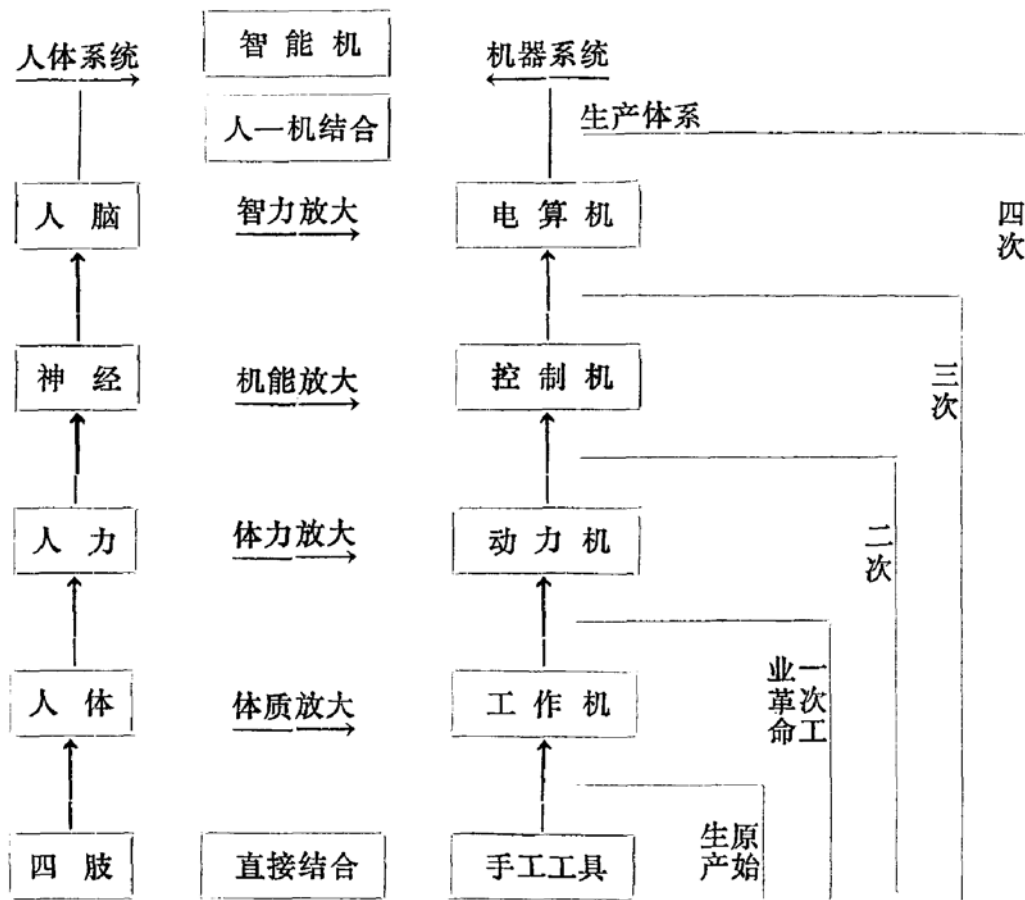
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价值

丁长青

我们知道，劳动力就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但哪怕是原始人在打造一把石斧时的最为简单的体力劳动，若没有目的，没有方法——没有智力活动的参加，也是根本不能进行的。人类主动地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与动物被动地顺从自然的适应活动的根本区别，便在于此。我们还应注意到，今人在体力上并不强于古人，而在智力上却有天壤之别——作为生产力之首要因素的劳动力的发展，主要就是其智力的发展，即精神生产力的提高，亦即作为过程来看的精神生产的扩张与增强。从奴隶社会发生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以来，脑力劳动的广度与深度便在飞速扩展：从牛顿时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总规模扩大了100万倍，杰出科学家的总人数增加了82倍，科学杂志数增长了20万倍，重大发现发明平均每年递增2%，近100年来，科研成果增加了4倍，而产生同样数量的科技文献所需要的时间却只需要100年前的十分之一。在整个社会领域中，能够与这一发展速度相比较的，只有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第28页）从近一百年来的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总产值来看，也以平均年增5%左右的速度扩张，而日本在1915—1919年间竟达到了年增87%。但是，本世纪以来，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科学技术已经超前于生产本身的发展；智力活动已走到了生产活动的前面；物质生产的大约80%是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核能、激光、计算机等新兴领域，则100%取决于科技。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目前已有60%的人从事于知识信息行业，它发出了一个信号：科技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局部地区和发展趋势上看，精神生产的比重已经超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地位已经优先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行将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因素和首要形式。

生产力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工具，它固然是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尺度和标志，但问题在于，工具自身经历了一个沿智力方向进化的过程。从石刀石斧、弓箭木犁到钢器铁器、水泵火炮，可以说都直接是人体四肢的延伸，人与工具直接结合，工具是完全被动的，离开人的操作，工具即为死物。但是，1788年，约翰·惠特提供了他的纺织机，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就由此开始了。在此前后发明的镗床、炼铁炉、打字机、水轮机等工作机就不再只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而是整个躯体的器质性放大，具有了一旦启动，便能自行运转工作的独立性，被注入了自我调节与信息反馈的较多的智力因素。采

用蒸汽机作为产生运动的机器，则是第二次革命。它使人的体力得到了放大，使机器群构成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应用和电讯发展为标志的，而其主要特征便是冲破地域限制，广为传输能量与信息，实现自控与遥控，它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的神经控制系统在客观自然界的外化。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开辟了人脑模拟、智力放大的新时代，智力成为机器的主要特征、主要功能。当前，生产工具正朝着人一机结合的智能机方向发展，重新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但已不是外部肢体与手工工具的直接联系，而是人的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直接的信息传输、指挥控制，使人的智慧、目的与意志能直接支配外部客观世界，实现自然界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真正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如图示：



从生产力的第三要素劳动对象来看，纯粹的、自然界中原初性的材料、原料已日趋鲜见，它们多已在愈变愈多、数不胜数的加工程序中变得面目全非，逐次溶入更多的智力因素。人们很难想象黑稠难闻的煤焦油竟会变成香料、糖精、食油、人造革，或者一件薄如蝉翅的尼龙衫会来自坚硬的矿石块。当今，全世界每年已接近钢产量的6千万吨有机高分子材料——塑料、橡胶、纤维等已进入了几乎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材料行列。至于生产过程中的那些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则更是智慧或知识的叠加了。

由此可见，生产力的每一要素无不熔铸着愈来愈多的智力因素，物质生产已在愈来愈高的程度上依赖于精神生产，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日益智力化、科学化，通过工具的更

新换代所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已成为社会生产水平的真正标志。由于科学没有国界，知识不能私有，社会的精神财富总是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被保存下来，只要一经获得，便可永久地为人类服务，而且它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繁殖、自我完善的进化能力和无限扩大的趋势，它才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征服宇宙的无限发展的本质力量，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和整个社会实践水平。因此，在现存商品生产和商品社会中，承认并探讨精神生产的产品价值，便成为保证和扩大精神生产，从而组织好整个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之点。

精神产品就是由精神生产所创造的各种信息形式——书刊、资料、设计、专利等知识财富。它们与一般物质产品一样同具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样服从价值规律的支配。但在中国几百年的商品经济中，它并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普遍承认，甚至受到鄙视，似乎精神产品一旦商品化，便立见低贱，不再高尚了。究其原因，第一是由于精神产品本身以往还不发达，还未发展到足够的规模，还未取得应有的地位，它只是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才成为突出的问题，成为历史提出的范畴。第二是陈腐的传统观念混淆了精神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其实，精神产品无论是为人类的灵魂服务，还是为人类的世俗生活服务，它本身都只是人的劳动的凝结，都具有价值，正如一件工艺品与一袋尿素，不论它们的用途何其相异，“贵贱”何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却都同为商品、可以相互交换一样。第三点原因是精神产品价值的模糊性、不确切性。普通物质产品的原材料价值、活劳动量、折旧费等都是界线分明、确切易算的，而精神产品却是在整个知识背景上出现，其价值较难计算，因而，许多精神产品特别是最早发展起来的艺术产品的价值便只是取决于社会购买力的大小，似乎是高下无定。这些原因造成了精神生产者的大量无酬劳动，大大压制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这种状况在旧日的中国尤为明显——无论是一部《红楼梦》或一架浑天仪，它们的使用价值无人否认，但对它们的创造者的十载寒窗、终生心血，却毫无酬报，较之很早便建立了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国家，这实乃我国科技落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今，精神产品的地位已经势夺鳌头，各门科学的定量研究已经提供了计算手段，在我国，搞活经济、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在现存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尊重知识，肯定智力劳动的作用，承认精神产品的价值，把绝大部分精神产品合理地纳入商品渠道，以扩大交流，激励创造，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这实在已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事情。为此，首先就须弄清精神产品与一般物质产品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提出计算精神产品价值的途径与方法。

一、劳动过程即体力与脑力的耗费过程，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体现的总耗费量即产品的价值。无论是作为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还是作为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同是劳动力的耗费，其产品就同具价值，而价值量的大小，也就同样应由产品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其区别在于：在一般物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是社会为之准备起来的，是劳动者可以直接加以利用的东西，并不体现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付出，故应从产品凝结的总劳动量中扣除，只有其损耗部分才以折旧费形式进入产品

价值。劳动对象所凝结的死劳动（过去劳动）也是由他人完成的，故对劳动者以报酬就只应限于活劳动部分。而实验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外的精神生产一般却并无可直接利用的工具与设备。作为原材料的信息、知识财富也只是为他的精神劳动提供了条件，提供了开掘、加工的可能性，而不能如一般劳动对象那样以既成形态直接进入产品实体和产品价值。劳动者的整个劳动过程必须完全由他自己承担起来，其产品价值是全部来自他的劳动消耗。因此，在扣除劳动者可以直接引用、利用的情报、专利费用和非自付的培养训练费用之后，其余部分的产品价值便应全部作为劳动者的个人报酬。

二、精神生产是一种复杂劳动。“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页）换算的比例看起来是由习惯决定的，实际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自发决定的。由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都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要从千变万化的劳动对比或产品对比中抽象出二种劳动的价值对比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比例其实就是复杂劳动力的价值与简单劳动力的价值之比例。即知识者的培养训练费用及其本人和亲属的生活费用与简单劳动者的上述费用之间的比值。在这里前者的多倍价值看上去是社会对他的支付，但在价值规律支配下，社会之所以作出这一行为，正因为是在等时劳动下他所创造的价值将以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倍率代替多量的简单劳动。否则，无论私人或社会与国家便不会进行这一智力投资。这样，我们便找到了倍率或比值的计算方法：造就一个复杂劳动者的代价几倍于一个简单劳动者，在等时劳动情况下，其劳动的产品价值便几倍于后者，为了继续保持这一比值，使之发挥作用，对精神产品的劳动报酬也便应几倍于等时简单劳动的报酬。

三、无论何种生产，首创性、一次性产品的价值与重复性、批量产品的价值是不同的。前者的劳动耗费包括可行性研究、生产方法、步骤、程序的制定，原材料的选择、调配，劳动队伍的组织、培训，工具、设备的建立和调试检验等等；后者则是对上述既有条件的直接利用，只应考虑其损耗部分。精神产品多为开拓性、创造性的一次性产品，其价值量相当于多倍的物质产品价值量。

四、生产一件精神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往往是显得很难计算的，这特别是因为它们“正式”生产时间往往是极为短促的。但是，它并不象一般物质生产那样只在活劳动时间内改造对象、耗费劳力，而是凭借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整个知识储备、教育程度和训练技巧才能实现那一瞬时创造——门捷列夫用一天时间排出的元素周期表是来自二十个春秋的实验与思考，凯库勒在梦中发现的苯环结构其实是数年苦思冥想的结果。因此，精神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决不仅仅是在写作、讲演、画图或解答时所耗费的时间，（那只是产品的“组装”、“出厂”时间）而应当是与该产品有关的整个酝酿、研究、商榷、实验等所有劳动量的总和。

五、无论何种产品，其价值都等于它所包含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总和。不同的是，物质产品中的物化劳动在自然力的破坏下难以长久保持，不然就要为之投入新的劳

动（保养、维修等等）。而自然科学知识财富具有馈赠性，只要它一旦存在，在超过保密期之后，就可以无代价地为许多人服务，这就是说，精神产品中的物化劳动只占有较小的比重，其总价值的绝大部分是由活劳动所提供。而活劳动是由创造该产品的劳动者本人完成的，因此，对同等价值的两类产品，精神生产者应获得高于物质生产者的报酬。

六、技术构成的提高是生产的必然趋势，它使生产率提高，生产变得轻易，使产品价值和劳动力价值都不断降低。但是，精神生产却不服从于这一规律——它是对未来的开拓，是向未知的进军，主要地依靠智慧本身的进展与发挥。它从每一个界面、每一个出发点继续向前推进时，都不会比以往的每一步推进来得轻易，它所需要付出的劳动量、产品的价值量及劳动者的自身价值也便不会降低。



顾见山小考

官大梁

顾见山作有《东溪》杂剧，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说：“顾见山名号、籍里，俱不详。生平事迹亦待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00页）。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说：“顾见山，名号不详，松江人，顺治壬辰进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版，中册第726页）。周妙中《历代曲家年里字号室名综录》作：顾见山，乾隆以前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7月版《曲苑》第一辑第308页）。

顾见山是清初名诗人、画家，文献不乏记载。原名镛，字震雉，后改名大申，号见山，华亭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一：“顾大申……康熙己酉以工部郎中奉使榷赣关，作画别余，自后不复相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顾见山……少以能文著。（顺治丙戌举人，见卷二——笔者）顺治壬辰成进士，历官西秦金宪。工诗画，为海内所推。康熙中卒于官。”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顾大申“官工部侍郎”。周亮工《读画录·方咸亨传》：“海内士大夫以画名家者，程青溪、顾见山及侍御（方咸亨），可称三鼎足。”《带经堂诗话》卷十一说他“善丹青，尤工设色，为诗精深华妙，兼有寄托，在松江派中大樽之下，诸人之上”。《清诗别裁集》卷三：“云间自陈卧子后，诗格渐衰，鹤巢（顾大申有《鹤巢诗存》）古今体气足神完，可以接武。”但其诗《四库全书总目》颇有微辞：“陈伯玗撰《国雅集》，称其（顾见山）乐府于古人可谓毫发无遗憾；七律高华，可追王李。今观其集，大抵袭明七子之余风。可追王李，庶乎近之。至于乐府，则谈何容易也”（卷182）。

顾见山是云间五子之一彭宾（燕又）的弟子，曾与彭举社设会。杜登春《社事始末》：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彭燕又率其徒顾子震雉……，举赠言社，亦有《初集》之刻，似乎求社之分枝，而实几社之别派。震雉欲登东海之堂而不得，归于燕又，集二十余人为一会，与几社诸子之文会相等。”

顾见山又撰有《堪斋诗存》八卷，编有《诗原》二十五卷，见《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艺文志》。

浅论新兴科学的含义与特点

张尚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要加强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建设，充实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任务，并强调高等学校要“扶植新兴、边缘学科的成长”。加强新兴科学的研究，应认真探讨新兴科学的含义与特点等问题。

—

“新兴科学”这个概念，是相对传统科学而言的。传统科学根据自然、社会、思维这三大领域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三大类，每一类下面又分出许多学科。在这之上，则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哲学。传统科学的分类界限清楚，层次分明，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确实对人类实践起了巨大的作用。

科学分类是在人类认识史上形成和变化的。科学如何分类，反映着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科学的发展水平，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有了重大发展，科学分类也将随之改变。自本世纪以来，人们发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解决人与人的矛盾虽然是两个不同领域，但它们之间却密切相关。不断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才更有助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反之亦然。这样，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自然科学和解决人与人的矛盾的社会科学就不再各自独立了，而是互相渗透，交叉重叠。结果，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按传统学科分类的框架难于归属的科学。这一类科学就是新兴科学。

新兴科学已经难于按传统的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来划分了。至于怎样划分，从当前的情况看，大体有这样几种分法：

一种是与传统科学对比来划分的，由此分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和比较科学。所谓边缘科学，就是以传统学科的中间地带为研究

对象，形成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跨界的科学。比如，传统学科有生物学，有社会学，而社会生物学就是一种新兴的边缘科学。所谓横断科学，就是横跨传统学科各个领域，横贯自然、社会和思维“三界”。比如，信息科学、控制论和系统科学就是属于这样的横断科学。所谓综合科学，就是将各门科学，包括传统科学和新兴科学综合起来研究某一对象。比如，现在兴起的海洋科学、空间科学等，其研究对象虽然是特定的，但却综合了许多门科学来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所谓比较科学，就是开展各门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由其相互比较的学科不同，也就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各种比较学。

第二种是从学科本身的研究特点来划分的。新兴科学的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科学分类中也就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潜科学。作这类划分时，常将某些传统学科揉合在一起进行分类。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学科分类目录，基础科学就包括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七大类。每一类中又包括多门学科。这其中，有许多是新兴科学，也有一部分是传统科学。除基础科学外，新兴科学中大部分是应用科学，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如管理科学、系统工程学等都是如此。但所谓应用，并非排除理论，这些应用科学同样有很强的理论性。在新兴科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尚处在孕育状态的，它们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证实和社会的公认，其内容也只在提出某些猜测，思想还相当模糊，前景也不甚明朗。这部分就是所谓“潜科学”。潜科学只是预示着科学发展的未来，是还尚未形成科学的新兴科学。

第三种是从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划分

的。从这方面去划分则有所谓“硬科学”和“软科学”。这两个名称，借用于电子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它们的区别在于，硬科学是解决专门技术问题的科学，如遗传工程学，就是研究解决遗传工程的。软科学则不同，其目的并不在于解决某方面的专门技术问题，而在于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服务，但它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却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而是主要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偏重于用诸如建立数学模型、物理学模型等自然科学方法来对包括人和社会现象在内的广泛对象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主要是为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可资选择的方案。诸如现代管理学、系统分析、科学学、未来预测学及科学技术论等，都属于这种软科学。这一类软科学是传统科学所没有的，因而构成新兴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兴科学的划分有较大的相对性，其间有许多交叉。如果企图像对待传统科学那样，将新兴科学作出明晰的划分，清楚地确定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平行关系、交叉关系等，要想将目前已提出的二千多门学科作这样的排列，那是难于做到的，甚至是没有必要的。当然，我们也不完全否定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准则去划分新兴科学，因为作一定的划分，对我们认识和掌握新兴科学来说毕竟是有利的。而为了深入理解新兴科学的含义和特点，则需要我们概略地了解一下新兴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

新兴科学，就其主要学科的理论基础的建立和形成而言，大都在本世纪四十年代。但是，如果追溯其起源，则可追溯到本世纪初。也就是说，整个新兴科学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萌发到形成又到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

大体地说，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许多新兴科学就已提出来了。例如，管理科学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科学学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25年波兰社会学家兹纳涅茨基的《知识科学的对象与任务》一文；行为科学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33年梅奥的《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一书；决策科学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38年巴纳德的《经营者的职能》一书。四十年代以前提出的一系列新兴科学，本身就反映了新兴科学是适应生产和科学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从生产的发展来看，本世纪以前，资本主义

的生产是重物不重人的。那时，资本家亲自掌管企业，工人则是资本家可用廉价购买来的商品，所以，资本家对职工只有商品的观念而没有人的观念。其结果，劳资斗争日益尖锐，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企业经营者改变经营观念，开始重视人的因素的作用，为此而研究人的动机。许多新兴科学，就是由此而发端的。从科学的发展来看，近代科学发展到本世纪上半叶，其成果已经相当惊人。有人统计，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重大的科学技术发现就有1769项。科学的门类已经相当繁多，各门科学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复杂。这就使科学研究的目光，从外部对象转向自身，即以科学本身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出现的就是科学学。在这个基础上，同样诞生出一大批新兴科学。

到了四十年代，一方面，仍不断有新兴科学提出，如“未来学”就是1943年费莱希姆最早提出的。但从总的来看，新兴科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理论基础和学科的形成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新兴科学成就，就是诞生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它们的标志分别是1945年贝塔朗菲的《关于普通系统论》的文章、1948年维纳的《控制论》一书和申农的《通讯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三论”既是新兴科学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其本身也发展出一系列的新兴学科。其它诸如决策科学、行为科学、人群关系学说等，虽然以前已经提出，但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形成的。

自从新兴科学的理论基础建立以来，科学技术发展之快更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现在，人们已经公认，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这个变革，是以新能源即原子能的研制为起点的。继而，1946年制造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现在，电子计算机已经完成了四次换代。目前，电子计算机已向第五代的人工智能机迈进了，甚至第六代的仿脑机也提出来了。而在这个过程中，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意味着人类的活动领域已经从地球开始向太空扩展。1960年，又制造出第一个红宝石激光器，开辟了光的应用的新途径，后来又发展出光导纤维。1963年，科学家第一次从胡萝卜的细胞培育出一棵完整的胡萝卜，这是生物工程的发展。1973年，又首次实现了遗传基因的剪接和重组，也就是证明可以利用遗传工程来创造新的物种。这些科技成果过去没有，发展很快，

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造成深刻的影响。以致人们甚至将其称之为世界面临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新兴科学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从新兴科学由提出到形成再到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它们的发展线索主要有四条：

第一条是渊源于管理科学的各门新兴科学。在当代属新兴科学的“软科学”中，有一大批是从管理科学发展而来的。管理科学本来就是最早兴起的一门新兴科学，由于对管理中人的心理状态的研究而分化出管理心理学，从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而发展出行为科学，对管理中的决策的研究又逐步产生决策科学，行为科学中的领导行为及领导的决策的研究则分化出领导科学，因决策是面对未来的，为了科学决策而必须预测未来，于是又产生出了未来预测学。如果对管理科学的各个学派的学说再作细分，并将研究、管理的各个领域的学说也列举出来的话，则还有经验管理学、目标管理学及企业管理学、经济管理学、行政管理学、人事管理学、科研管理学等等。

第二条是渊源于科学学的各门新兴科学。在当代属新兴科学的“软科学”中，也有一大批是从科学学发展而来的。从历史考察，科学学继管理科学而提出，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许多门其它学科相结合，产生出属科学学分支的各门新兴科学，诸如科学经济学、科学政策学、科学计量学、科学学派学、科学心理学、科学人才学、科学预测学、科学教育学及科学技术论等等。在一大群科学学的分支中，又可分为理论科学学与应用科学学两个部分，前者如科学体系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等，后者如科学管理学、科学预测学等。如果再加上属科学学范围的科学史及各门科学的科学史，那么科学学这个“大家族”的“成员”也是相当可观的了。

第三条是渊源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各门新兴科学。这类新兴科学一方面表现为“三论”本身的分支，但更多的则表现为“三论”与其它学科结合而形成的新兴科学，如信息管理学、生物控制论、系统工程学等等。现在，“三论”已经几乎渗透于所有新兴科学之中去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三论”不仅自身是新兴科学，而且还成为各门新兴科学共同的理论基础。

第四条是与当代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各门新兴科学。这些就是新兴科学中属于“硬科学”的一

类。比如电子计算机科学、遗传工程学、激光科学等等。

新兴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上述四条主线及其派生的分支学科，仍包罗不了所有新兴科学。因为新兴科学相对于传统科学来说，有的是传统科学所没有的，有的则是传统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产生的，还有的是由传统科学互相结合而产生的。比如，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及运筹学、排队论、博弈论、拓扑学等是数学发展到新阶段而产生的新兴科学，而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社会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等，则是传统学科互相结合而产生的新兴科学。此外，还有哲学和各门科学结合而派生的新兴科学，如信息哲学、科学认识论、系统辩证法、技术美学等等。尽管以上四条主线包罗不了所有新兴科学，但为了从纷繁复杂的新兴科学中理出一个眉目来，抓住其主线，从主线考察其分支，仍是有助于我们认识新兴科学的历史发展及其脉络的。

在考察新兴科学的历史发展时，应抓住科学发展本身去分析，但也不能忘记科学总是和生产及社会同步发展的。如果说科学的进步表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发展的话，那么技术的进步则表明人类改造世界的进步，二者的统一，那就促成了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了。

三

研究新兴科学的分类和考察新兴科学的历史发展，从某些方面揭示了新兴科学的特点。然而，为了弄清新兴科学的含义，对新兴科学的特点作一番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

新兴科学的最显著的特点，首先表现在这些科学的“新兴”性质上。它们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研究新的对象，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新的知识，为人类改造世界提供新的武器。这是主流，是必须肯定的，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我们在认识新兴科学的这方面的特点时，也不应忘记新兴的东西还有其不成熟的一面。新兴科学诚然需要高扬，但更需要扶植和完善，只言其美而不揭其短，并不是我们对待新兴科学的正确态度。应当清醒地看到，所谓新兴科学，从总的来说也就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科学，即使不少学科都有标志其形成的专门著作，然而一门科学的形成是需要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归根

结底，一门科学的形成，要视其对社会实践的作用及其得到社会公认的程度而定。只有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社会的公认，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教育中普遍地列为必修课程或设置了相应的专业，才可以看作该门科学已经形成。在科学史上，某个新学科提出时名噪一时，不久则消声匿迹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当然，某个新学科提出时遭到群起而攻之，后来却在科学之林中傲然挺立者也是为数不少的。从现在已经提出的众多新兴科学来看，除少数已经比较成熟并得到公认外，多数仍存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激烈论争。例如未来学，一方面表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些未来学家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应当估计到，已经提出的学科将来可能有的会被淘汰，已经提出的理论将来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出现这些情况都不奇怪，其实，这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认识新兴科学的这一特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告诉我们，对于新兴科学的理论，重要的不在于当作已经成熟的知识来接受，而在于当作可以研究的课题来探讨。作为正在形成之中的新兴科学，只想现成地接受知识是做不到的。比如行为科学，其理论就有X理论、Y理论、超Y理论、Z理论、需要梯级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理论、社会比较理论、行为改造论、情境理论、影响决定论等一、二十种，这些理论之间既有思想一致之处，也有不少互相矛盾的地方，怎么可能现成地都加以接受呢！如果我们抱着探索的、研究的态度去对待，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已经提出的理论，我们可以鉴别取舍，补充丰富，也可以提出新理论，可以创造。比如人才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就是近年来在我国创造的，现已引起世界上的重视。所以，探索、研究、创新，这才是我们对待新兴科学的正确态度。

新兴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综合性，即各门新兴科学都体现着学科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所谓分化就是一个学科分出许多分支。所谓综合，就是一个学科的内容体现着各门科学的一体化。

这个特点，要求我们在学习和掌握新兴科学的时候，就要尽量拓广自己的知识面。哲学、数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其它各门新兴科学，都要求我们要有所了解，要有一定的研究。研究新

兴科学，知识面窄了是不行的，当然，要同时掌握每一门科学的高深理论也是难于做到的。但应当要求在一、二门学科上较有专长而又一般地了解其它各门科学的知识，做这种有专长的通才不仅是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新兴科学的特点要求我们形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的知识结构。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个人的努力，更要从整个教育体系结构上去进行必要的改革。

最后，新兴科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统一。在传统科学中，理论与科学的界限是比较清楚的。新兴科学则不同，它们往往既区别于高度抽象的理论科学，又与实用性的具体科学有所不同，二者的长处则兼而有之。它们的理论是应用的理论，它们的应用又是理论的应用。就每一门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或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表现得十分具体和实用，但其立论和论证又涉及一系列高深的理论。比如，系统科学从系统论方面来说是理论，从系统方法及系统工程方面来说是应用，而离开了系统论与系统方法则无系统科学可言。信息科学也是如此，信息论涉及许多高深的理论问题，而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则是有很强的应用性的。其它新兴科学也同样，都表现了理论与应用的统一。

认识新兴科学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统一的特点，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它告诉我们，当代进行科学研究，理论与应用都要兼顾。从理论方面来说，有意义的理论是能促进学科发展的理论；从应用方面来说，一门科学应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某方面的需要。这样，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我们就要注意从学科发展的需要与现代社会需要的结合点上去选题。这就改变了过去片面的纯理论研究或单纯考虑应用的倾向。而所谓学科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它还告诉我们，在学习新兴科学时，我们既要通过锻炼培养高度的抽象理论思维能力去掌握其理论方面，而在研究理论时又要有明确的应用目的。这是新兴科学的特点对我们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启迪。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新兴科学或许可以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了。所谓新兴科学，就是本世纪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在现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为其理论基础并具有明确的应用于现代化实践目的的综合性的科学。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与蔡馥生同志商榷

杨永华

如何联系实际，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关系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为此，我想就理论和实践的一些问题，对蔡馥生同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与卓炯同志商榷》一文提出商榷意见。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符合什么样的实际？

蔡文说：“就我国经济实际情况来看，说它是商品经济吗？但农村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是农民自己消费掉的，国防工业企业的军用物资，说它是商品也说不通，同谁交换，交换什么，这一矛盾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界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统一意见。”这里提出一个尖锐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和社会主义实际矛盾吗？什么是社会主义实际？

我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要符合的实际，第一，是指从总体上看的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某几个生产部门。如何检验我国经济生活总体是商品经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提供了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商品经济的再生产，首先把整个社会经济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其次把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为第Ⅰ部类，生活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存在着三种交换，也就是存在着三种市场，即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总的市场。三种交换三种市场是检验是不是商品经济的试金石，用这个观点来看我国经济实际，存在着三种交换三种市场，所以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诚然，蔡老所举的粮食生产和国防工业企业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问题是，这两个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多大，能否代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趋势又如何？据1984年《中国经济年鉴》统计资料，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1952年为56.9%，1978年为27.8%，1988年为88.9%；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1952年为83.1%，1978年为67.8%，1988年为62.2%；而粮食生产又是种植业中的一个部门，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又只占四分之三，可见，粮食自给性生产产值不会超过工农业总产值的15%。国防工业现在也积极参加民用品的生产，最近报道说民用生产已占了军工的六成，我们的火箭不是也开始投放国际市场吗？可以肯定，粮食自给性生产和国防工业企业生产绝不能代表国民经济的总体。问题还在于这种自给性生产还要加以改变，中央决定明确指出，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要向大规模的商

品生产转化。

第二，是指我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实际，而不是某一时点的经济实际。在这个时期中，工业生产，农业经济作物生产，林、牧、渔、副业等基本上是商品经济，而粮食生产的自给性生产只是暂时的，事实上正在向商品生产转化。余国耀同志在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写道：据统计，1982年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农副产品总额为855.6亿元，比上年增长11.9%，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5%，主要农副产品收购量大都比上年增加，粮食收购量7208.5万吨，增长14%。1984年《中国经济年鉴》说，1983年国家征收议购粮12208万吨，比1982年增长88%；山东省农副产品商品率达到50%，比1978年增长1倍多。可以肯定，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一定要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的。

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总体上和本质上，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确定社会主义生产的生产形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实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结构中，百分之一百是商品经济，容不得半点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而是意味着商品经济是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生产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特殊的以太。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什么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用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小块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就难免以偏概全。

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没有客观必然性？

蔡文说：“作为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全国人民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及其分配使用，应该是产品经济。”就是说，公有制=产品经济。又说：“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产品才是商品；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条件。……分工和私有制这两个条件，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我认为也不是社会分工，而是私有制。”就是说，商品经济和私有制同生共死。还说，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极低，为要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补上这一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这绝不是我们奋斗的最后目标，发展它是为着消灭它。”就是说，发展商品经济是权宜之计，这是蔡老的理论支点，其他看法都是从这三点衍化出来的。这三点中，商品经济私有制论是总根子。

商品经济私有制论的理论根据是什么？蔡老抄录了马克思这样一段话，“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把私人劳动等同于私有制。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值得作一些探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私人劳动范畴的有第55页，第73页，第82—88页，第89—92页，第112页，第133页共六处。恩格斯在《资本论》英译本序言中说，马克思使

用了许多新范畴术语，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为了方便读者，对这些新术语作了一些处理。私人劳动就是其中一例。私人劳动英文译为private labour，但有三处作了些处理。中文本第89页上的私人劳动译为“the labour of private individuals or groups of individuals”中文意为私人劳动和集体劳动，这是指劳动形式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中文本第112页上的私人劳动，英文本加了一个注，“labour for the account of private individuals”，中文意为私人个别计算的劳动，这是指劳动的决策，企业只为本单位利益决定劳动的投放，考虑企业本身利益不一定是私有制企业，所以和私有制没有直接联系。中文本第55页那段话英文为：“as result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labour, each being carried on independently and the account of private individuals.”中文意为独立进行的私人个别打算的劳动，没有私人劳动范畴。这三段英译文为理解私人劳动提供了启示，就是说，私人劳动不能等同于私有制，而是要从决策和劳动形式方面去考虑。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私人劳动作了定义式的说明。“各个私人劳动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的各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59页）这就是说，私人劳动是指在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各个个别企业在产品上消耗的具体劳动。

由此得出结论，私人劳动不是私有制，而是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的真正含义，就是指发达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55页那段关于商品经济条件的话，真实含义是指：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条件，但是古代印度公社内部不发达的分工不是商品经济的条件，只有发达的社会分工才是商品经济的条件。这样的含义，马克思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商品作为产品的必要形式，从而产品转让作为占有产品的必要形式，要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6页）又说：“交换者生产交换价值的前提是，不仅先要有一般的分工，而且要有特殊发达形式的分工。例如，在秘鲁也有分工；在自给自足的小小的印度公社中也有分工。但这是这样一种分工，它的前提不仅不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相反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的共同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6页）由此可见，把马克思的发达的社会分工的环节的私人劳动看成私有制，从而得出商品经济私有制论或商品经济二元论，纯属误解。现在既然已经解开了私人劳动之谜，私有制论和二元论应该终结了，还其社会分工论的应有地位。

假如我们承认商品经济私有制论，那么，社会主义应该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本身不成立。因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占绝对优势。

假如我们承认商品经济私有制论，那么，社会主义必然要消灭商品经济。既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条件，那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发展私有制；而发展私有制是和社会主义方向背道而驰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能消灭或限制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半个多世

纪的丰富经验教训证明，消灭商品经济将会把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由于没有树立彻底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在不断折腾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结束了这种折腾史，放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总结，郑重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标志着我们党从消灭商品经济转移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战略思想的大转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在生气勃勃地成长着，发展着。

只要认为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不管把消灭的日期推到多么遥远，就会把发展商品经济终归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党采取的一系列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也是权宜之计。我们党正在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正在实行的对外开放，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显然不能把这一切看作是权宜之计。所以，承认商品经济私有制论是不对的。

只有承认社会分工论，才可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说：“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社会分工造成了个人劳动的片面性和个人需要的多方面性，这对矛盾通过商品交换，劳动转化为价值的途径得到解决。“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24—125页）社会分工必然形成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发达的社会分工，社会主义必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同生共死。商品经济会不会消亡，就看社会分工能不能消亡；社会分工不消亡，商品经济就不可能消亡。

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但不矛盾，而且，社会分工还是公有制的物质基础。社会分工产生了个人劳动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这种独立性是私人利益和私有制的物质基础，当独立性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便形成私有制。社会分工和商品货币侵入原始共同体，便分化出一群群私有者。随着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扩大商品经济，劳动独立性占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过渡到劳动社会依赖性占主导地位，形成了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矛盾，这对矛盾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唯一的途径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公有制的物质基础。商品经济和公有制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双重结果。商品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异物，而是客观必然的产物。

承认社会分工论，就可以找到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途径。只有发展社会分工，才能发展商品经济。这几年，农村中大量专业户的涌现，耕地进一步向种地能手集中，这是社会分工发展的重要标志，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工业上，鼓励专业化向横向协作的发展，承认国营企业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减少直接控制，发展间接控制，这一切措施都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必将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发展商品经济，没有必要在所有制问题上无休止的做文章，因为商品经济在各种所有制下都能发展，应把注意力从变革所有制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面来。

三、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破除产品经济论？

蔡文说：“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不管商品经济或产品经济，谁也破除不了它们，消灭不了它们；突破也不行。眼前需要我们去破除和突破的是《决定》所指出的那种僵化模式的经济体制。”产品经济和僵化模式的经济体制是什么关系？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破除产品经济？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研究。

所谓自然经济？孙冶方有一个说明，“社会财富就直接以一大堆使用价值的面貌出现，产品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劳动也不再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性，价格，利润，生产价格等等，从价值派生出来的经济范畴更是不会存在。”（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27页）就是说，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一样，否认商品、否认价值、否认市场等一系列商品经济范畴。典型的自然经济是一个个孤立的的生产单位，他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而不存在商品经济范畴。产品经济则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之上，否认企业之间横向的交换关系，实行纵向的行政联系，物资调拨代替了商品流通，无偿或近似于无偿代替了价值规律，同样否认了商品经济的一系列范畴。

以产品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称为产品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财政体制方面是无偿拨款；在物资体制方面是产品调拨而不是商品流通；在企业体制方面是财政统收统支，企业无权无责；在工资体制方面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计划体制方面是自上而下，集中过死和主观主义；在商业体制方面是统购包销，行政层次和行政区划；在金融体制方面是以财政拨款为主，不能充分发挥银行的骨干作用。《决定》指出的僵化模式的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决定》所指出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就是产品经济体制。所以，把产品经济理论和《决定》指出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对立起来是没有证据的。

最近，赵紫阳总理指出：要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体系，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亦包括：①生活资料市场，②生产资料市场，③资金市场，④技术市场，⑤劳务市场即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这样，已经大大地突破了斯大林的产品经济理论体系。斯大林只承认生活资料市场，否定生产资料是商品，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了这是错误的。而斯大林错误

的理论根源在于不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在于产品经济理论体系。可见，不突破产品经济理论、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新的经济体制建立不起来。

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是新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华就是 $C+V+M$ 。这是全部经济生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如果忽视了 $C+V+M$ ，就等于抛弃了马克思经济理论。 $C+V+M$ 在不同经济层次上有不同含义。在劳动一般层次上就是：

物化劳动（ C ）+必要劳动（ V ）+剩余劳动（ M ）在商品经济一般层次上就是：

不变资金（ C ）+可变资金（ V ）+剩余价值（ M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层次上就是：

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无偿占有价值（ M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层次上就是：

不变社本（ C ）+可变社本（ V ）+公共必要价值（ M ）改革价格体系，就是要使价格符合 $C+V+M$ 的要求。符合 $C+V+M$ 的价格是合理的价格，不符合 $C+V+M$ 的价格是不合理的价格。产品经济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也就是使生产资料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所谓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是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所谓工业品内部比价不合理，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就是某些产品的价格高于价值、某些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价格和价值相符合是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只有价格和价值相符才能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是逐步形成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关键。价格、价值和价值规律等范畴是商品经济范畴。新的经济体制是根据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新的经济体制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产品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是两个系列的范畴。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经济理论是设计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经济体制是经济理论的制度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可以划分为产品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两大派，经济体制也就划分为产品经济体制和商品经济体制两大类。产品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产品经济体制和商品经济体制是对立的两组范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从总体上和本质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而不是一部分是商品经济，另一部分是产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就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全局。只有建立完整的商品经济体制，商品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就是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就是对产品经济理论的突破，商品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对产品经济体制的突破。所以，发展产品经济，必须突破产品经济论；建立商品经济体制，必须破除产品经济体制。

1985年11月

我国财政——银行体制改革初探

郑炎潮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解决在资金管理上的财政统收统支以及银行的供给制，就不能根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通病——“投资饥饿症”，就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不足、投资效益差等重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既要为工资改革、价格改革的出台鸣锣开道，更要为财政——银行体制这个最关键性的改革的出台作好理论上的准备和实践上的探索。我们应当总结国内外在资金管理上的经验教训，既要总结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资金管理的实践，又要吸取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资金管理的长处，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金管理体制。

财政——银行在现代商品经济中的功能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要想建立一个既能使宏观得到控制又能使微观充分搞活的资金管理体制，既不能离开银行去孤立地研究财政体制，也不能离开财政去孤立地研究银行体制，而应把财政、银行作为整个社会资金管理体制这个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去统一地进行考察。

作为资金管理，主要是资金的筹集与分配。在现代商品经济中，财政、银行都具有筹集资金与分配资金的职能，并且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政策，去交替地控制、调节储蓄、投资，以及治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自凯恩斯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已越来越看到，单靠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银行政策）是无法控制、调节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的了，必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者的结合，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中，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是靠“无形之手”——市场，而筹集与分配社会资金又主要是通过资金、资本市场，即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

随着商品经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国家日益作为社会经济的中心出现，去干预、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并通过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筹集和分配一部份社会资金，控制经济的宏观运行。这样，现代商品经济运动中的资金管理体制，就由自由竞争时期的“单轨制”——银行，变成现在的“双轨制”——财政与银行统一的体制。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运动中，旧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自然——产品经济基础上的，

社会资金的筹集与分配主要是由财政实行统收统支。这种财政渠道的资金管理体制虽然在宏观上也能控制资金的投放与回收,但是在微观上却使企业失去了活力,使整个资金管理体制呈现出僵化的状况。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改革,越来越从理论上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发展货币经济,即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控制、调节社会资金中的神经中枢作用。

其实,无论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财政和银行都具有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的功能和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两者的功能和作用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区别之处,既不能一个代替一个,也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一般地来讲,银行主要是对企业单位及社会的资金进行筹集和分配,去参与物质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所以,要想从微观上搞活经济,就必须建立以银行为主体的资金管理体制;财政主要是对国家直接控制的一些大型的、长期的建设项目及事业性单位的资金进行筹集和分配。

纵观国内外的资金管理体制的沿革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控制、调节社会资金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主要是靠财政政策与银行政策。我国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创建一个使资金的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能协调一致的,即使财政——银行统一的资金管理体制。

创建财政——银行统一体制的突破口

我国现行资金管理体制的根本弊病在于企业吃国家资金的大锅饭。所以,要建立适应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资金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打破企业吃国家资金大锅饭的局面。为此,我们应从理论上和政策上突破企业的自有资金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企业这一传统观念,这是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财政——银行体制的突破口,也是我们要搞活企业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在理论上已承认了资金(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这就初步为国营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承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再生和转化的。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息资本的所有权是借贷资本家的,但是,一旦现实资本家利用借贷资本经营,向借贷资本家还清本息后,剩下一部份的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归现实资本家的了,这就是资金所有权的再生及转化。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条件下也应如此。企业通过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利用国家或社会资金进行经营,依照法人的地位向国家或银行缴纳完税和还清本息后,剩下一部份利润(企业自有资金)的所有权,理所当然是归企业所有。但是,目前我们在理论上以及政策上仍认为企业对自有资金只有使用权,而所有权是国家的。这就使企业对自有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失去主人翁的负责精神,在对自有资金使用的具体分配上,扩大消费基金以及奖励基金的比例,减少生产基金的比例。在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上,使企业只依仰于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而不愿

用更多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这既造成消费基金和信贷膨胀，也使企业失去自我积累和自我增殖的能力和活力。所以，不解决企业对自有资金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的财政政策，搞活企业这个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抓而不紧。

我们只有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突破了企业自有资金的所有权不是企业而是国家的这个禁区，才能使我国的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即财政——银行体制改革）有重大的突破，才能使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才能使企业具有自我积累、积聚和自我增殖的能力。

如果企业的自有资金所有权是企业的，那么，企业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法人。企业对资金有了所有权，企业就有了自我积累、积聚和自我增殖的能力。这样，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就可以根据企业拥有自有资金的数量以及自我积累、积聚的能力来考虑是否贷款和贷出的数量。如果企业对自有资金有了所有权，我们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设计中国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企业的固定资产可以由国家、企业、职工以及社会共同投资；各种投资的比例，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大小以及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来决定；当企业向银行贷款或社会集资进行扩大再生产时，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自有资金以及具有一定的增殖能力；各方投资的资金按规定进行付息和分红，投资的利息和红利一律归投资者所有；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力量偿还各方投资的本息，本息还清后，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全部归企业；企业可以把本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本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也可以对其他企业进行投资；银行可以以借贷者的身份把资金贷给企业，也可以以投资者的身份把资金投入企业的固定资产；财政可以通过投资的形式参与企业的投资，也可以通过贷款的形式去扶植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破现行的只有国家积累资金、财政参与投资的单一的资金管理体制，而形成一个国家、企业、个人以及财政、银行共同积累资金、筹集资金、参与投资的多渠道的生财、聚财、用财的资金管理体制。

承认企业对自有资金拥有所有权，这是医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投资饥饿症”的良好药方。由于企业自有资金的所有权不属企业，经营上的盈、亏都不能触及企业的命运、前途，企业不用承担也无法承担任何经济风险，这就使企业随意伸手向国家要资金、要设备，随时向银行贷款。企业的自有资金所有权是企业的，这就同企业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企业经营有方，盈利了，企业就拥有较多的资金；亏损了，企业就要用自有资金上交税收，偿还贷款，企业的积累就减少。这样，投资者就要承担投资风险和经济责任，就不会吃国家资金的大锅饭，就会把现行的“软”的财政——银行体制变成“硬”的了。

同时，承认自有资金的所有权是企业的，可以使企业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地安排自有资金的分配使用，减少近期消费基金和奖励基金的比例，扩大生产基金的比例，以谋求长远利益，这样也有利于从微观上控制消费基金的过份增长。

总之，企业的自有资金所有权问题，是财政与银行统一体制在资金的微观管理上要

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突破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微观上创建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体制，并在这基础上创建一个宏观的财政——银行统一的资金管理体制。

财政、银行的分离与协调统一

财政——银行统一的资金管理体制其含义有二：其一，财政与银行是分离的；其二，财政、银行是协调统一的。

我国传统的资金管理体制，由于是建立在自然——产品经济基础上的，不以盈利作为其经济目的，便以“大财政、小银行”作为其主体，这实际上不是把银行作为一个盈利性的经济组织，而是把其作为财政的出纳、会计。所以，我国财政——银行体制改革，首先要把银行与财政彻底分离，使银行变成为一个盈利性的企业组织。

为了使财政与银行真正分离，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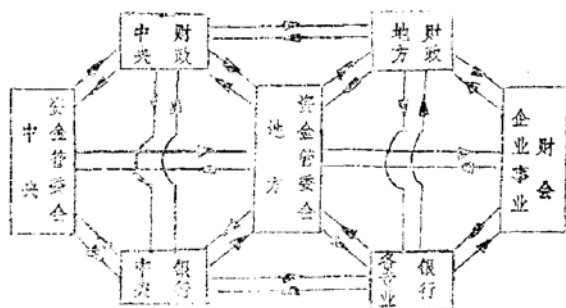
在组织结构上，银行不应归属财政管理，国务院可以成立一个资金管理委员会，下设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使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成为两个并列的平等机构，直属国务院。财政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不应有任何的行政隶属关系，而只存在经济关系。在业务结构上，银行只作为一个经济法人向财政按经济法规定上缴税收，而银行的盈利不上交财政，亏损不得由财政补贴；当财政资金短缺时，不能不付利息地动用银行资金，向银行透支，只能以借贷关系向银行贷款。财政的收入存入银行，按银行规定获得利息，而不能象传统那样作为非信贷资金。由财政预算拨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不再与建行或其他银行发生直接的调拨关系，而应作为一种专项基金存入中央银行，由银行通过信贷关系作为专项投资贷出。在职能结构上，国家财政只负担基础设施、社会公共设施及公共事业建设；而企业所用资金由银行去调度，财政不直接参与，这样才能使企业真正从行政上摆脱对国家的依附关系，而从经济上加强同银行的信贷关系。总之，财政与银行在组织结构上、业务结构上，职能结构上的分离与独立，是我国财政——银行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我们必须下决心致力解决。

财政、银行的分离只不过是从这两者是作为资金管理体制这个大系统内的两个独立的子系统而言。但是，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所以，作为中国式统一的资金管理体制，除了让财政与银行分离与独立外，还要使两者有机地协调、统一去控制调节社会资金的运动。

随着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以实物管理为主转为以价值管理为主，银行控制、调节社会经济的作用，即筹集、分配社会资金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财政筹集、分配社会资金的范围和职能有所削弱。这样，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式的资金管理体制应是“大银行、小财政”的体制，或者是以银行为主、财政为辅的体制。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传统的“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或是“大银行、小财政”体制，都无法平衡、协调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我们应选择财政与银行并重的并且是一体化的资金管

理体制模式。

财政与银行并重和一体化模式，主要在于让财政、银行统一从宏观的角度去平衡社会资金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社会经济运动的一切资金都是通过财政及银行这两条渠道流出或流入，并且资金的流动方向及流量大小都是通过财政和银行去控制调节。如果财政、银行这两个控制机构不协调，或者是片面地放松或收缩财政，或者是片面地放松或收缩银根，都会使社会总资金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当采取放松或紧缩的财政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会对银行货币的投放及回笼带来什么效果，从而采取相应的能使社会资金供需平衡的货币政策；同样，当采取放松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会对财政的收入及支出产生什么影响，从而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所以，中国式的统一的财政——银行体制，既要使财政、银行成为两个独立的机构组织，又要从中央到各级地方都要建立一个使财政、银行能协调统一的资金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委员会）。这种统一的资金管理体制模式可以设想如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财政与银行既是平等互相独立的，又是由各级资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两个系统，并且两者之间又可以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样，财政、银行以及中央、地方、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型的资金管理体制，就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上去平衡、协调社会资金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了。

从图中可以看出，财政与银行既是平等互相独立的，又是由各级资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两个系统，并且两者之间又可以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样，财政、银行以及中央、地方、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型的资金管理体制，就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上去平衡、协调社会资金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了。

统一的财政——银行体制，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是使财政、银行共同参与固定资产的投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传统的只靠财政拨款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是无法使经济搞活的了。但如果只让银行去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也很难从宏观上去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方向和速度。要想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既能使宏观控制又能使微观搞活，比较好的抉择，是建立财政——银行一体化的投资模式。投资基金的来源由财政、银行共同解决。财政根据国家（地方）预算及计划的安排，把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财政开支作为投资信贷基金存入中央银行或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银行；银行再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准备基金的状况、国家（地方）的中、长期计划以及社会的需求，制订出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货币政策，把资金贷给有关项目或直接参与投资。这样，就将传统的由财政直接拨款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变成由财政通过银行，并且是财政——银行共同投资的方式。

财政与银行统一的资金管理体制，还要求财政与银行共同决定积累与消费的最佳比例、社会总货币流通量、社会总生产及总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以及工资、物价的增长速度等。

略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关其学

赵紫阳总理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对我国“七五”计划建议作说明时指出：“‘七五’计划能否实现的又一个关键，是要创造更多的外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充分说明对外贸易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近一两年来，发展速度不快，广东的对外贸易还出现徘徊局面，很不适应生产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问题，有出口商品结构问题，但是就当前来说，仍然是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束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更好地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建立合理的外贸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改革外贸体制应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作为理论基础

改革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对外贸易本身各个环节，又涉及到计划、价格、财政，外汇管理，信贷等方面体制的改革，需要相互配套和协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明确包括外贸体制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必须解决好发展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问题。

解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有计划的产品经济论。这是排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有计划的产品经济论在对外贸易上的表现主要有：

第一，把对外贸易的作用只看成是我国与别国在产品交换上的互通有无，而不是把对外贸易看成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因而把着眼点放在产品的使用价值上，而不重视商品的价值和经济效益。其结果是换汇成本高，卖价低，长期亏损。从广东省来说，外贸亏损早已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财政负担越重，因而财政负担能力已经成为制约外贸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二，在外贸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上政企不分，以政代企，无论出口商品的生产企业还是经营外贸的公司，都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缺乏压力，动力和活力。严重压抑生产企业、外贸公司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强调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而且把国家垄断片面理解为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一家垄断，不仅企业是政府机构手上的算盘珠，而且地方缺乏外贸进出口的自主权，使本来

应该是生机盎然的对外贸易工作搞得毫无生气。

第四，外贸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单一的指令性计划机制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且在处理这个矛盾时，不是努力使外贸出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去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而实际上是企图让国际市场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漠视国际市场信息，不重视商品质量的提高和花色品种的更新换代，不计成本，低价求销，对外经济贸易的经济效益很小。

第五，排斥价值规律，不重视价格的调整 and 改革。有计划的产品经济论只强调对外贸易的计划性，不承认对外贸易的商品性，因而根本不承认价值规律对进出口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的调节作用，尽管不合理的价格因素已经明显地影响到对外贸易的发展，仍然等闲视之。比如，目前出口商品的内销价格高于外贸收购价格，国内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脱节的问题，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从理论根源上说，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仍然具有调节作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这是《决定》在理论上最重要的突破。因此，改革外贸体制，就有一个转轨问题，即由以有计划的产品经济为轨道转移到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轨道上来。按照这个要求去改革外贸体制，就不仅要彻底抛弃原有的僵化模式，而且在理论基础上也要求一个根本的转变，坚决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为指导，决不能在原有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之后，我国也提出了改革外贸体制的原则，主要是三条：（1）实行政企分开，使外贸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2）外贸进出口实行代理制，把出口盈亏的责任逐步放到生产企业；（3）实行工贸结合和技贸结合。从总的方面说来，这三项原则是符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的，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我认为外贸体制改革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首先，从外贸体制本身来说，如何做到把统一计划，统一政策，联合对外的要求，同发挥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外贸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在对外贸易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据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要求如何改革外贸体制？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其次，计划、价格、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如何与外贸体制改革相协调，同样需要研究解决。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之后，各方面的管理体制都在着手进行改革，这对于正确处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还处在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中的新旧因素并存，并未完全转移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因而在生产建设中出了一些新的矛盾。就外贸体制改革来说，有一部分企业虽然被批准自营出口，但由于改革不协调和不配套，自主权并未完全落实，还难以开展出口业务。广州罐

头厂被批准经营外贸之后，有了产品出口权，可以开展外贸业务，但是，由于商标和外贸补亏问题、周转外汇问题等没有及时解决，致使产品在一段时间内出不去，造成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至于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问题同样需要进一步落实。

二、改革外贸体制的关键是要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

改革外贸体制涉及到的问题很多，需要抓住并解决关键问题。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改革外贸体制的关键是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因为对外贸易是属于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国内商品流通在国际上的延伸。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原理，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中，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流通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可见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否定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不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缺乏应有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在商品出口业务中，外贸部门按照一定的价格向生产企业收购产品，然后组织出口，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按照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来进行，企业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对花色品种和质量有何具体要求，产品价格若干，换汇成本多少，等等，企业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往往造成产销严重脱节，更为严重的是，出口商品多少，盈亏状况如何，同企业的经济利益基本上无关，作为生产企业，实际上是奉命生产，奉命出口。总之，发展对外贸易，对生产企业来说，无论责，权，利都不落实，根本谈不上扩大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长期以来对外贸易发展不快，经济效益比较差的症结所在。

从以上情况看来，改革外贸体制应重点研究如何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中共中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进一步确定增强企业活力是“七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把应该赋予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真正放给企业，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任务，给企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以更大的自主权。同时，要完善微观经济活动机制，使企业对自己的经营状况真正承担责任。这些，都是从责权利相结合上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积极性的重要基础。但是，从改革外贸体制、促进出口创汇扩大的要求来看，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采取恰当的形式，发挥工贸结合的优越性。工贸结合有利于发挥生产和流通分工协作的作用，工贸结合的形式有赖于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完善。目前，已有一部分生产企业取得了经营外贸的自主权，这部分企业可以在内部把出口商品的生产权和经营权有机地结合起来，被置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中。在对外贸易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真正把对外贸易的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产品的出口销售额。广州绢麻厂是自营出口企业的先进典型。该厂自1982年实行自营出口体制以来，产品出口创汇大幅度增长。直接经营对外贸易的第一年，即1982年，出口创汇747.98万美元，为1981年的275.68%，1983年出口创汇1668.16万美元，为1982年的223%，

1984年出口创汇2239万美元，为1983年的184%。1984年，全厂工业总产值9123万元，上缴国家税利2543万元，比实行自营出口的第一年，即1982年增长54%。广州绢麻纺织厂的事例说明，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是工贸结合的比较好的形式。

近一年来，不少企业获得了经营对外贸易的自主权。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多方面的管理体制改革尚不协调，致使不少自营外贸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仍然碰到不少困难。首先是市场情况不明，客户不清，销售工作困难较大，其次是周转外汇严重不足。自营出口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需要较多的外汇进行周转。由于自营出口业务刚刚开展，留成外汇不足以满足周转的需要。再次，外贸补亏问题难以解决。自营出口企业要自负盈亏，但业务开展初期，亏损问题靠自身尚难以解决，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而影响对外贸易的开展。最后，由于生产企业的产品长期交由外贸部门出口，本身缺乏经营外贸经验，人才不足，也会增加工作中的困难。上述这些均属于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矛盾，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决不能因为碰到困难和问题便畏缩不前，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工贸结合这种形式的作用而走回头路。

工贸联营兴办企业也是工贸结合的一种较好的形式。这种形式把生产企业和外贸部门的责权利直接结合起来，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因而有利于发挥生产和流通的优势，共同为增强出口创汇能力而努力，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广东省东莞县附铜板厂，引进外资700万美元，国内配套人民币400万元，在全部投资中省外贸部门占40%，东莞县电子公司占25%，香港福美公司占25%，AVA有限公司占10%，计划1986年投产，年产附铜板66万平方米，产值6,850万元，全部产品中70%由省外贸部门负责组织出口。计划投产两年后便可收回投资。这种形式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又有利于扩大出口创汇。

由外贸部门兴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也是工贸结合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有利于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加工出口产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外贸商品生产基地仍然要具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外贸部门要尊重和维护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总之，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处理外贸公司与生产基地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兼顾双方的利益。

第二，承认出口商品生产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别性，使出口商品生产企业从经济利益上关心出口创汇的扩大。与生产内销产品的企业相比较，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具有如下的特点：（1）市场不同。生产出口商品企业面向的国际市场，要求高，变化大，竞争激烈。（2）价格不同。出口商品不仅受国内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调节，更重要的是受国际市场上价值规律的调节，有必要把国内必要劳动时间国际劳动平均单位进行比较。为了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必须革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使换汇成本不断降低。（3）出口商品要求质量高，花色品种变化快，应变能力强，以便及时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挤进国际市场。（4）为了保证出口商品的质量，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仅要求原材料及时供应，而且要求原材料的质量较高，因而在采购原材料上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成本有可能因此而提高。（5）与上述要

求相适应，生产企业必须及时掌握国际市场商品供求关系和价格方面的信息，并且要根据市场信息及时安排生产。这就要求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有较高的素质。相应地，企业的干部和工人素质，技术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也要不断提高。

出口商品生产企业与内销产品生产企业是有区别的，我们在政策措施上应该体现这种差别，要从外部创造条件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增强它们出口创汇的能力。比如，在财政上划出一定资金作为鼓励企业出口的专用基金，其中对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企业尤应给予奖励；通过减征调节税，增殖税，中间环节税等途径以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银行以低息贷款形式给企业作为技术改造基金；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行出口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等等。

价格问题是目前妨碍出口扩大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内外销商品价格的差异。内销商品收购价格高，外贸出口收购价格低，违反价值规律，许多生产企业不愿把产品交售给外贸部门出口，严重影响出口的货源。比如饼干每担内销价为120元，而外贸收购价仅为96元，相当于内销价的80%。中山市生产的生抽酱油内销价每斤为0.82元，外贸收购价为0.21元，相当于内销价的65.6%。不少企业反映外贸收购越多则亏损越大。为了扩大出口货源，必须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其次，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脱钩，影响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的开展。如从国际市场上布料价格比较便宜，但进口后按国内规定订价则价格上升很多，致使服装换汇成本高，造成出口亏损，影响服装出口。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如不改革，必将严重障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国内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明显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完全脱钩。理由是避免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波动对我国商品价格的影响，特别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另一种意见是主张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理由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流通，不仅在国内受价值规律调节，而且受国际市场上商品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商品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的影响，进出口贸易更是如此。因此，为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研究对外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国内商品价格应与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挂起钩来。我基本上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是，事情切忌一刀切。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分别确定挂钩的范围和程度。因为人为地从价格上割断了我国经济同国际市场的客观联系，是违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要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除生产企业外，还有外贸企业。这类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各级外贸公司实际上是一个行政机构，经营外贸不负盈亏责任，责权利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外贸体制改革中实行政企分开，就必须把外贸公司办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把外贸经营中的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在处理统一领导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

关系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在外贸管理体制中如何把国家的统一领导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处理上述关系中，下列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一）关于外汇分成比例和外汇留成问题

外汇分成比例直接牵涉到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必须正确处理。目前在外汇分成中中央拿大头，以保证全局性的生产建设需要，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是按照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留成比例，比如一般省市自治区留成比例比较低，山区留成比例高些，经济特区留成比例最高。这是为了照顾不同地区生产建设对外汇的需要，特别是鼓励经济特区向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可是实践证明，这种有差别的地区外汇分成比例带来的问题较多。主要是分成比例高的地区到分成低的地区高价收购工农业品出口，轮番抬价收购，致使换汇成本增高，特别是造成地区之间在对外贸易上的矛盾比较大。有的同志主张取消目前按地区的差别外汇分成，各个地区均按同一比例分成，对山区和经济特区，可由中央列出专项外汇给予补助。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值得考虑的。

目前在外汇留成中的，一是企业留成比例比较小，目前广东一般是留成15%；二是不落实。不少企业反映根本得不到15%的留成外汇，原因是市、县统一掌握使用。前面已经指出，扩大出口创汇的基础在于企业，如果企业不能从出口创汇中得到相应的利益，积极性就难以调动。在目前外汇难以融通的情况下，即使有些企业得到按规定留成的外汇，也由于数量不多，用处不大，名义上有留成额度，但不能在生产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统一按15%的比例把外汇留给生产企业的规定是值得研究的。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我认为应该发挥留成外汇的杠杆作用，可以考虑按产品和按开拓市场的情况不同来确定不同的留成比例。对于开发新的出口产品扩大市场的留成比例应该大些。鉴于目前我国，特别是广东的产品出口较多地集中在港澳市场的情况，在留成比例上应鼓励一些企业和地方去开拓欧美等新市场。对于确实能开拓新市场的企业，外汇留成比例应该大些。此外，还可以考虑按出口创汇额累进办法来计算外汇留成比例，企业创汇越多，留成比例越大。以上办法，既使企业从扩大出口创汇中得到好处，又使国家收汇不断增多。因此，无论从微观还是从宏观来考察，经济效益将会不断提高。

在外汇留成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即究竟采取额度留成还是采取现汇留成好一些？我国目前是采用额度留成的办法，这实际上是给予企业能够使用外汇的指标，需要用汇时还须凭额度用人民币到中国银行买成现汇。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光管外汇的使用额度是比较简便的，但是，从管理与使用相结合的观点看来，则目前外汇的额度留成办法需要改变，即把额度留成改为现汇留成。采取这种办法时，企业则要把银行计划拨给自己的留成外汇用人民币买成现汇，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币存款，企业需要使用这笔现汇

时，由外汇管理部门根据进口许可证或有关批件审查批准。现汇留成同额度留成相比较，具有额度留成不可能有的作用：一是留成外汇真正成为企业的一笔资产，有利于调动企业创汇和用汇的积极性。同时，企业还可以从外汇存款中得到利息收入。二是现汇留成作为银行吸收的一笔外币存款，可以用贷款方式贷放出去，满足生产建设对外汇的需要，本身就发挥了外汇融通的作用。

（二）关于开放外汇调剂市场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点问题之一，是进一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在这个市场体系中包括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等。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加强外汇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目前“集中管理，统一经营”的外汇体制无法解决外汇的调剂问题，以致黑市外汇交易大量存在。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有投机者插手其间企图牟取暴利，但却也反映了外汇融通的必要。与其让黑市交易大量存在，不如变非法为合法，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管理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外汇调剂市场，可在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建立外汇交易所。促使企业和地方在对外经济贸易互相调剂外汇，以调动企业和地方扩大出口创汇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于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政策和具体办法，可以进一步研究确定。

（三）关于出口配额的管理和使用问题

实行出口配额制时，必须正确处理统一计划，联合对外与发挥各地方，各企业积极性之间的矛盾。出口配额管理是对外贸易计划管理的内容之一。出口配额之所以必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出口鲜活商品的市场主要在港澳，而一定时间内港澳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为了避免商品盲目涌进港澳市场，自相削价竞争，因而需要对出口商品，特别是鲜活商品实行配额管理。二是某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一些出口产品实行配额限制。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进行配额管理，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和切块分配，往往同真实的需要不相符合，争配额的现象十分严重。看来有必要在出口配额的管理和分配上，由行政手段为主改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在国家规定产品出口配额的条件下，采取分配与出售相结合，而以出售为主的配额管理办法。分配出口配额是要考虑到历史因素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考核商品的品种质量，换汇成本和竞争能力等。配额出售可采取投标方式进行，出最高价格者中标，得到一定的出口配额，要支付相应的外汇。各地区出售配额的收入，等于企业上缴的外汇。分配配额部分也要同上交外汇的任务结合起来。采取上述办法，可以避免争配额现象的发生。同时，驱使各地方、部门和企业认真考虑出口商品的售价，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适销对路，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总之，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

1985年10月于华工社科系

关于初级产品价格改革与 加工企业消化能力问题

赖智勇

我国价格体系改革的任务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二是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等，三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我认为，根据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需要，我国改革价格体系的首要一步，应是工业品、主要是初级工业品价格的改革。从这方面入手改革价格体系，有利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一、改革初级产品价格是当前 价格改革的首要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价格体系和管理办法不断作了一些调整改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议购议销价格范围；放开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价格；部分商品实行浮动价等等。广东省还在国家统一部署安排的基础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对本地生产的煤炭、钢材、生铁、焦炭、硫酸、烧碱等产品制定了比国家统一价高出较多的地方价格；三类日用工业品价格除列名管理的120种外，其余全部放开；采取超购加价、价外补贴等办法，加大了稻谷、糖蔗、黄红麻、木材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先后放开了蔬菜、生猪等价格。这一系列的调整改革，效果是明显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调整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还必须彻底改革整个价格体系，使价格体系结构性趋于合理。

在我国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三个主要方面中，初级产品价格严重不合理是相当突出的。矿产品、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严重偏低，与加工工业产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其主要标志是，企业的

盈利分配差距很大。据统计，以全国重工企业1983年的实际数为例，从资金利润率来看，全国平均为18.2%，其中采掘工业为12.09%，原材料加工业为25.85%，制造工业为14.37%，采掘与原材料加工相差1.14倍。各部门高于平均水平的有：冶金19.18%，电力21.18%，石油54.38%，化工29.58%。低于平均水平的有：煤炭2.79%，机械电子14.64%，建材17.76%，林业16.56%。相差最大的是石油，比煤炭高出18.5倍。其次是化工，比煤炭高出9.6倍。再从工资利润率来看，1983年全国平均为279%，各部门高于平均水平的是：冶金428%，电力1339%，石油加工1715%，化工475%。低于平均水平的是煤炭29%，建材140%，林业142%。相差最大的仍然是石油，比煤炭高出58倍。其次是电力，比煤炭高出45倍。数字说明，我国初级产品企业的利润率，基本上是偏低的，尤以煤炭为最厉害。因此，我国价格体系的改革，必须以工业品价格改革为重点，尤其要先行调整初级产品价格。

初级产品企业一般是短线低利部门，而随着计划，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地方投资权限的扩大，地方企业追求高额资金利润率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初级产品价格不彻底改革，必然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已经膨胀的加工企业，国家如果不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尽快调整初级产品价格使之合理，就可能会造成部门之间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从而迫使我们再次调整，或将已放开的重新收拢，再次走向集权。因此，将初级产品价格提到合理的水平，使短线产品的利润高一些，长线产品的利润低一些，以便于整个生产结构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国初级产品企业大多数仍处于技术落后状态，再加上产品价格长期偏低，

更是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更新改造，影响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的进行。因此，要把企业潜在的经济效益挖掘出来，合理调整初级产品价格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二、对于初级产品价格改革带来的影响，我国加工企业有较强的消化能力。

对于初级产品价格改革带来的影响，加工企业是否能够消化掉？当前比较普遍的担心是，在初级产品调整提高后，加工企业不是依靠大力降低消耗、降低成本等有效的办法在内部消化掉提价带来的影响，而是在产品价格上做文章，造成轮番提价，影响民心，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这种担心的主要理由是：我国加工企业的设备陈旧，技术装备落后，难以挖潜节约、降低消耗来化掉原材料提价的影响。在能源、原材料提价后，加工企业是不可能不提高产品价格的。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对于初级产品的提价、加工企业是有较大承受能力的，完全可以把大部分提价的影响在内部消化掉。加工企业不应把涨价作为增加收入、抵补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的途径。对于初级产品价格的提高，我国加工企业的消化能力主要在于：

第一，我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加工企业一般已有较高的利润率。

我们知道，提高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上升的时期，经济上升时期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加工企业的生产是迅速增长的，利润也不断增加。我国工农业总产值1979—1982年平均每年增长7.3%，1983年比上年增长10.2%，1984年比上年增长14.2%，增长幅度之大是过去少见的。1984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8.7%，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10.4%，实现利润和销售税金比上年增长10.5%，工业总产值增长10.6%，基本做到三者同步增长；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23%。在工业企业中，加工企业的资金利润率，1983年为25.85%，高于全国18.2%的平均水平，比采掘工业的12.29%高1.14倍。

在国民经济上升发展时期，尤其是加工企业

的利润率越来越增长的时期，改革初级产品价格，是最有利的时机。加工企业已经有了高利润垫底，完全可以抵销初级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

第二，加工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仍有较大的潜力。

要使加工企业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既不提高产品价格，又能保证利润率不降低，企业本身大力降低消耗、挖掘潜力，降低成本，是一个关键。这也是加工企业在初级产品价格提高后的主要出路。从我国目前加工企业的状况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绝大部分加工企业都有着降低成本的巨大潜力。就一般情况来说，目前我国许多加工企业的固定资产占用多，流动资金周转慢、物资积压严重；原材料、能源消耗高、浪费严重；产品的产量质量不稳定，残次废品多，损失严重。还有非生产性人员和非生产性开支多等等，都是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要解决这些问题（或部分解决这些问题），产品成本就能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起码会下降）。这样，初级产品价格的调整提高，对于绝大多数加工企业来说，其影响就会是微不足道的。

况且，由于初级产品价格是最最终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提高能源、原材料等的价格，必然会对后续各个加工环节的产品价格发生影响，特别是对那些消耗能源、原材料较多的部门和产品的价格影响更大，这又会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压力，迫使加工企业尽量节约使用能源和原材料，以降低成本，减少以至避免不利影响。

第三，由于实行开放政策，为加工企业提供了提高经济效益的良好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现有企业生产设备、技术进行有效改造、生产工艺实现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增加利润的有效途径。更为我国加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统计，几年来我国引进、利用外资金额是持续增长的，加工企业利用了外资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更是喜人。就广州来说，从1982年到1984年，进口用汇二亿四千五百多万美元，其中进口老企业技术改造所需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急需的短缺原材料、零部件，占74.4%。由于将引进的重点放在企业的技术改造

上,大大加快了广州市工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发展了一批新兴工业,并已开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据统计,这几年通过引进技术设备来促进技术改造,仅1985年上半年提供的产值就达到八亿六千五百多万元,占1985年上半年净增产值近一半。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下,由于企业逐步提高经济效益有了良好的条件,调整改革初级产品价格,加工企业是能够承受的。

第四,企业有了较大自主权,初步有了活力。

经过初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加工企业在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自主权。特别是价格的调整放开,使企业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如广东省,在价格方面,把原属中央管理订价的商品及地产地销的商品,放给了省自行确定购销价格。原属省管订价的产品,相当部分下放给业务主管部门或市、地、县物价部门定价。市县企业产品由当地物价部门或企业订价。三类日用工业品除列入管理范围的外,其余全部放开,直接下放给企业订价。目前全省统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从110种减少为6种。一、二类工业品计划收购的品种,从95种减为22种。选购、合同收购、代购代销和自由收购的比重不断扩大。

由于在生产方面特别是价格方面企业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使加工企业能够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灵活确定生产、经营对策,在竞争面前、在原材料价格调整提高而本身产品又不能提价的情况下,制定出既不依赖提价而又能参与市场竞争并取得较好效益的有效方案,以抵销初级产品价格调整带来的影响。

三、改革初级产品价格应坚持的原则。

改革初级产品价格,引起一些反应是不可避免,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尽量减少连锁反应,做到既不妨碍价格改革的进行,又不影响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我认为,在改革中要实行宏观控制,让微观自我调节。具体来说,应坚持如下几条原则:

1. 国家应控制初级产品提价的幅度。我国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偏低,是长期形成的。要把这个长期扭曲了的价格结构调整得比较合理,一次过彻底解决不大可能。一次过大幅度地调整初级产品价格,势必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

整。而我国的企业目前素质还很差,各个部门都有一定的亏损面,这是经不起大幅度调整的。如果初级产品价格提价幅度过大,最终将不利于经济稳定和财政增长。因此,在改革初级产品价格时,国家要控制提价的幅度。一次改革不尽合理,可通过二次、三次调整,使之合理,但每一次调整必须把调价的幅度控制在加工企业基本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如煤炭价格,据测算是由每吨20.98元提高到48.40元则可达到基本合理,就可考虑分两步走,第一步提50%,第二步再提50%,这样,对其他相关行业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2. 要处理好初级产品价格与加工企业产品价格的比价关系。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强调企业自我消化掉提价带来的影响,并不是说加工企业产品价格就绝对不能动。若这样,对于原来产品价格偏低的加工企业来说,是会带来很大打击的。在提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后,原来价格偏低的加工企业产品,也应允许有一定幅度提价。当然,这是要严格加以控制的。能够少动、不动的,就应尽量争取少动、不动,使国家不增加或少增加新的补贴。至于原来价格偏高的加工企业,在初级产品有一定控制幅度的提价后,其结果只会抵销或减少原来过高的利润,这部分加工企业产品价格,就坚决不能动。具体的做法是:①初级产品提价后,资金利润率仍在一般水平的加工产品,价格保持不动,其中某些价格偏高而销售困难的,还应降低价格。②初级产品提价后,只有微利或稍微有亏损的加工产品,应尽量维持现有的价格水平,个别的可通过减免税收的办法解决。③减免税收后仍亏损严重的产品,应允许提价,但提价幅度要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初级产品价格与加工企业产品价格的比价趋于合理。

3. 要促使加工企业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如前所述,提高经济效益,在我国的加工企业中还有很大潜力,把这些潜力进一步挖掘出来,是削弱和消除初级产品价格调整的不利影响,防止价格轮番上涨的有效措施。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寻找提高加工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企业设备该更新的更新,该引进的引进,加快速度改变落后的状况。特别是在价格上,要为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服务,要通过调整产品价格,使各类型企业得到大体平均的利润率,反过来促进产品产销平衡、适销对路,使加工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4. 在我国目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严重供

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改革初级产品价格，还必须与其他方面的因素配合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防止初级产品价格调整改革给市场物价带来大的波动。因此，在进行初级产品价格改革时，还必须要控制整个社会的货币发行量，努力增加市场商品供应，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与消费基金的盲目增长，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保持相适应，这样才能收到改革的效果。

5. 要加强物价的检查监督和管理。在价格调整改革的同时，加强物价的检查监督，是必要

的和有效的管理。改革初级产品价格，尤其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是保持国家对整个市场物价水平实行控制，防止个别企业乘改革之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危害消费者利益的有效措施。在初级产品价格调整改革后，各级物价部门应定期检查加工企业的产品价格，对于加工企业产品需要调整价格的，必须申报调价理由，由物价部门审批。对擅自提价，扰乱市场的，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我省《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由广东省《资本论》研究会召开的《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10月18日在广州市举行，来自广东省理论界的2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劳动价值论及其在当代的运用。

卓炯认为，在《资本论》体系中，劳动价值学说贯彻始终，必须高度重视劳动价值论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商品货币范畴，首先要把它当作劳动范畴而不是所有制范畴来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生产有一般性和特殊性，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私有制产生和灭亡都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经济主体和物质利益都应该包含在社会分工概念之内。经济范畴和经济概念都有一般和特殊二重性。

梁判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论，发达商品经济的共同点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普遍存在商品、货币及其相关的一系列范畴；企业必须是独立生产者，自主经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通过市场普遍发生作用；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劳动过程就是价值增殖过程；流通在再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产业、商业、信贷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互相渗透，连成一体。今天，《资本论》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对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谭湛明）

珠海特区建设的实践和认识

方 苞

试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的战略任务：一是发挥“四个窗口”和“两个辐射扇面”的作用；二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所；三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五年多来，我们珠海特区围绕所担负的战略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打基础的工作。

（一）初步建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特区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首先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聘请国内外专家对珠海特区可开发的十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城建总体规划，按“七通（通电、通电讯、通路、通航、通水、排污、排洪）一平（平整土地）”的要求搞好整体骨架工程，并划分为八个功能小区进行开发。每个小区有工业厂房、职工住宅和各种服务设施，根据需求和资金情况逐片开发。做到规划一片，开发一片，收益一片，力求做到投资省见效快。占地23万平方米的南山工业区从规划到基本竣工，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已建成专业厂房5间，标准工业厂房18栋，职工住宅24栋，仓库11栋以及一批服务设施，建筑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现在已有六、七个工厂投入生产。北岭、吉大、夏湾三个工业区正在建设中。我们特别重视抓好交通、能源、电讯的建设。交通方面：已建成为南油勘探服务的直升机场和同香港通航的九洲港，停泊万吨货轮的综合性深水码头1986年5月可投产使用。经济特区内骨干马路和广珠公路扩建工程正在紧张施工，1986年可以完工。能源方面：市内22万伏变电站和特区内11万伏变电站已经建成，集资6千万元人民币，投放到装机容量20万千瓦的韶关发电厂已收到效益，装机容量3.7万千瓦的四台柴油机组正在我市兴建，预计1986年6月可投产，届时，可完全满足投资者的用电要求。电讯方面：已拥有6千门程控数字和纵横制自动市话交换机，已开通港澳和全国十多个城市的直拨电话，1986年还将有2万门程控电话投入使用。此外，还建成了一批标准工业厂房、职工宿舍、商品楼宇和设施完备、服务良好的酒楼、宾馆、商场以及一批风景秀丽、各具特色的旅游度假胜地，据1980年至1985年11月统计，基建投资完成13.16亿元。竣工面积：202万平方米。经济特区的投资环境已初步改善。

（二）引进一批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发展外向型和代替型工业

据1979年至1985年11月统计，共签订引进外资合同1678项，协议投资总额16.87亿

美元，实际执行合同1637项，实际使用外资2.82亿美元。合资、合作、独资项目签订286项，已投入建设的项目218项，其中工业108项。引进各种设备8800多台（套），有部份设备属世界八十年代的先进水平，有些属国内一流水平。如美华录像带厂、华声磁带厂从外国引进的全工序生产线，是目前世界八十年代的最新设备；华声磁带厂生产的系列盒式测试带填补了国家这方面的空白；特区汉胜特种电线厂和蓉胜电工厂，从西德和日本引进生产漆包线的细拉丝机和束线机，在内地也是少有的；中瑞表壳厂引进瑞士的全工序镀金设备和其他设备，也都属于八十年代先进水平。从美国引进、正在兴建的压缩机厂是全国八条生产线中两条最先进生产线之一，建成后生产能力可达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新投产的工业加上原有工业，全市现有各类工厂（场）共418家。1984年工业产值共88858万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47.9%，提高到1984年的82.1%。1985年以来，珠海特区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建设外向型企业方面，目前，重点发展轻纺、食品饮料、建材、电子工业。全市已经办起和正在兴建一批国内外市场有竞争能力、出口创汇能力强、具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外向型工业企业。

（三）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

建市后的1979年至198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9%多，比建市前十年平均每年增长5.9%，提高了18%多。1984年工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引进外资协议投资额、外资实际投资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旅游利润等八项主要经济指标均比1983年增长一倍以上。1985年，虽然遇到了抽紧银根后在资金和商品流通上的严重困难，但由于有了前几年特区建设的基础，各项经济指标仍有较大的增长。预计工农业总产值可达5.88亿元，比1984年增长81%左右，比1978年增长4倍多；财政收入可达28838万元，比1984年增长91%，比1978年增长42.7倍；社会商品零售额88000万元，比1984年增长82%，比1978年增长12.7倍；基建投资完成额7.8亿元，比1984年增长一倍，比1978年增长84倍；建筑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比1984年增长26.6%。

（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五年来全市安排就业人数达三万多人。市区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收入从1978年的649元增至1984年的1817元，增长1.8倍；农村人平收入758元，比1978年的150元增长4倍；渔村人平收入1217元，比1978年的851元增长2.46倍。由于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不但外逃的人逐年减少，而且近年来已有600多人回来定居。

（五）初步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近年来，我们根据“要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建立一个信息灵通、反应敏捷、办事效率高的特区管理体制”，以及把特区建成“四个窗口”的要求，从上至下发动干部群众破除在分配、税收、经营成份、产品经营、经营管理、外引内联、人才使用等七个方面存在的“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行政管理、经营管理、人事组织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改革，从而大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

发展。

（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特区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经济特区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几年来，我们根据特区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经常广泛的对外交往，受外来消极因素影响较多的特点，坚持“两手抓”，努力使特区既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又有高度文明的社会风貌。五年来，我们先后投资10800万元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占这五年财政收入的18%，其中1985年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按全市人口平均达到190.83元，远远超出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小学，抓好幼儿教育的同时，兴办了教育学院、电视大学和四间中专学校，成年教育也做了许多工作。还办起了特区报、广播电台，电视转播台，新建了图书馆、影剧院、青少年宫、体育场等文化娱乐设施。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和反腐败教育，开展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评选文明单位、和睦家庭等活动，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全市有七成的青年参加各类文化补习班，学文化、练技术、钻业务的空气日益浓厚，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纪律、讲卫生蔚然成风。我们还坚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为特区建设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试办特区近五年来的变化，充分证明我们党对外开放和试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是英明正确的。

由于我们缺少经验，珠海特区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距离“四个窗口”的要求还很远；体制改革还是尝试阶段；管理工作还未跟上，漏洞不少；1984年冬，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而出现的信贷、外汇、进口商品、基建失控等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至今还未消除；工作效率还不够高，经济效益还不够大，特别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不够快；还有经济信息不灵，外销渠道不畅通，技术人才缺乏，干部素质不高等等。这些问题，都急待我们努力去解决。

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前进中，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主要体会是：

（一）改革特区领导管理体制，使之适应经济基础，是促进特区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试办珠海特区初期，特区范围只有6.81平方公里，而且大部份是荒滩秃岭，人口稀少。当时，市委既要考虑抓特区的开发，又要抓全市的工作。为了不致顾此失彼，当时决定由市的主要领导兼任特区管委会主任，一名副书记（亦是副市长）任特区管委会副主任，分工专抓特区工作。其他常委、副市长则分管市的其他工作。表面看来，领导干部分工明确，既全面照顾，又突出了重点，是可以搞好特区建设的，但实施起来却矛盾重重，分管特区工作的领导干部千头万绪，精力很难应付得过来，不仅工作上容易出漏子，而且很难避免同分管其他战线的领导产生矛盾，造成领导之间、干部之间的不团

结，经常需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调解裁决，相当费时误工。为了摆脱这一窘境，1983年决定市领导不再兼任特区管委会的职务，但过一段时间，又觉得特区管委会抓不起来。为了提高管委会的权威和赋予较大的自主权，曾一度把特区管委会作为市的“五套班子”之一，但还是无济于事。这种领导管理体制，既影响了干部的团结，也妨碍了特区建设头几年的发展。1984年初，市委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对特区领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决定全部正副市长兼任特区管委会的正副主任，明确宣布全市工作重心放在特区，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分管的工作首先在特区落实。特区管委会下设一办公室，协助市长副市长（也是管委会主任副主任）掌握情况，调查研究，出谋划策。特区的重大决策，由管委会的正副主任（也是正副市长）讨论决定，分工具体落实。这样，市的所有领导成员都对特区建设发展负责，克服了个人的空忙，减少矛盾，为特区建设和发展都能使上劲。随着市领导班子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特区，市直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的各级干部都关心特区，支持特区，为特区建设和经济发展出力。地方财政的自筹资金主要用于特区的开发和建设。引进的工业项目，首先安排在特区。招聘的专业人才，首先服从特区的需要。随着领导管理体制的改革，试办特区前期存在的争议和矛盾，得到了统一和解决，使特区建设很快迈开了新的步伐。这一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领导管理体制如不适应时，就要当机立断地进行改革，这是特区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二）坚持特区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兼营其他各业，综合发展的方针，才能发挥特区的“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

在试办特区初期，有的同志主张以农渔业为主，理由是农渔民占全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渔业基础较好，而工业的基础却十分薄弱；也有人主张以旅游为主，理由是珠海靠山傍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没有污染；也有人主张以工业为重点。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主攻方向确定不下来。但从领导精力和外资投放的重点看，实际上是侧重发展旅游业。一九八四年初，我们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一系列文件，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讨论特区的发展方针。大家认为，试办特区初期，适当发展一些旅游业是必要的，有利于积累资金，方便外商参观考察、洽谈生意，对特区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是必要的。但是社会生产力不发展，加工工业不发达，商贸就难得持久的兴旺，再从中央给特区的任务来看，如果不及时抓好发展特区的工农业，就难于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外国有些以旅游为主的城市，有一些是办靠赌场、色情架步，或搞免税区货物比原产地便宜而吸引游客，但前者我们不许办，后者我们办不到。单靠风景秀丽，是有限的。通过分析对比，大家进一步明确了特区的产业结构必须以工业为主，同时兼营农牧渔业、旅游业、商贸业综合发展的方针。

珠海原来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怎样才能加快工业发展的步伐呢？我们总结推广四个典型四种模式发展外向型工业的新路子：一是华声磁带厂的路子。这个厂最初只有六

个人一间房，靠手工劳动搞来料加工。后来他们向银行贷外汇，从日本、美国、意大利、西德、丹麦等国进口属八十年代水平的先进设备，生产空白磁带出口。同时和国家电子工业部第三研究所合作研制生产测试带，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产品供应全国十多个城市几十间工厂，替代进口，为国家节约大笔外汇。湾仔磁带厂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由低级到高级勇攀高峰的实践，使我们增强发展外向型、替代型工业的信心和决心。二是与上海联营的汉胜特种电线厂和与四川联营的蓉胜电工厂的路子。他们看准了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引进国际七十年代水平的技术、设备，节省外汇70%，生产国内外畅销产品。由于技术水平和我们比较接近，容易吸收、消化，这是一条节约外汇而且有利于吸收、消化世界上先进技术的路子。三是市保健食品厂的路子。他们购进日本的先进设备技术，利用四川省的野生磨芋粉在我市精加工包装成“磨芋糕”、“磨芋粉丝”，全部出口日本，跻身超级市场。仅有二十多个工人而年创汇可达100多万美元。这就是赵紫阳总理1984年冬天到珠海视察时指出的，利用国内原材料到特区精加工精包装出口起辐射作用的路子。四是市无线电厂坚持元器件国产化、以质量取胜的路子。这四个典型开拓的四条路子，雄辩地证明了特区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外消为主的方针是正确的、可能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具体经验。

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提出工业发展要实行四个结合和四个为主的方针，这就是“外引、内联、自办相结合，以外引为主；外向型、替代型、自给型相结合，以外向型为主；市办、县区办、乡镇办相结合，以市办为主；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方针。这个方针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了工业发展的步伐。在1985年银根收紧，压缩基建，降温减速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在1984年增长160%的基础上仍可增长30%。更重要的是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85年已投产65个外向型企业，在五年内将陆续兴建投产的工业项目有147个，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工业产值预计将达到26亿元，创汇约3亿美元。

为了加快发展外向型工业，近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抓好六个重要环节：一是重视掌握港澳和国际市场信息，提高应变能力，按国际市场的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产品。二是提高产品质量，这是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关键。要训练职工，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要选用优质材料或元器件，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保证产品质量，以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三是降低成本。产品质量好，成本低，为投入国际市场竞争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要在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搞好企业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四是重视科研，工厂企业设研究所（组），以生产养科研，科研为生产服务。组织技术攻关，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五是重视产品的宣传工作，扩大影响，提高产品对用户的吸引力。六是积极开辟外销渠道。首先在港澳开辟市场，然后逐步创造条件，通过港澳转口国际市场，继而争取直接入国际市场。

（三）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不仅是实现全市外汇平衡的重要措施，而且是在农业方面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途径。

珠海毗邻港澳，出口鲜活产品具有运途短、损耗少、保鲜率高的优势，加上信息灵通，能适时对路供销，获得较高的售价。珠海自然资源丰富，有二十万亩的丘陵地带，六千多平方公里的海域，六万四千多亩的滩涂，具有农、渔、牧综合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广阔的前景。

前几年，我们考虑到鲜活产品受到出口配额的限制，对农业投资少，引进现代农业技术不够积极，从1979年到1983年农业产值才增长7.5%，平均每年才增长1.5%，大大低于全国同期农业发展的水平。1984年初，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特区农业应坚持“为特区服务，为出口服务，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地方财政增加对农业的投资，积极利用外资，引进优良品种，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并且办农业科研所，以生产养科研，科研为农业生产服务，以品质优良，创汇率高，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去争取国家配额。

农业的综合利用有极大的潜力。外向型的现代化农业应从畜牧业和饲料加工业抓起，以畜牧促进水产养殖业，促进果菜花卉和五谷类的发展；而五谷类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得力，1984年农业产值比1983年增长6.2%。1985年市区发展海水网箱养优质鱼1800个网箱，投放蚝25000亩，围海作鱼鳃养鱼虾蟹4000亩，新种果树4000亩，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预计农业产值比1984年增长8.1%。目前，我们正在落实畜牧业的发展计划，五年以后，争取年产瘦肉型猪20万头，鸡蛋约达200万斤，乳鸽约达20万只。同时，正在引进工厂化种花和农副产品加工业项目，预计饲料加工和蛋肉类以及其他农副产品加工，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加倍努力，赵总理提出的我国供港澳的主要鲜活产品南移的设想，完全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不难达到。

（四）特区建设和经济发展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量力而行，不慕虚名，但求实效。

试办经济特区初期，我们对搞好投资环境认识不足，没有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在特区范围内进行较为全面的开发，“七通一平”的基础工程建设进展缓慢。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大家求上心切，1984年冬天出现了信贷失控、外汇使用和管理失控，进口和积压商品过多，基建规模过大，宾馆、酒店、商业住宅楼宇偏多。1985年初，我们结合整党，联系实际学习中央文件，传达贯彻省长会议精神，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在特区建设和经济发展上克服盲目求快求大的思想。明确提出，既要有积极的态度，又要量力而行，不慕虚名，但求实效，并着手解决四个失控的问题。首先，压缩基建投资。原定1985年基建投资十七亿元，一再压缩到七亿元，在二、三年内暂停高级酒楼、宾馆和商品楼宇的建设，控制楼房的高度，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在能源、电讯、交通和已开辟的工业小区的“七通一平”建设上，着重投放在外向型工农业生产项目上。同时，加强外汇的使用和管理，积极推销积压商品，加速资金回笼。

（五）重视智力开发，抓好人才培养，是加快特区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措施。

在试办特区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人才奇缺已成为特区建设和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各级领导对人才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同时，在各级领导班子和组织人事部门反复破除对人才的各种偏见和旧的传统观念。我们指出：对人才求全责备的旧传统观念，将会使一些虽有某些缺点、但专业才能十分突出的人才得不到应有的重用；喜欢使用驯服听话的干部的偏见，将使一些独立思考，有独特见解，能开拓新局面的创业型人才得不到重用；片面追求文凭、年轻的形而上学观点，将使一些富有实践经验的自学成才和年龄偏大，但身强力壮、实践经验丰富、而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进不来；怕别人取代自己而嫉妒人才的错误观点，将使贤能之士被拒于千里之外……我们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正确的人才观，认清随着特区建设的发展，我们所需要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人才将会越来越多。从横的方面看，它不仅是指科技人才、社会科学人才、经济人才，还包括管理人才、培养人才的人才、有组织领导才能的行政领导人才。从纵的方面看，以科技人才为例，它不仅是指高级工程师、教授、主任医师等高级专家，而且包括工程师、讲师、主治医师等中级科技人才，还应包括技术员在内的初级科技人才。破除了对人才方面的错误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以后，制定了优待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的有关政策规定。在中央和省委组织部的支持和帮助下，在报纸上公开招贤。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有一万六千名大专以上学历的各类专业人才应聘。根据特区发展的需要，我们从全国招聘了1500名各类专业人才，使我市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1983年的18.8%上升到1985年的25.86%。人才进得来，还要留得住。我们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仍集资几千万元，建设1500套三房一厅或四房一厅的住房，使招聘来的专业人才在1986年春节前后可陆续搬入新居。

招聘是手段，使用才是目的。我们十分注意对受聘人才的合理使用。市的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干部经常和受聘人员谈心，了解他们的专长，听取他们的建议，并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我们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党性强，作风正，革命事业心强，不居功，不诿过，富于创新精神的就是德；具有开拓前进的知识、胆略和组织能力、决策能力，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开拓新局面的就是才。受聘的专业人才中有大专毕业证书，而又德才兼备的固然要重用；而具有很突出的长处，但短处也相当明显的专业人才，我们也要扬长避短，量才录用，看主流和大节，不求全责备，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不能以个人喜恶而偏爱或嫌弃某些专业人才，敢说敢干，处事果断，性格外向的人要用；埋头苦干，沉着扎实，性格内向的人也要用。

我们不仅重视国内人才的招聘，而且还重视引进国外和港澳地区的人才。我们成立了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负责引进国外人才工作。近几年已先后引进港澳地区和国外128名专业技术人员来特区工作，他们带来了某项技术和管理经验，对特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认为，招聘外地人才解决特区发展初期的急需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

解决人才的根本途径是立足本地，重视培养本地人才。近年来，我们十分重视对教育事业的投资，教育经费1984年人均56.2元，比1983年增加21.7元；1985年人均190.88元，比1984年又增加184.68元；比全省人均11.55元多出179.28元。我们在抓好普通教育的同时，十分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特别重视在职干部、职工的培训。市委决定，1985年做好规划，从1986年开始对四十五岁以下的在职干部每年抽调10%脱产培训一、二年；各公司的和大厂举办职工业余学校，短期轮训或脱产地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以提高干部职工素质。1985年成人教育，每万人已达47名，已超过了省规划1990年每万人达80人的要求。

（六）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特区建设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随着经济特区对外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过程中，难免带进资本主义消极的东西，因此，我们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做到有所引进，有所抵制，努力使特区既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又有高尚文明的社会风貌。几年来，我们坚持“四个抓好”：（1）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进行以共产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并在青年中开展争做“四有”新人的活动。（2）抓好文化教育事业。建市以来，先后办起特区报、广播电台、电视转播台、微波台、影剧院、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图书馆、新华书店、烈士陵园、专业粤剧团、业余艺术团、电视大学和一批中小学。广泛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思想阵地。（3）抓好党的建设。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通过整党，对广大党员系统地进行党性、党纪、党风的教育，提高党的观念、组织纪律观念，遵纪守法的观念、并且树立先进典型，大力表彰好人好事，树立革命正气。（4）抓好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斗争，及时清查、处理不健康的录像带、放映点，抵制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袭。及时处理了斗门县倒卖进口汽车和文化部门放映不健康录象及正在查处一批大要案，多次整顿口岸和社会治安秩序。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使特区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有了很大好转，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从而保证了特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广州华侨为何聚资于房地产

李 杨

1927——1937年，是广东近代史上华侨投资的全盛时期。仅这十年的广东华侨投资额就占1862——1949年的八十七年投资总额的88.52%，无论从投资企业的户数、投资行业和投资分布都是空前的，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旧中国广东华侨投资的黄金时代”。^①但“黄金时代”的大部份华侨投资不是用以补塞国家漏卮的工业、交通业或商业等，而是聚于房地产业。^②据统计，这一时期全省华侨资金投放于房地产业的达9,000户，投资额占全省华侨投资总额的66.27%。这一现象在占全省华侨总投资数额87.57%的省会广州也很突出。1923年——1937年，华侨资金投放在广州房地产业的约有7,000座楼房，投放金额达86,784,698元（粤币下同）。^③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一历史现象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说，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决定或制约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因此，二、三十年代广州侨资所以聚于房地产业，首先是当时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追踪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发现，二、三十年代广州华侨房地产业的全盛期恰好与“国民党政府期间广东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吻合。

带有近代化意义的新式工厂的建立，是广东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标志。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近代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在建厂数量上，地方工业的发展支柱“省营新工业十四间，为全国省营工业之冠”；^④在建厂规模上，新兴的省营工厂总投资为5,000多万元，平均每个工厂的投资都在数百万元以上，如1929年在广州西村狮头岗兴建的西村土敏土厂，投资额在400万元以上，规模宏大，“蔚为华南工业之翘楚”。^⑤广东的新兴工业，以它强劲的、不可悖逆的势头，推动着仍处于半手工业操作的地方民营工业，全省约有847间民营工厂不同程度地引进了新的技术设备。^⑥尽管当时涌现的许多工厂不象现代企业那样，对城市地产经济直接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带有近代化意义的工业，直接推动了与城市房地产业有密切关系的城市交通业和城市商业的发展。

二十年代末，以开辟马路为中心内容的广州市政建设，随地方经济的初步起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当时，广州市区马路建筑速度之快，数量之多，为全国各大城市之冠。至1934年1月止，全市马路总长度达140公里。^⑦在市区马路迅速展拓的同时，

以沟通广州和各地联系的郊外公路的修建也加紧进行。至1984年，广州郊外公路已完成24条，广州直达各县公路8条，^⑧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公路网。航运方面，1982年成立了广州市港务局，将省河航政局裁撤归并市港务局办理，广州的珠江水域航运减少了不必要的管理层次，因而使用率大大提高。航空方面，沪粤、粤陕和广龙、广福、广钦等航线在1982年前后通航。至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立体交通网初具雏形。

市区马路的展拓，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兴起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地段，并由此刺激地价骤升。如“河南尾一带，昔日地价甚低贱，自珠江铁桥通车后，交通便利，……现在地价平均每井约值三、四百元。”^⑨城市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城乡交通的发达，也为各地的商旅往来、商品运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地方工业的初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日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则为商品的集散提供了必要条件，广州城市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势头。在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的商店不断涌现。1983年上半年，广州市新开张的商店多达8,646间，比1982年同期增加了980间。同年，广州商业各行业种类间数达22,178间，资本总数达40,461,455元，^⑩形成了惠爱路、上下九路等几个繁荣的商业区。当时商业繁荣的长堤、太平路、一德路、上下九路、永汉路一带，商业店户人口占辖区总人口的80%。

都市的商业化程度越高，投资戏院、旅店、商店、酒楼等公共消费资料的房地产业就越有利可图。这些可带来厚利的房地产业吸引了相当多的华侨资本。在二、三十年代，广州的主要影剧院的建造，几乎都有华侨的股份，有案可稽的有中山戏院、中国戏院、中兴戏院、东乐戏院、西堤戏院和华民戏院，^⑪甚至连当时最豪华的金星、新华电影院也有华侨的股份。旅店方面，华侨以集股形式投资的，有大同酒店、大三元酒店。在当时由嘉南堂银行老板集资筹建的新华酒店和新亚酒店的股份中，属侨资的约占20—30%。^⑫时为省港最高建筑物的爱群大厦，也是由旅美华侨陈卓平等集华侨资本兴建的。^⑬

随着城建土木工程的大规模开展，建筑原材料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根据当时的记载，“近年广东建筑发达，新式制砖工业因之而兴，今日河南砖窑林立”。^⑭此外，西村的土敏土厂的产品物美价廉，一时胜于舶来品。原材料业的发展，为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提供了条件。

人口的增长是构成对住宅性房地产需求的直接原因。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必然引起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1982年的《广州人口调查报告》数字表明：是年全市人口为1,122,581人，比1928年市公安局统计的811,751人增加了31万多人，增长了38.3%。调查报告还表明，在广州居住11年以上的居民只占总数的37.3%；居住不满6年的占总数的36.95%。劳动适龄人口（15岁—49岁）占全市总人口的61.08%。显然，这是由于当时广州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周围农村大量人口流入所致。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市区人口密度迅速增大，据统计，1982年广州的市区面积是22.85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49,128人。这个数字，甚至比1984年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85,723人的统计数字还要稠密。^⑮

广州城市人口在短短几年内急剧趋向密集型，使城市住宅成了广州市政当局的棘手难题。以调剂和满足市区人口居住的房地产业的兴盛势在必行。

由此可见，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对房地产业的社会需求；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通常是社会需求的大小决定了投资利润的丰厚寡薄。三十年代初，广州出现了投资房地产业的利润高于投资其他行业的现象。当时广州的置业利息最低为八厘到一分，最高的一分以上。而以实业资本为周转的银行利息却低至二厘甚至一厘。投资房地产业既比银行的利润高几倍，也比民营工业略高一筹。这应是当时侨资聚于房地产业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忽视另一个重要条件：即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较为良好的投资环境。

1928年，随着全国趋向“统一”，广东连年战乱逐渐平息。1929年，主粤的陈济棠颁布了《广东三年施政大纲》，广东的社会经济逐渐走上轨道。时广东境内“治安良好，金融安定，……财政平稳，收支盈余”。^⑥能够把握时机，往往是实业投资事半功倍的基本条件。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出现华侨房地产业的高潮，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华侨投资者认识和及时利用了广东境内所展示的较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实施的政策有密切关系。一心要发展地方经济的陈济棠，也深深懂得：“振兴实业之力量，……莫若海外华侨。”^⑦为鼓励和保障华侨回国投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广东当局颁布了各项法令。除了迅速转发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条例》以外，广东当局又接二连三地颁布了《令拟保障实业招致华侨投资具体方案》、《拟招致华侨回国投资及保障实业办法大纲》、《广东省奖励归国华侨投资兴办实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⑧这些法令规定：华侨回国投资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等奖；10万元以上的，给予二等奖；5万元以上的，给予三等奖。为解除华侨回国投资的忧虑，广东当局还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在治安方面，陈济棠认为：要使华侨安心回国投资，就必须尽力维持地方秩序之安定，因此，他要求各地“积极肃清地方匪患，切实保障人民安宁”；在税收方面，“豁免地方一切苛捐杂税，使华侨投资经营事业，不至多所顾虑”；并成立华侨投资指导所，“俾归国华侨兴办各项实业或对某一件事有未尽谙练之处，得随时直接咨询”^⑨还对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如在交通运输上，如果华侨“需要材料及出产物品，予以运输上之便利。”^⑩华侨子弟不论在任何一间学校，“应一律免其学费，俾华侨踊跃回国之心。”^⑪这些鼓励和保障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对处于世界经济危机前锋的华侨资本来说，无疑很具有吸引力。

除此以外，出于解决城市人口住宅困难的需要，广州市政当局还制订了降低地产税以吸引投资的优惠条例。1928年，广州市政当局规定：“其（地产）税额是根据十五年（1926年）七月各所报警区之租金或产价……，暂定五折征收，十八年（1929年）的仍照此办法办理。”还厘定：“十八年（即1929年）一月以后，开辟马路各店户之地税，则改以筑路完成最先一个月所报租金捐额推算，五折征收。”^⑫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正在寻找投资对象的华侨资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

二十年代末，由于印度和安南两政府实施金本位币制，售出大量的银块；日本金解禁；上海的银存甚富；国内银生产过剩；中国近两年入超甚大，加上一些投机者从中推波助澜等因素，瞬间引起了一场国际性的“金贵银贱”金融风潮。^③受这场金融风潮的冲击，我国银两汇价大跌，1988年《中国年鉴》资料表明：1929年一海关两等于0.71美元，次年降为0.64美元，1981年又降为0.84美元。由于受汇率高的刺激，侨资（主要是美洲的侨资）纷纷涌进国内。1981年，是广东侨汇最多的一年，汇额达34,520万元（国币）。^④

如果说，广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需求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二、三十年代侨资聚于房地产业的客观原因，那么，投资者本身的愿望及其资本结构的特点，则是构成侨资聚于房地产业的主观因素。

具有爱国思想的华侨积极回国投资，是二、三十年代华侨房地产业兴盛的前提。长时期来，由于祖国贫弱而失去后盾的海外华侨，备受种种不平等待遇的痛苦，他们易产生振兴中华以改变受人欺凌的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经过几千年繁衍形成的、具有巨大内聚性和同一性的民族传统文化，又使他们产生挚爱宗邦、造福桑梓的思想。两种来自内外因素的汇合，就成了华侨爱国思想的产生并具有一贯性的根源。

华侨爱国思想表现形式因时而异。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海外华侨是以筹捐募款、投身革命为主要表现形式；那么，辛亥革命以后，海外华侨则以实业救国、繁荣乡梓为主要表现形式。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华侨回国投资高潮，正是这种爱国思想延续和发展的一个表现。1919年至1987年的短短十八年中，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的金额数竟是1862年至1919年五十七年的8.14倍。

华侨与大陆亲人间的血缘关系，是维系华侨回国投资房地产业的枢纽。华侨多是只身飘洋闯业，他们中的大部份家眷在国内。二十年代，美洲、东南亚一带排华风潮屡屡兴起。这样，促使乘桴浮海、飘零异国的华侨，一旦辛勤有获，便汇钱回家买屋置业，一来可以安顿自己的家眷，二来日后还乡时也有个归宿。据统计，当时属华侨业主的侨屋，约有60%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⑤

华侨汇款回国购置房产，跟侨资的构成特点也有关系。从广东华侨投资房地产业的户数和资本来看，虽然投资房地产业的总数最大，占广东华侨投资总数的52.62%，但房地产业投资户数却占总投资户数的88.65%，平均每户仅为一万多元。^⑥可见，投资房地产业的华侨资本具有“量少而分散”的特点。这一特点，削弱了华侨投资的实力和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既有利可图，且需资本较少而又相对安全的房地产业作为投资对象，则是十分自然的了。

① 林金枝：《解放前华侨在广东投资的状况及其作用》，载于《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

②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一书中的华侨投资房地产业的资金数额可能包括了华侨私人住房的那部份，但如果除掉这部份，华侨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仍占第一位。

- ③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第二卷广东部份第一篇，转引林金枝的《旧中国的广东华侨投资及其作用》，载于《南洋问题》1982年第2期。
- ④⑥伍颀立主编：《广东工业》，广东实业公司，1947年版。
- ⑤ 《广东实业公司概况》，1948年版。
- ⑦⑧《广州年鉴·交通》，1935年版。
- ⑨ 《广州年鉴·土地》，1935年版。
- ⑩ 《广州年鉴·经济》，1935年版。
- ⑪ 《广州经济年鉴·广州华侨的历史与现状》，1984年版。
- ⑫ 根据市房管局产权科提供的材料。
- ⑬ 《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版。
- ⑭ 黄文衮：《华侨与广东经济》，《社会科学》第1卷第40期，1937年。
- ⑮ 巫澄志：《旧广州的人口》，《广州研究》1984年第4期。
- ⑯ 秦庆均：《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29辑。
- ⑰ 《广东省政府周报》第221期。
- ⑱⑲⑳《广东政府周报》第221期、334期。
- ㉑ 《广东政府公报》第45期。
- ㉒ 《广州市财政统计》，1936年版。
- ㉓ 邓孝恩：《目前金贵银贱的原因及其应付方案》，《社会科学论丛》第2卷第3号，1930年。
- ㉔ 杨寿标：《华侨汇款与广东经济》，《社会科学》第1卷第40期，华侨汇款数字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调查结果。
- ㉕ 结合《关于私房改造复查中对华侨房屋复查意见》中有关华侨自己住房的百分比数字。
- ㉖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第2卷，转引林金枝《解放前华侨在广东投资的状况及其作用》，《南洋研究》1982年第2期。



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沙东迅

陈济棠（1890—1954）是近代广东、也是全国知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成为雄踞南粤的新军阀。虽然他是一个地方军阀，但其在治粤期间（1929—1936）曾致力于广东建设事业，使当时广东经济盛极一时。确实留下了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政绩。本文拟就他在发展广东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建树及其原因与办法作一初步的探讨。

—

陈济棠是在新军阀混战、国民党派系纷争、外患日亟的历史条件下于1929年崛起主粤的。刚上台时，广东的经济十分困难。自民国元年以来，广东积欠内外债二亿元，军政各费二千万，①陈为了维持十五万的军队和一个冗肿的官僚机构，每月财政赤字达七十万元。②军队一度欠饷三至五个月。当时广东地方近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商业凋零，原来地方税收支柱的进出口贸易，也因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而萎靡不振，处境艰难。陈济棠主粤后，利用半独立的环境，经过广东人民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第一，在工交、市政建设等方面。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省新建省营近代企业廿多家，为全国同类企业之冠；全省民营企业也从几百家发展至二千余家，其中新式企业达三百五十余家。③新建官办省营企业开始只有资本五万元，不出十年，总资产达七千万元，④民营企业的总资产也从1929年的六百五十四万元，发展到1936年的一千五百万元左右，⑤这在当时世界经济不景之年，极为不易。

在工业方面。先后建成糖厂六间。在西村设化学工业各厂和广东工业试验所，其中包括：土敏土（水泥）厂、硫酸厂、电解厂、肥田料厂、

硫酸铯厂、饮料厂、燃料厂。在河南区以纺织工业为主，其中有：棉织厂、丝织厂、毛织厂、水结织造厂、麻纱厂、整染印花厂。在南石头，有造纸厂。此外还有广南造船厂、梅菜麻包厂、木炭汽车炉厂等等。还有南石头钢铁厂、滙江水电厂、黄埔造船厂等都在筹建中，后因陈下台而停止。⑥

在军工方面。扩充石井兵工厂，建设滙江兵工（制炮）厂、韶关飞机制造厂（实为装配厂）、飞机修理厂、无烟炸药厂、手榴弹制造厂、防毒器具制造厂等，有一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作用。⑦

在矿产方面。将钨矿定为专卖，钨价比前增加四至八倍。还筹建省营乐昌北江煤矿、狗牙洞煤矿，收回英德八宝山钨矿，试探英德长冈银铅矿等。对人民开矿，则改善立案手续，减轻矿税，严禁巧立名目附收矿产捐税，以利开采。各公司呈请立案者共二百数十起，呈请立案待勘者尚有四十余起。⑧

由于工业发展，大大减少了洋货进口，增加了收益。就以水泥和糖为例，1931年至1932年间，平均每日进口洋泥五千桶，每年达二千四百三十万元。自西村土敏土厂建成后，每日出产水泥可达三千余桶，全年收入一千零八十万，洋泥也减价，每年可得利益六百三十万元。仅西村土敏土厂，每年可挽回利益一千七百万以上。又如洋糖每年输入约三千万元，头两年建成三个糖厂，共产糖二百余万担，足供全省销用有余，每年即可挽回三千万元。仅两年时间因水泥、糖业收入增加，全省裁去苛捐杂税三百余万元，⑨并拨农村救济款五百万元。⑩

在金融方面。首先将蒋系控制的中央银行广东分行改组为陈直接控制的广东省立银行，“成为全省金融的重心”。并在香港、汕头、海口、韶关、北海、梅菜等地设立支行，组建广州市立银

行，另筹设工商劝业银行，“以促进商业之发展”，同时鼓励十七家民营银行大力扩充金融业务。商业银号到1933年发展到四百九十八家，比1929年增加五十一家，①还开设了营业规模超过香港的早午晚三市的银市。金融事业的发展，有利于资本的集中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商业方面。陈把广州的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等处建设成为中心商业区。发动各方面集资兴建和扩建一批旅馆、酒家、茶楼、商店、戏院（其中仅旅馆1933年就有二百九十一家，比1930年增加了六十七家），鼓励小商小贩摆摊设档，增设全市商业网点，并组织“舶来农副产品”、“外国削价商品”等的展销，使广州市场十分活跃。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政建设。先后修起西湖路、豪贤路、清平路等二十四条马路，到1936年修筑马路总长达一百三十四公里；市内新增五家公共汽车公司，开辟营运线路十九条，全市行驶的汽车到1933年已达二千辆，比1929年增加一千一百八十辆，②建成了连贯珠江两岸的海珠桥，着手兴建广州西南大铁桥（黄沙铁桥）和西堤铁桥（均未完成）；取直、加高了珠江南北三千八百公尺的堤岸，③修建西堤码头等一批过江轮渡码头，在河南修建广州至香港的客船码头，籍以繁荣河南区工商业；鼓励华侨投资兴建爱群大酒家等高层建筑和东山西式住宅区，在沙河等处建筑住宅一批，增设市区路灯和上下排水道。④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广州市府大楼等也相继建成。⑤各县普遍设立平民医院、救济院、养老院、育幼院、习艺所等。⑥

在交通建设方面。经过省、县、乡分头兴筑，至1935年底，修筑了四千多公里的公路，比1932年增加近两倍，使当时广东的公路里程居全国各省之冠。官运长途汽车共一千二百七十八辆。建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纵横省内东西南北的十七条公路干线、三百二十六条支线，还有十几条公路干线在动工兴建。⑦不仅全省四通八达，而且还通达赣、湘、桂、闽四邻省边境。兴筑多年的粤汉铁路也于1936年建成通车，这对于沟通湖南和长江流域，发展工商业裨益至鉅。对粤汉铁路南段、广九铁路、潮汕铁路、新宁铁路、广三铁路等，则加强维修与管理，使铁路的客货量大大提高。还筹备黄埔开港，认为这是“繁荣广州之主要工作”。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建立

西南航空公司，有沪粤线等五条航线。还大力发展水上运输，设立全省港务管理局取代原海关理船厅，向海关收回船舶管理权，并在潮汕和琼崖设立两个分局。成立航海讲习所，训练航海技术人才。组建起内河客货船队，拥有客货船只一百多艘。改组了广东内河航业防卫处，以加强河道之安全。注意疏浚内河航道，设立内河航运水上标志。经一段时间的治理，广东省各江航线里程到1935年已达六千二百六十九里。⑧还筹修大小内港码头五十五座，其中大部分已开工兴建或完工。此时省港澳，东、西、北江各埠及珠江三角洲各县的水上交通已十分方便，许多县城都有班轮来往于广州、香港和澳门。1935年广州港出入口商船数达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三艘，比1932年增加了八千六百九十五艘；总吨数为一千六百四十三万余吨，比1932年增加了九百多万吨。⑨

加强通讯建设。设立无线电台一座，基本完成省内长途电话线网，全省各县长途电话线三万三千余里。还设立广（州）汕（头）无线电台，计划营造广州至香港、海口、北海、东兴等处无线电台。⑩

第二，在农林渔业建设方面。

陈上台时，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生困难，广东的农林渔业一片萧条，陈对此进行了整治。

在农业方面：鼓励垦荒，全省共垦荒地四十九万六千余亩；设立实验研究场所，注重改良和引进优良种子，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兴办农田水利建设以防治水涝旱灾；注意防治病虫害。

在林业方面。由政府办了五个模范林场，植树面积三万余亩，另有三十余县设立县属林场，植树面积一万五千余亩，加上私人领荒造林，全省造林面积达二十万亩。

开发渔业。兴建上川岛渔场，开办渔船及渔具制品厂，筹建广海、闸坡、北海等十几个渔业区，并在每个渔业区内开辟一个浅水养殖场（合共三十余万亩）和设立一个鱼市场。在淡水养鱼方面，对全省作了调查统计，设立了两广鱼类繁殖场，推广稻田养鱼及其他增产措施，建立了省水产职业学校，编印科学养鱼丛书，以培养专业人才。⑪

经过农林渔业各项改良，收到一定的效益。到1934年至1935年，输入洋米减为五千万元，减少一半。六个糖厂建成后，广东食糖已解决。这

不仅关系广东，而且影响到全国经济。

第三，在文化教育方面。

陈济棠等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了要“以改进全省教育，培植民族能力，振兴民族精神为目的”，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改善各级学校制度，推行社会教育，重视发展小学教育，增加职业教育，扩大师范教育，改善中学教育，扩充高等教育，设立编译馆、仪器制造所等。^②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陈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1930年全省教育经费预算为二百一十三万元，占全省经费预算的百分之四点三，到1935年，增加到五百零三万元，占全省经费预算百分之十点八，比1930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二。这就使广东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③

在学校建设方面，除了加强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在内的十所高等院校外，1932年秋，在广州创办了省立勸勤大学，内设工学院、师范学院（后改为教育学院）、商学院等。创办了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开办了一所与大专相当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全省高等学校学生从原来的四千人增至五千人，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还筹办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四所专科学校。1933年，陈还在香港办德明中学，又办德明书院暨德明英文书院，在广州、澳门、茂名等地设德明中学。这时期的中小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成人教育等均有较大发展。1934年同1931年相比，小学增加四百多间，学生增加十四万人；中学增加九十间，学生增加一万六千多人；职业学校增加二十多间，学生增加近二千人；普师学生增加一千三百多人，简师学生更大幅度增加。为适应学校教育，还建成了一批图书馆、博物馆和设立各种科研机构。

所有这些，对培养人才，发展广东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促进广东建设，都起过良好的作用。

二

陈之所以取得上述的建设成就，原因与办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五个方面。

第一，能把握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国际环境，为我所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设备大量积压，到处寻找出路，各

个集团之间的竞争十分剧烈，纷纷降低条件，向外倾销。陈等人得悉这方面的情况后，就及时地抓住了这个于我有利的国际条件，积极吸收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以促进广东建设事业的发展。

陈等人还善于利用时机，扩展经济效果，以厂设厂，以厂养厂，不断扩大再生产。他首先选择兴建几家适合广东自然条件的、利润高、周转快的工厂，然后从这些工厂所得的利润作为办新厂的资本。如用水泥厂、糖厂的利润来投资发展纺织、化工、造纸、造船、电力、军火等工业，以迅速加强其经济、军事的实力。^④

第二，重视教育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陈等人认识到培养一批掌握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所以他们重视智力投资，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针对当时广东的教育现状，提出社会上“应该造成尊重学者的风气，因为学者是知识界的领袖，又是最清苦的。在世界上的大道理及大事业，推源溯本，都是由学者所发动出来的。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何提高？”在政府方面，“对于教育事业及教育人员，应极力保障。因为教育是立国张（之）本，是永久的事业。”并认为“如果教育办得好，那个国家定不会亡。”“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⑤“教育是国家根本大计”。^⑥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就大大提高教育经费，给教师和知识分子以较高的薪金，兴建各类学校来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使之成为广东建设事业出力。

广东濒临南海，对外开放早，有一批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陈对这批人才十分重视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留美得硕士学位的林云陔于1932年至1934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建设厅长，成为陈的得力幕僚。办工厂、企业要靠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陈济棠和林云陔则成立科学委员会，不惜重金礼聘了几十名留学美、英等国专门人才返粤，担任局、处长、教授、校长、厂长、经理和工程师等，赋予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权，例如委任留美农学博士、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冯锐教授为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长，兼统办四间糖厂的总经理。冯以农林局长名义向陈提出发展广东糖业三年计划，^⑦陈接受了，并初步建立起以制糖业为中心的省官营工业。冯锐成为陈、林的

首席经济策士，并以冯为中心，形成一个经济文化方面的智囊班子，他们设想了一个切合广东实际情况的经济布局，即以广州为中心，沿着珠江水网，顺纵贯南北的粤汉、广三和广九铁路伸展开来，北至南岭，南至高雷钦廉（海洋至南沙群岛），东至潮汕，西至梧州。^②

陈还聘请外国专门人才三十余人和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许崇清、张东荪、林砺儒等来粤，开办学校、训练班，培养各种人才；此外，还招聘了一批大学生，派到各工厂担任中级技术指导工作，这些大学毕业生跟随外国专家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就接上手。还招收了一批高中毕业生，聘请香港技术人员来厂给予训练，学成以后即以技佐任用。

在一大批具有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的扶持下，陈济棠经营广东地方经济果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侨汇、侨资。要兴办实业，除人才外，还要解决资金、设备问题。陈抓住于我有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国际环境，大胆吸收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不少先进设备只收原价的三分之一），从较高的生产水平起步。他们决定大力使用现代化机器生产，尽量采取机器借款实施工业建设的计划，即向外国购运机器，其条件是由外商将机器连同工程师运进，安装开工，保证运行，以若干年为限。其付款条件亦规定于开工出产后始分期偿还，年息一般为五厘左右。这样做，一无须现款就可以获得新式大规模机器，称之为“无本办工业”；二则出产后分期偿还，事轻易举，且保证机器安全及其生产能力；三则有利于培训我国技术人员。

广东毗邻港澳，又是著名的侨乡。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素来爱国爱乡，关心乡梓的建设事业。陈采取各种措施，广泛地吸收侨汇、侨资，光是侨汇1933年二亿五千多万元，1934年一亿八千五百多万元，1935年二亿六千八百万元。1936年又增加了五、六千万元。^③侨资侨汇每年达四亿五千万，最高时达五亿五千万。^④这对广东建设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和利用广东优越的自然条件。广东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得天独厚，适合甘蔗生产，向执蔗糖业之牛耳。但因墨守旧法，不知改良，生产落后，一与外人竞

争，就一败涂地。甚至每年还要输入洋糖三千万。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陈济棠等派人亲赴菲律宾等国考察学习，收集优良蔗种五十二种，决定先在本省适宜蔗糖事业之地区，划分为五个蔗糖营造区，设四个繁殖场来比较选择适合广东的最优良蔗种加以推广。广东蔗糖生产面貌很快得到改观。

除蔗糖外，陈还注意优先发展水泥、橡胶、麻织品等产品。由于这些产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国内外市场有销路，因而使自然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陈还注意发挥广州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大部分新厂设在广州，着意把广州建设成为华南与西南地区的“首善之区”，以促进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广东毗邻港澳。陈充分利用港澳这两个窗口，了解世界市场的动态，确定对策。他利用当时世界市场萧条的国际环境，压低价格，进口发展广东经济所急需的成套机械设备和广东缺乏的钢铁、汽油、柴油等原材料；他还通过港澳市场及时了解经济行情，以确定广东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如了解到我蚕丝业竞争不过洋货，就当机立断，收缩蚕丝业生产，发展蔗糖业。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国外大量倾销时，即及时地将产品转向广大的国内市场销售，以避免损失。又利用广东靠近港澳、运费低廉的条件，看准机会把广东土特产如抽纱品、刺绣品、土布、爆竹、绳索、钨砂，以及烟草、果蔬、家禽等农副产品大量投入港澳市场，赚取外汇。1935年后，省营工厂的产品也开始挤入东南亚市场。由于有了上述种种策略和办法，使广东地方经济不仅不因世界经济萧条而冷落，反而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广东有不少水网地区，水上交通方便，水上运输费用低廉。陈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自然条件的优点，在设厂布点时多选择在珠江水系网络上，提高珠江水网的运输能力，因而能够不断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如广州的橡胶业，1935年前，因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产品滞销，面临破产。后因珠江航运及其他运输途径的开辟，远销华南和西南各地，1936年便摆脱困境，并赢利七百万；^⑤机械业则从破产的边缘得以恢复，获利一百一十多万元；火柴也从滞销变为畅销全国，至1937年4月止，每月仅销往湘、鄂的火柴，比1935年前每月销售总数增长三倍多。^⑥

第五，制定保护本国工业的法规和政策。办实业，还要解决好市场上的竞争问题。广东受洋货倾销的影响很严重，市场问题尤其突出。陈济棠则制定了保护本国工业的法规，即关税保护法，对洋货进口实行专税、高税限制，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例如我水泥出产后，质量优于洋货，但洋泥贱价倾销，土泥几难立足。于是由省政府施行保护幼稚工业法规，征收洋泥附加税。实施后，五羊牌水泥压倒一切外来水泥产品，工厂效率大增，售价也随之减一半以下。^③

由于糖的走私异常猖獗，省政府决然采取糖业统制政策，凡糖业之营运，概由政府设推销处以统制之，营运商下有分销店、零沽店，运销时要有运销证，无证者即作走私处罚，这就保证了糖业的高利由政府掌握。

在组织管理制度上也作了一些改良。省营事业采取分工合作、互相牵制制度，以防流弊，便于管理。内分四个部分：1. 工厂制造部分。在董事会之下，设厂长一人，厂长下设工务处和总务处。工厂专管生产，不管其他。2. 营业经理部分。设立广东省营产物经理处，负责所有省营工厂产品的推销和订购原料，还可代商人推销国货。后在汕头、上海设立分处。3. 财务收支部分。设立省实业银行，负责营业经理处之贷款收支、资金之筹划。4. 监督、设计部分。由省政府派监理或审核员一人分驻各省营工厂及产物经理处，执行就地审核帐目收支等项职责。各省营工厂之设计、建造均由省建设厅主持。

在人事制度方面，“选用厂、处首要之人，重在才干经验能力与技术及廉洁”，厂中员工多由厂长派任，握有独立用人之权。

总的来说，陈济棠治粤八年颇有建树，这在中国的军阀中是非常罕见的。当然这也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不论其当时主观意图如何，也不论其本人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促进民族的兴旺，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

诚然，我们也要看到，陈济棠的统治毕竟是地方军阀的统治，其发展地方经济之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高利来解决庞大的军政开支，巩固其地方政权。而且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种种的限制。这就必然影响到其对地方经济布局还

存在着根本性的弊病，对内地和海外的实际联系仍很少，过份依赖外国，不少工厂亏损很大，或不能正式投产。有些宏伟的设想到头来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无法形成最佳的经济布局和最佳的经济效果。

- ① 区芳浦：《广东财政整理之经过及今后之设施》，载《香港中兴报周年纪念册》。
- ② 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1947年版。
- ③⑤ 伍顽立：《广东工业》，1947年版。
- ④⑧ 符泽初：《战前广东之工业》。
- ⑥ 《陈济棠先生之思想与贡献》，载《陈伯南先生年谱》，台湾出版；陈元瑛：《广东两年来建设事业之回顾》，谢英明：《陈济棠主粤时期省营工业概况杂忆》，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8辑。
- ⑦ 林扬永：《陈济棠在广东办实业的意图》，载《广州文史资料》第2辑；符泽初：《战前广东之工业》；谢英明：《陈济棠主粤时期省营工业概况杂忆》。
- ⑧⑨⑬⑲ 陈元瑛：《广东两年来建设事业之回顾》。
- ⑩ 冯锐：《广东复兴糖业之经过述略》。
- ⑪ 《广州年鉴》，1935年版。
- ⑫⑬ 《广州年鉴》，1937年版。
- ⑭⑰⑳㉑ 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经济》，载《开放》1985年第1期；《陈济棠自传稿》，台湾出版。
- ⑯ 《陈济棠自传稿》。
- ⑱⑲ 《广东经济年鉴》，1940年版。
- ⑲ 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编，《统计月刊交通专史》，1936年出版。
- ㉒ 谢瀛洲：《一年来广东教育之设施及计划》。
- ㉓ 转引自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教育》，载《广州研究》1985年第3期。
- ㉔ 林扬永：《陈济棠在广东办实业的意图》，符泽初：《战前广东之工业》。
- ㉕ 《军声》第四卷第5期。
- ㉖ 《军声》第五卷第17期。
- ㉗ 冼子恩：《关于冯锐史料的补充》，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
- ㉘ 吴志辉：《陈济棠时期广东的经济布局》，载《广州研究》1985年第3期。
- ㉙㉚ 曾养甫：《广州之工业》，1937年版。

明代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 和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蒋祖缘

明代，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兴建时期。这固然是由于人们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和广东人口的增加，可以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投放更多的人力；但与洪武初，广东设置布政使司，成为明朝十三布政使司之一，以及明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提倡、督促，也有着颇为重要的关系。笔者根据几种资料统计，有明一代，全省兴建的水利工程共计一千一百六十六宗，^①其中堤围三百五十条，陂四百八十六处，塘一百三十一口。

广东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地势大体是北高南低，逐渐倾斜。由于地势的差别，“平田用陂塘，高田用堰坝，低田用圩岸，”^②便构成了广东农田水利工程布局的特点。

珠江三角洲平原是广东最大的平原，它由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组成，地势低平，河渠纵横。明人说：“广、肇患于水溢”，“其民胥赖堤防以生”。因此，那里的水利建设也就是以堤围为主，陂塘次之。

珠江三角洲在宋元兴建了一批堤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大规模的堤围建设，并不断向各出海口门扩展。由于出海口门的沙滩日渐增加，海滩围垦日益多了起来，以致每当暴雨骤来，山洪暴发，河流水位陡涨时，河道不易把阻塞的洪水消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便在筑堤时增加堤围高度，一般都达到一丈五尺至二丈左右。为了使堤围不易被洪水冲垮，沿江沿海的堤岸多改砌石坡，窠亦改砌石窠。

珠江三角洲建筑的堤围多集中分布在西北江三角洲的高要、四会、三水、南海、顺德、新会、香山诸县。其中高要县的水矾堤三万五千四百丈，捍田七万余亩。^③地跨高要、四会、南海三县的丰乐大堤，捍田十余万亩。^④据《珠江三角洲堤围和围垦发展史》统计，明代，珠江三角洲共筑堤围一百八十一条，总长度达二十二万零四百丈，平均每年筑堤七百九十八丈余，比宋代年平均筑堤二百零五丈，元代年平均筑堤五百四十一丈，都要多得多。

至于陂塘建设，亦“多有之”，特别是“番禺多高田，虞旱，则为水车，转轮激水，以上高原”。该县在嘉靖前建陂十三处、塘五口，共灌田十三万余亩。

由粤北向西南直至雷州半岛为山地、丘陵与台地。这一广大地带主要“患于旱干”。所以，水利工程以兴建陂和塘为主，其次是堰、坝和堤。前人说，蓄水曰陂。在粤北，南雄府的陂塘灌溉，明初便迅速发展起来。该府所属保昌、始兴二县在洪武年间共建陂十

九处，^⑤其中保昌知县岑仁忠筑陂，引凌水灌田五千亩；始兴知县王起筑丰陂，灌田七百亩。韶州府所属各县的陂塘在明初至嘉靖年间也发展得很快。曲江县和乐昌县各建陂五十处，乳源县建陂六十处，仁化县建陂三十五处。^⑥在这期间，连州及阳山、连县也总共建陂塘二十三处。^⑦由于陂塘的面积一般来说都比较小，所以便于分散经营。

高雷高亢地带的陂塘建设也相当普遍。高州府所属茂名、电白、信宜等县共筑陂二十三处，塘五十三口；^⑧雷州府所属海康、遂溪、徐闻三县共建陂一十九处，塘四十一口，^⑨特别是宋代已经建筑起来的特倡塘，周广四十里，“受十二坑之水”，蓄水量多；但入明之后，“渠淤塘废”，进行了多次重修和改造，导水西流与南流。南流之水与西湖诸水相汇；还开大大小小的水渠，从而扩大了海康、遂溪二县的灌溉面积。至于“东南有海潮之患”，则修筑捍海堤，以“御捍咸潮”。嘉靖三十一年，雷州因海潮和飓风造成堤决，损失很大。雷州府地方官令海康、遂溪二县合力修筑，共出动民工三万七千四百多人，历时半年。北岸修筑捍海堤一百万二千一百五十二丈，建闸三十九，南岸修堤一万三百四十四丈，建闸六十。遂溪县修筑的堤岸为海康北岸的三分之一，建闸为北岸的六分之一。堤成之后，“上潴泉水使不得出，下遏斥卤使不得入。”^⑩这是一桩很大的水利工程。清康熙年间雷人陈瑛说：“当日创始固为极难，即在今日闻得修岸之名，亦惊骇为不易。”^⑪

海南岛的水利工程在嘉靖前总共建陂三十三处，塘九口，沟十条，渠坝六条。其中以琼山、昌化、崖州居多。昌化“县田沙浮土薄，苦于旱干”。正统间，知县陈猷龙“教民筑堤蓄水，引以灌田，自是无亢旱之患。”^⑫嘉靖间，崖州地方官林资深了解到当地民多失业，便“相地浚沟，引南北水合注平壤”，灌田数万亩。^⑬

明代，广东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规模大，数量多，遍及全省各地，而且开始注意到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和防止以邻为壑。雷州府既有濒海地区，又有高亢地带。于是，那里的水利工程有堤、陂、塘、渠、闸、桥。时人把它总结为“不渠之疏之潴之浚之”，就不能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不堤之捍之排之障之”，就不能免除水患；“不时渠之时堤之，不兼渠之兼堤之”，就不能兴水利免水害。^⑭在兴利除害的实践中，人们还重视改进窦和窦门、闸板的用材和设置。万历三十二年，雷州府推官高维岳将特倡塘最关键的第十一闸改用石砌，设闸板，定出蓄水与泄水的上中下三等水则，以时启闭。它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掌握蓄水与泄水量，控制和调节水源，所以到万历三十六年，又继续将特倡塘的第二闸至第十闸全部改用石砌，“如遇旱潦俱仿上中下三则为蓄泄。”^⑮澄海县的新溪涵原来建筑时，“涵广七尺许，入水不多，且建立无法，未几沙淤水塞”，使中都和下都的田干涸日甚，而上都因“虑水溢”，反“以涵塞为喜”。为了解决上都田怕浸和中下都田怕旱，以及更好地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地方官府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将涵改建于新溪的上流，并将涵扩大到一丈二尺，“石砌其旁，中用水闸，以时启闭。旱则启之，纾中下外之忧；涝则闭之，免上外之溢。民称便。”^⑯

明代，广东修建水利工程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南海县桑园围东南的倒流港，每

遇洪水暴涨时，围内水位提高，淹没房屋和农作物。洪武二十九年，在进行堵塞倒流港的工程中，碰到了“洪流激湍，人力难施”的困难。南海九江人陈博文总结以往堵口合龙的经验，创造性地采用载石沉船截流堵口的方法，用大船装满石头，沉于港口，使“水势渐杀”，终于堵住了倒流港这个口子，并“由甘竹滩筑堤越天河抵横江，络绎数十里。”^{①7}另外，为了保护堤岸，降低激流对堤围的冲击，南海县一些堤围还在堤外紧连堤岸处建筑起一种“矾”和“矾头”的建筑物。“南海县南北二堤共一万二百四十三丈六尺，两岸有石矾三十二，杀水势以护堤”。而“南溪洋堤……于堤外无余地相其水势，湾割要害，立矾头十座，以为捍御。”^{①8}这对于减少堤围的溃决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巩固堤基和塘塍，人们还在堤和塘的周围“堰以草块，植以竹茨”，或者栽培树木和果树，还在“最卑湿处加石加桩”。为了加强对堤围和坡塘的管理，一般都设有专人负责。塘设塘长，堤设堤长（亦称岸长、圩长）或统管。雷州府的特倡塘设塘长，堤岸设统管，三年一任。如“堤岸稍有损坏，为统管者能拘食利户以修筑之；河渠稍有湮塞，为塘长者能率用水户以开浚之。”如果塘长、统管不细心管理，“堤之损者不筑”，“渠之塞者不浚”，造成灾害，就要追究责任，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①9}正德年间，潮州修筑自龙溪至郡城西岸的堤，“有守护之舍，有巡葺之夫，雨久告，霪雨至告，”^{②0}以便及时采取御防措施。

明代，广东兴建农田水利工程的经费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1）由地方官府乃至中央政府拨款：如正德年间修潮州堤，“为费百五十镒”，由御史杨曠上报朝廷，动用榷盐之金。又如万历中，海康筑堤，“发官银三千余两”。由官府拨款的多属较大的水利工程，或在受灾害后群众无力负担。（2）依据田亩受益的不同情况，分等摊派，不足部分，由官府补助。如有的地方，按“田亩所受釭其金为等，不足则公帑继之”；有的地方按“官六民四”或对半分摊。（3）“随田出资”，或“照税起科”，或“居民随力田出力”，全部由受益户负担。（4）由一家或几家乃至一村合力修筑。如新兴县罗马坡，乡人陈有保筑。黄英陂，梁允传等筑。高州县唐际村头陂、芳村风平陂，俱乡人筑。此类多属陂塘，经费开支较少。（5）个人捐贖：个人捐贖兴筑的，多属于小型水利工程。由于经费来源不集中仰赖于官府，所以水利工程兴建多，动工较快，容易付诸实现。

明代，广东大规模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广东虽然雨量充沛，但各地雨量分布并不均匀，常有季节性干旱发生，春季、秋季甚至夏季都有干旱。又由于广东境内的河流主要靠雨水供给，且河流涨水期长，特别是珠江各支流的洪水每同时汇集到干流上来，中下游又无湖泊调节，所以，每当暴雨骤来，山洪暴发，河流水位便陡涨，使低洼田容易受浸，特别是受咸潮淹浸的农田只能种一造水稻，甚至“一岁罹害，越三岁乃可种。”因此，发挥水利工程的护田、排洪、灌溉的作用，解决“旱乾水溢之患”，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由于大规模的堤围陂塘等水利工程建设，可以利用陂塘蓄水，利用水圳、窰闸和各种类型的水车引水灌田，可以利用堤围、窰和闸门蓄水和泄水，起到护田防洪和灌溉的作用，因此，它不仅使大量的农田“旱溢常平而无虞”，而且还改造了低洼田和旱田。

隆庆年间，潮阳知县黄一龙筑堤，“化斥卤为腴田三万余亩。”^① 万历九年，肇庆知府王泮主持凿跃龙窰和腾蛟窰，“雨则分泄内潦，旱则引潮溉浸，数万亩洼亢之田悉为膏腴”，亩产三石四斗。^② 万历二十一年，增城知县邹元忠在城东四十里筑堤三千一百丈，“使濒水污莱之地皆化为膏腴。”^③ 海康、遂溪二县对特佃塘的修建和开凿大小水渠，使“郡壤固燥”之地，“周年可以种植”。

农田的改造和灌溉及时，使水稻丰收年成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洪武年间，始兴县建筑的丰陂，使农田“早乾有赖，秋谷丰登。”^④ 当地人便把这新建的陂名之曰丰陂。成化年间，新会县潮莲乡筑围捍田之后，便从“岁一稔”改变为“岁获两稔成膏腴，”^⑤ 即从一造水稻改变为早晚稻连作制并获得了两造的丰收。上述条件再加上耕作技术的改进，南海县每亩产谷“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⑥ 单产跃居全国的首位。

还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明代，广东耕地面积增加了九百六十八万三千亩。^⑦ 耕地面积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由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珠江三角洲下游平原由泥沙淤积起来的浮生沙坦，在明代日益增多。人们便在珠江主干河道两岸和各支流沿岸以及沿海的海滩上，圈围筑堤，把浮生的沙坦圈筑在堤内，称为沙田。这是劳动人民把堤围的修筑与增加耕地面积结合在一起，向江河要田的一种创造。有明一代，珠江三角洲围垦成田的达一百万亩以上。^⑧ 同时，修堤之后，可耕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东莞福隆堤修复之后，“沿堤之田，茨菰咸垦。”^⑨

至于分散在全省各地因兴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而增加的耕地面积也十分可观。廉州的罗成江，土沃地广，可以成田，但江北岸高，“南岸下水难逆流”。成化十七年，在廉州府事刘烜主持下，筑石截流，开渠引水，灌田一万亩，并招徕流民百余家居耕种。^⑩ 琼州“濒海有港可田”，地方官倪冻“募民兴筑，得田千亩。”^⑪ 万历十四年，西宁知县林致礼主持开辟荒地数十里，凿山通圳，缘亩导流，灌田万余亩，使那里的“膏壤旷土荒田，尽为利藪。”^⑫ 万历二十一年，廉州府事郭廷良修筑清水江堤，“灌瘠卤为田”二千亩。^⑬ 水车，是水利灌溉的重要工具。明代，广东各种类型的水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推广，特别是水翻车不凭借人力，可以自身运转，低水高送，甚至三、四丈的高地也可以运水灌溉，从而使许多高地也开辟成田。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农田水利建设的巨大发展，不仅使大量的农田得以解除“旱乾水溢之患”，而且改造了低洼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和便于及时灌溉。它对于增加粮食作物的单产和总产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广东从永乐、宣德以来成为殷富的地方。万历年间曾任广西右政使司的肇谢潮在《五杂俎》里说：“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鱼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夹之衣，可过隆冬。道无乞人，户不夜闭，此真极乐世界。”尽管谢肇潮所谓“极乐世界”是言过其实，但明代广东的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从明中叶以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作物种植的面积有了很大的增加，使农业商品性生产得以迅速发展。

①根据嘉靖《广东通志》、道光《广东通志》和《珠江三角洲堤围和围垦发展史》统计。

②⑥⑦②⑩嘉靖《广东通志》卷26,民物7。

③⑩⑬⑲道光《广东通志》卷116,山川略17。

④②②③③③雍正《广东通志》卷40,名宦(明)。

⑤乾隆《南雄府志》卷3,舆地志。

⑧据嘉靖《广东通志》、道光《广东通志》统计。

⑨据嘉靖《广东通志》、道光《广东通志》及嘉庆《雷州府志》统计。

⑩雍正《广东通志》卷60,艺文。

⑪道光《遂溪县志》卷11,艺文。

⑫道光《广东通志》卷253,宦绩录23。

⑬道光《广东通志》卷252,宦绩录22。

⑭⑮⑯嘉庆《雷州府志》卷18,艺文

⑰道光《新会县志》卷2,舆地;《珠江三角洲堤围和围垦发展史》。

⑲嘉庆《增城县志》卷12。

⑳乾隆《南雄府志》卷3,舆地。

㉑《珠江三角洲主要作物和畜牧林木的历史发展概况》第18页。

㉒霍韬《霍渭厓家训·田围第一》。

㉓雍正《广东通志》卷20,贡赋志载:洪武二十年,广东的田土为二千三百七十三万四千亩,万历二十八年为三千三百四十一万七千亩。

㉔《珠江三角洲堤围和围垦发展史》。

㉕道光《广东通志》卷115,山川略16。

㉖道光《广东通志》卷253,宦绩录23。



西南军阀史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西南军阀史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近百人参加了讨论会,提交论文、资料六十篇。

大家认为,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对军阀史的有关理论和史实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许多同志指出,对反动政权上层人物的评价,不能采取回避态度,也不应一概否定。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会上,同志们认为陈济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全面地、客观地而又分阶段、分专题地研究和评价陈济棠,对于军阀史的研究,具有典型的意义。有的同志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尤其在广东工业、交通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更为老一辈广东人所共知。作为陈济棠本人的主观意图来说,主要是为了供养军队,巩固地盘,但在客观上对广东经济的发展是有进步作用的。

(李实)

试析蔡牵集团的成份及其反清斗争实质

叶志如

截至目前，关于蔡牵的研究，不外乎有以下几种认识：是一支武装走私集团；是武装的海商集团；是海盗；是沿海贫困破产的农民、渔民、贫渔和盐户等组织起来的人民反清斗争起义队伍。究竟哪种说法最为合乎历史实际呢？笔者拟以清代档案文件为据，通过对这一集团成员成份的分析，藉以说明其海上反清斗争的正义性质，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范畴。

—

蔡牵集团是一个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上武装集团，前后活动达十四、五年之久。他们从数十船发展到一百多大小船只；从弓箭刀矢、火枪发展到拥有大小铜铁土洋炮械武器；从几十人发展到二万多众；从攻船越货到“竖旗滋事”。^①这个集团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组织呢？我们且对其队伍成份构成作一分析。

1. 关于蔡牵其人

据史籍所载，蔡牵是福建“滨海平民”。清朝官方在嘉庆九年查明，他“祖居同安县西蒲乡地方，人丁本属无多，现在该犯亲友之人，俱随蔡牵在船。其远支疏房恐被株连，俱已四散迁居，现在西蒲乡并无蔡姓之人。”^②另据福建有的地方志记载：“蔡牵，同安人，以弹棉花为业，后入海为盗。”^③另一说他“初为佣工”自食，继为海盗。^④又说他“少时流落邑南乡水澳，为人补网。”^⑤不论说他是“弹棉花为业”，还是说他是为人“佣工”、“为人补网”，看来他属边海无正当职业的贫民，则是确凿无疑。

2. 蔡牵队伍的主要成份

蔡牵队伍多数来自沿海各省滨海地区，尤以福建、台湾为最多。从清廷官府档案文书中所录被俘的主要成员口供上看，其有名有姓有职业身份者，主要的有：陈亮，同安人，掌管一船共27人；黄忠，惠安人，分管一船共80人；骆寅，惠安人；杨鲁，安溪人；裘使，惠安人；李培，同安人；黄标，惠安人。他们“向在海边捕鱼，被蔡牵纠约入伙”。黄众，惠安人；柯露，晋江人。他们“平素捕鱼度活”。黄允，惠安人；蒋山，南靖人。他们“都是捕鱼为活”。李曲，惠安人，“平素捕鱼为活”。赖庆阳，浙江台州人，“平时在海边割草”。江允，惠安人，“素与蔡牵认识，纠集入伙”，分管一船共80人。张亚新，原籍广东，在台湾生长，“海边捕鱼”。张恩，惠安人；张尧，晋江人；林水，惠安人；柯荣，惠安人；洪玉，晋江人。他们均以“捕鱼为生”。^⑥王好引，晋江人，“向在海边捞

摸螺蛳”为活；吴标，晋江人，“在山砍柴”为业；陈念，同安人，郭扬，龙溪人，“俱在台湾肩挑度日”；吴孟，广东大埔人，“打铁营业”。⑦张保，是广东“新会江门渔人子”。⑧郭婆带（学显）“本番禺蛋家子”。⑨另外还有李亚复，系“新会蛋民”。

以上均系大小骨干。从其籍贯、职业上不难看出，投入蔡牵营伍的骨干人员，大多数为“沿海穷民”，⑩“穷渔贫蛋”和“捕鱼采樵之徒”。可见失业无计的渔民、盐户、手工业者和破产的农民贫蛋是其主要成员。此外，在蔡牵队伍中，还有船夫、水手、铁匠等。如陈三贤，同安县灌口乡人，“一向驾驶渡船过活”。⑪温荣，系福建人，向以“操舟为业”。⑫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蔡牵队伍中，居然也有被俘的清军兵丁。如徐仲魁、余盛理、张成玉三名，“系属兵丁，因落水被盗捞上盗船逼勒服役，即肯依从”者。⑬可见蔡牵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比较广泛的。

二

以沿海贫困破产的流民，主要是渔民、蛋户、盐户、船工、水手和手工业工人及农民、兵丁等社会最低层的阶级势力为主体的蔡牵集团，其斗争目的，不仅限于反抗压迫和争取生存，而且具有强烈的反抗清封建腐朽统治的政治色彩。

关于蔡牵集团的政治口号，据当时参加镇压蔡牵攻台行动的清方重要官员爱新泰向朝廷报告说：嘉庆十年蔡牵大举进攻台湾时，曾“竖旗滋事，分散伪札，自称镇海王”，还刻有“正大光明”王印等。⑭另有史料记载：当时提出了“恢复汉基”的口号，自封为“镇海威武王”，并确立了建元“光明”的年号。⑮还给台湾约同响应起事者“封伪职，给旗印”，“遍贴伪示：‘如庄民不助官兵，概不加害。若充当义民，定行杀害’等语。”⑯从这些口号和提法中，不难看出他们坚决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和政治统治。应该看到，蔡牵进攻台湾是有远见的，他们“屡被内地兵船追赶，自思在洋东奔西窜，终无了局。因台湾海外偏僻，且多产米谷，倘占此地方，可以安身。”所以其攻台建立反清安身基地的目的还是明确的。正因为如此，清最高统治者并不仅仅把其视为“江洋大盗”。朝廷把各地人民特别是台湾各地人民纷纷响应起事，出现许多“私自刊印贼目，有伪封军师、将军、先锋等项名目”，视如“与从前逆贼林爽文之乱相似”。⑰认为“其谋为不轨，已属显然，较之教匪滋扰情形，尤为可恨，必须速为剪除。”⑱由此可见，蔡牵集团的斗争确实是一次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人民起义。

蔡牵集团内部的组织情况，文献记载不详，仅在被俘人员口供中提到了一些。如林际泰、温荣等人讲到：蔡牵与其部下的人是平等相待的。他们之间在生活上也无太大的悬殊。蔡牵只是在后期才吸上了鸦片。他们说到：蔡牵“年约四十来岁，身材矮小，面色黄瘦，微须，左太阳穴有刀伤疤痕，身穿蕉布短衫，青纱裤子，花绸巾包头，手带金镯，赤脚，穿鞋，贼众呼为‘大老板’，也有称为‘大出海’。蔡牵的女人年约三十余岁，贼众呼为‘老板娘’。蔡牵坐船上有一百多人，同帮贼船有七十余只，大小不一……手下的人见了蔡牵，各人起坐自由，并无尊卑规矩。贼众彼此呼唤俱叫绰号、排行，并没设伪职官

名目。”^⑩只是到嘉庆十年底，决定登夺台湾郡城时，才以“镇海威武王”的身份出现，并分别给台湾应约举义的洪四老、邱红、邱恩、吴三池、马美、周添秀、叶豹、李添赐、许和尚、吴利万等各地首领封为“军师、将军、先锋等项名目”。^⑪他们的组织虽是松散的，但毕竟有了一定的指挥系统。战斗时，一般是以红旗为号令。

蔡牵集团与清廷反动军队对垒不计其数，大多数均属应付镇压的遭遇性质。大约到了嘉庆七年五月以后，蔡牵组织了一次攻打大担、小担清军炮台以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他们从疲于奔逃变为主动袭击清军了。据载，嘉庆七年五月初一日，他们以三十多只船四、五百人的兵力奇袭了清军大担门防汛的大担、小担二岛炮台，守兵“俱各被迫落海”。此役缴获了全部炮械（其中六门运走，另七门因炮身过重而弃沉于海）。^⑫象这样的进攻战，确是蔡牵反清斗争的关键转折。

最为壮观的战斗，是三年后进攻台湾之役和发动当地人民的起义。嘉庆十年五至六月份，他们多次“直扑南汕，冀图登岸”。^⑬到了十一月份，他们即以强大兵力，发动了猛烈攻势，兵分南北两路，强行对台登陆。十一月十三日，他们以五十余船的兵力在淡水的沪尾港登陆并取得了成功。十六日，他们又以一百余船只云集沪尾，以三、四十船共二千之众兵力乘潮大举登陆并全面摧毁清军阵地。他们进兵艋舺，“将该厅仓廩及都司并新左县丞衙署焚烧”，并占据桃仔园。使清方惊呼：“势甚猖獗”。^⑭

蔡牵在发动对台登陆的同时，即派出了蔡九、谢基等人入台秘密策划并组织人民起义以作内应。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蔡牵以六、七十船兵力，从沪尾社地方登岸，攻占了反动义首何桧的房屋，并没收了其所有的米船。十二月初二日，响应蔡牵而起义的胡小固等与清军在淡水打了一仗，伤毙清军兵弁及反动义民等二十七员。十七日，蔡牵六、七十只船，乘潮汐拥入鹿耳门与清军水师激战，击沉清兵船六艘，打死打伤清官兵一百多人。嘉庆十一年正月十六日，蔡牵以五、六十艘船攻入台湾淡水、鹿耳门等处，在从鹿耳门驶至猴树港洋面，突然遭到了飓风袭击，毁船二十余只，死伤兵力千余名，仅余船三十余只。二十一日，他们进入了鹿耳门，随后，又驶泊台南路歧后东港洋面分泊，两次从歧后登岸均未成功，损失兵力二百多人及一些船只。翌年二月初四日，蔡牵率领余部驶往歧后东港，取得了十多船的联帮支援，随即以三、四百人的兵力登岸。在清军、义首、义民、屯番等反动军队的阻击下，被迫撤出战斗而驶向小琉球洋面，^⑮并不得不返回内海。

这次大规模的登台作战虽然失败了，但它是蔡牵反清以来的最为壮观的攻防战。它不仅试探了清军的虚实，而且严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统治。它唤起了台湾人民的觉醒，在里应外合包围之下，台湾郡城安平几致被占，而凤山、嘉义、台湾起义义军，都纷纷攻占县城，焚烧监狱、军火库、粮仓等。使清军南北文报受阻，清廷长期得不到台湾的消息，台湾局势处在严重失控之中。事情十分清楚，蔡牵攻打台湾及其能得到台湾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是标志其反抗清王朝罪恶统治的一次人民大起义。

关于蔡牵的劫商越货行动的性质，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劫商破坏了海上交通贸易的

发展，是破坏性行动。我则认为，这是属于维持人民反清起义队伍所必要生存条件的自救行为，是对巨商集团敌视行为的惩戒行动。从笔者接触到的清官方文献记载看，被蔡牵营伍“行劫”的对象，大多为有名有姓的大商户字号，绝非滥施于一般贫贱渔户、船商。至于掳人勒赎，这仅是逼勒大商人交出货款的一种手段。发行免劫照票和打单也是为了区别富户和贫者，并给那些自愿支持粮钱物的商人以一种自由和保护。掳走一些违抗者的水手、船夫，这也是一种惩戒性行动。而杀害违抗者，只是极其少有的偶然行为，在许多官方文书中所记载的被俘者的供词中，也仅有屈指可数的数例。嘉庆七年八月下旬吴淞口劫商行动是十分说明问题的。八月二十一日申刻，蔡牵以十多只敏捷乌船，各插红旗，乘着潮汐，冒着敌人吴淞营炮台和川沙县营炮台戒备之险，以迅速的行动将福建的有名船户吴隆裕、金安澜、林长发及其它大船顾恒丰、郁同顺、周泳利等十七号船进行劫赎，限令他们交银交货。对于不愿交银货者，便将其船水手舵工等扣住作人质，钱物送到即行放人、放船。^⑤另一次较大的劫商行动，是在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次，蔡牵以五十余只船进入沪尾社鹿耳门港口，将台湾著名船户何姓的房屋占住，将一些大号的米、糖船等执拿，责令交银收赎，仅夺得的米船二只就获大米二千余石，并很快就分发给各船食用。

大凡这种行动，都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其打击对象多为闽、台大商字号船只。即便如此，也并非全部没收，只有对何姓及粤庄大商这样的极端敌视者才这样。所得的米、粮、油、盐、糖、鱼、菜除了队伍留足自用以外，便以公平价格卖于百姓渔民，以此筹募活动经费。对于友好的和自愿支持的商人船户和交易者、一般渔民，则卖给他们免劫“照票”和“打单”，以示保护和募集经费。这种例子在官方文书中每每可见。

关于蔡牵与一般船户、商人渔民公平交易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如陈甫卖给蔡牵部队地瓜一次可得番银一元。^⑥正因为蔡牵和这些人建立了鱼水关系，他们也能处处同情和支持蔡部的活动，甚至敢冒杀头坐牢之险。他们帮助蔡牵部队销售执照、打单、运送日用物资和武器火药、暗送情报等等。如嘉庆九年九月，清官府一次就抓获“通盗济匪”者十多名。在定海县抓获上岸帮助蔡牵探听官兵消息的温荣、丁成金二名，挑取淡水之王得运一名，销售照票之黄国瑞、杨音宗二名；郑、镇二县获销照票之杨长寿、张泳贵、沈如心、王小旺四名。其中张泳贵、沈如心、王小旺还备办鸡鸭、酒菜、柴薪等物资卖给蔡部。^⑦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蔡牵集团与贫民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正是有了人民的广泛有力支持，他们的斗争才能坚持十四、五年之久。

至于蔡牵对大商船户施劫的原因，除上面所说的是为了自救和给养以外，尚有阶级报仇这一因素存在。因为，这些大商人常常暗通官府，密报蔡牵行踪，帮助官兵运械，资助官军粮饷，甚至组织官庄义民助剿，常常处于和蔡牵集团相对抗的地位上。早在蔡牵下海反清初期，蔡牵就与一些帮官助虐的商人结下不解之仇。如嘉庆二年五月，蔡牵船队刚刚抵达台湾淡水厅八里岔沪尾一带活动，当即遭到该处商人蔡才所传集的义民乡勇的伏击。^⑧九年四月，当蔡牵攻打清军北汕炮台后，闽浙总督玉德立即得到了“常川

渡台之大商船数十只，配兵一千名并备足军火、器械、选派勇干将弁过台剿捕。”^②特别是在嘉庆十年底到十一年初，蔡军及台湾义军二万多人猛攻安平郡城及洲仔尾、盐水港等地的最激烈日子里，清廷从广东、福建等内地调拨了大批兵力和饷械急忙渡台时，就得到了闽、粤和台湾各大商户的配合和支持。这些商户在清军兵马运送、军械粮饷接济方面，都起到了极其得力的作用。尤为昭著的是台湾广东绅士和粤庄“义民”，^③他们常常自动协助官军打仗，围攻蔡部和义军，大力为官府筹饷筹械。十一年二月，当清廷济台饷银仅有十五万两，一时不敷安平、鹿港、嘉义三路官军饷需支付时，仅鹿港的米商林文时就平价卖米三千万石给官军，广东绅士还主动借粮给官军。^④这些行为，正好说明他们处处是与蔡牵为敌的，也不能不激起蔡牵义军的愤恨和报复。所以，蔡军在与官府对垒时，不得不经常分出部分兵力来对付这些巨商“义民”的挑战。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蔡牵对反动商人的复仇施劫，也带有其正义的性质。

三

综观以上情形，我们认为：嘉庆前期活跃在东南沿海的蔡牵武装集团，是由一批无生活出路的贫困破产渔民、盐户、樵夫、水手、船工、渔户、农民和无正当职业的流民阶层等社会最低层人民所组成的反抗封建腐朽统治的人民起义队伍。由于清朝封建地州阶级的残酷压迫和苛重剥削，使得广大农民、渔民等社会底层人民日益破产和贫困化，迫使他们不得不下海为“盗”。正如御史宋澍参劾大臣蔡新家书一案中所说的：他们大多数人为“聚集在岛屿中者，闽南日之贼至船近百号（地在福清、莆田之间）或三、四十号。多在海中截劫商船，其船可用，人精壮者，则并船与人皆掠之，使共为贼。”“一种多系沿海贫民，朝出暮归，或假作渔船、或假作商船”者。^⑤这些商船、水手和贫民之所以“为贼”，是因为官府的残酷压迫和腐朽统治而走上反抗道路的，因为官府动辄以贼拿人，其知避者，“则拘其亲人，有赂则释之，无贿者拘以予官。遇一命案，便拘全村人。被拘者，非贿断不能放，其自度无贿而能作贼者，则先逃避以作贼，致盗之由也。”^⑥这是当时清官员蔡新和御史宋澍对官逼民反的真实情形的自供状。

这些贫困而破产的流民阶层，在被迫走上反清斗争道路时，响亮地提出了“正大光明”的口号。这个口号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最受压迫、剥削的人民相信自己力量，憧憬光明出路的情景。他们这一口号，也和其他反清斗争组织的口号一样，都具有时代的特征。

蔡牵武装集团的出现，是清代封建社会从鼎盛而走向衰弱的乾嘉时代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总爆发的显著标志。它和内地的白莲教、天地会等形式的反清斗争相汇成一股强大的斗争潮流，沉重地打击了清封建王朝的罪恶统治。蔡牵海上反清斗争的伟大历史功绩，应该记入人民反清斗争的史册之中。

- ①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农民运动类，海上反清斗争项（以下简称为档案）第3672号卷第1号等。
- ② 档案第3655号卷第1号。
- ③⑮ 道光朝修《厦门志》卷16，第10页。
- ④ 嘉庆十年重修《连江县志》《大事记》卷3，第55页。
- ⑤ 民国十八年印《霞浦县志》《大事记》卷3，第19页。
- ⑥ 档案第3640号卷第4号。
- ⑦ 《明清史料戊编》第5本，第474、484页。
- ⑧ 《番禺县志》卷22，引自《靖海氛记》。
- ⑨ 《东莞县志》卷33，引自《己巳平寇篇》。
- ⑩⑳㉑ 档案军务类第7—8号卷。

- ⑪⑫ 档案第3656号卷第2号。
- ⑬ 档案第3641号卷第1号。
- ⑭⑮ 档案第3672号卷，爱新泰等奏折。
- ⑰ 档案第3680号卷内各件。
- ⑱ 档案第3657号卷第1号。
- ⑲ 档案第3673、3680号卷。
- ㉑ 档案第3644号卷。
- ㉒㉓㉔ 档案第3673号卷第4号。
- ㉕ 档案第3646号卷。
- ㉖ 档案第3669号卷。
- ㉗㉘ 档案3661号卷。
- ㉙ 档案第3640号卷及财务类28—30号卷。
- ㉚ 所谓义民，系官府对大商人所组织起来的反动武装力量的称呼。
- ㉛ 档案第3679号卷。



释“以妥以侑”

刘运兴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传》曰：“妥，安坐也；侑，劝也”。案享、祀、妥、侑四字并列，俱应为祭名，妥字不应别为安坐之义。妥当读如墮，为墮之借字。《仪礼·有司徹》注“不绥祭”，释文曰“绥本作隋”。《仪礼·士虞礼》“不绥祭”，注曰“绥当为墮”。绥从妥得声，墮从隋得声，其字俱得通用。墮为祭名。《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墮祭”，注曰：“下祭曰墮，墮之犹言墮下也”。《周礼》曰既祭则藏其墮，谓此也。今文墮为绥，《特牲》、《少牢》或为羞，失古正矣。齐鲁之间谓祭为墮。”《仪礼·少牢馈食礼》：“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注曰：“黍稷之祭为墮祭”。《周礼·小祝》：“大祭祀，逆盂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徹，赞奠”，注曰“隋，尸之祭也也”。《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属，藏之以依神”。据上所述，则助祭者以肺、脊、黍、稷等祭品授神尸，神尸以之祭，祭毕则藏其祭品以依神，如此祭祀仪式总名曰墮。侑，毛训为劝，是也。侑亦为祭祀仪式之一种。于墮祭之后，尸处神座，众与祭者殷勤劝神尸饱餐之。众与祭者视神尸犹先祖其人也，劝神尸多进饮食，意犹于先祖多致孝敬之心。如此祭祀仪式谓之曰侑，侑祭已是祭祀尾声。

把成人教育纳入企业经济发展的轨道

——佛山市成人教育调查报告

柯 峤 文

(一)

佛山市素有“金三角”之称，具有经济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在六年里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半，创造了一个高速度；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工程技术人员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必须通过发展教育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确实，佛山市这几年来年的发展是为国人所瞩目的：全市引进各种技术设备90多万台（套），生产线106条，不仅使传统的陶瓷、纺织、食品等产业焕发了青春，而且发展了塑料、家电、电子等一系列新产业，使整个机械设备的60%达到了七、八十年代水平；区乡企业由1978年的6,600多个，猛增到1984年的12,600多个，产值由5亿多元增至25亿元，翻了两番多；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由过去农业劳动力占90%，工副业劳动力占10%，转变为分别占40—50%和50—60%，农村工业化的趋势正在出现；工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33.05亿元增至1984年的82亿元；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6.77亿元增至1984年的33.75亿元；人均国民收入达1,090元，比全国的582元高558元。

佛山市经济的这种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策的威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行，佛山市几十年间积聚起来的生产力，急剧迸发和扩展开来，短期间内就实现了第一个翻番。然而，政策的弹性作用毕竟是有限度的。它虽然能在非常的发展时期直接实现生产力的量的扩张，但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后的正常发展时期，它一般只能对经济的发展起保证和促进作用。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内延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还必须借助于人才和科学技术。而这方面，佛山市明显还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一、全市56,000多干部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就占了63%。如果除开属于干部编制的27,000多科技人员和教师，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还得大幅度下跌。二、几年的调进和培养，已使科技人员增加到12,000多人，比1980年增加一倍有多，但仍只占全市人口的0.4%，低于全省0.6%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全国0.9%的平均水平。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只有2,800人，占职工总数的0.5%，农业技术人员还不到农业劳动力的0.1%。不少国营和集体企业仍没有一个科技人员。区乡企业和农村专业人才

之少，就更不必说了。三、全市88万职工，有82%的人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按技术级别划分：初级工占68%，中级工占30%，高级工占2%。由于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低，不会看图纸和表格，不懂机器设备的保养和维修，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引进的高级多功能设备也只能当普通的单功能设备使用，还有的干脆拆下自控机械的电脑，实行手工操作。四、全市50,000多文盲和半文盲，大部分是农民。据中山阜沙区调查，全区7,676名青壮年中，小学未毕业的占14%，其余虽有小学以上学历，却多数未达到相应的文化程度。不少初中生不懂打算盘，不会写信，甚至不具备基本阅读能力。全民文化素质虽不理想，但由于传统和开放的缘故，佛山市人们的经济意识、开放意识和效率意识，比许多地区要发达一些。这就使佛山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显得日益突出。经济实践迫使他们重视教育，而且，在观念上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待教育战略，把教育纳入经济实践的轨道。这是教育思想的转变，更是经济思想的一个转变。

新的经济思想，反过来指导和创造新的经济实践。几年来，佛山市围绕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智力开发，从总体看，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的历程：

第一阶段：开辟渠道，寻师学技。许多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上马和发展初期，纷纷到广州等地邀请大工厂的熟练工人和退休工人担任指导或带班，主要解决机器的操作和维修技术。如顺德勒流区的江义造船厂，就是请广州新中国造船厂的退休工人带班造船。顺德桂洲区邀请了省内外100多名塑料、机械、模具、二轻工艺、日用电器、汽车维修、电子、建筑等专业的技术工人去定期工作。还有派出工人到大厂去学习的。这种初级智力开发的意义，在于使机器运转起来。

第二阶段：广招贤才，聘请顾问。企业要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必须有能够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提高企业效益的技术力量和人才。为了解决技术力量的严重不足，佛山市首先把眼光盯住广州等一些文化技术中心。各企业争相到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求贤，能调则调，能招则招，从1978年到1984年，经佛山人事局调进的科技人员有1,580人。一些小集体和大量的乡镇企业没有铁饭碗作保，便竞相以诱人的前景和优惠的待遇作为条件，吸引专业人才前往工作。更普遍的还是聘请兼职技术顾问，建立经常性的协作关系。许多区和厂都有这样的顾问，几人到几十人不等。顾问们分布于全国各大城市，尤以广州为多。他们或在假日前往，或临时应召而至，或定期通讯联系，或接受上门咨询，向佛山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信息，对佛山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借你的脑袋，发我的财”，这是佛山许多企业对这一作用的形象概括。

直接把人才请来或招来固然可缓燃眉之急，但却不能根本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首先，应聘愿调者人数虽然可观，但适用的不多，能成行的更少。顺德桂洲区、中山小榄区都曾公开招聘，热闹了一阵，却一无所获。佛山市郊澜石区参加1984年广州举办的人才交流会，联系了几十人，最终未得一人。一些单位有幸得到个把人，解决户口、住房和家属就业、子女读书又困难重重。何况，人家既能流来，当然也可以流走。

其次，顾问只是业余兼职，不能事事都顾到问到。第三，只靠调进和请顾问，并不能根本解决企业职工文化技术提高的问题。

事实教育了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要根本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必须开掘能够不断给自己输送所需人才的源泉，立足自己培养。因为，第一，本地人不易外流。第二，自己培养的人才靠得住。第三，需要什么培养什么，专业对口，用得上。第四，不必为解决一系列生活问题伤脑筋，也不必高报酬，高待遇。于是，智力开发的重点便转入第三阶段，即发展各类成人教育，培养企业所需的各种人才。

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深化，佛山市成人教育已从单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变成企业本身的内在要求，被纳入了全市经济和各企业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到渠成，佛山市掀起了“办学热”。

(二)

佛山市无线电八厂，可以说是佛山市靠人才和教育起家的一个典型。该厂的前身是一间生产蚊香的化工厂，七十年代转产半导体元件，年利润只有十余万元。1981年开始生产电子钟、音响设备、微电脑等高技术产品。这个厂从实践中感到，资金可以借贷，生产线可以引进，元器件也可以引进，但贷了资金，引进了生产线和各种元器件，要生产出高技术产品，没有人才不行。可是这个厂开办以来，国家从未给分配过一个科技人员。为了解决技术力量严重缺乏的问题，他们主要采取如下办法抓紧成人教育：一是职工参加专业班学习。几年来，他们派往西安交大、佛山经委、科委和电子公司举办的微机班学习的有60人；推荐报考经济管理和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有26人；参加厂办专业英语班学习的有50人，三项合共186人。二是抓职工文化补习，全厂应补对象的合格率达95%。三是抓职工技术轮训。根据生产的需要，对不同工种的职工进行不同内容的培训，至1985年底全部职工都轮训过一遍。四是从职业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职工，并请市职业大学代培45名大专生，毕业后进厂担任技术员。这使得该厂技术力量大大加强，工人素质显著提高，工厂从无一名技术人员发展到86人（含调进），700多名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中以上，微机车间则有60%的工人是大、中专生，其余也基本上是高中生。人才的培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加强了他们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技术合作的基础，现在，该厂已与全国88个教学科研单位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成立了科研、设计、生产、销售和维修五位一体的“星河”协作网，利润至1984年也增到200多万元，比建厂时增长20多倍。1985年，该厂生产的“星河—Ⅱ微型计算机”还荣获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颁发的“用户信誉证书”。

无线电八厂作为一个典型，是佛山市成人教育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从1981到1984年，佛山市通过各种途径培训了359,000多人。其中，农民188,000多人，占51%，职工176,000多人，占49%。至去年七月，已毕业的大、中专全科生1,772人，单科生8,168人。其中，佛山市电大毕业生709人，相当于解放三十多年国家分配给该市的工程

技术人员的总和。巨大的成绩，赢得了多方赞誉。联合国成人教育理事会考察团，在对全市进行考察后认为，“佛山市成人教育有很多有益的经验”。

佛山市成人教育的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领导重视。领导真正重视了，事情就好办了。佛山办电大，市委让出花了480万元新建的办公大楼。南海要大量培养自己的人才，县委每年拨出100万元作为经费。县经委还筹措了50万元作为人才培养基金，每年选送40人到广州的高校代培。顺德县区乡企业缺乏管理和技术人员，县乡镇企业局从1979年起连年开办各种技术、管理人员学习班。到1984年，已培训了12,948人。

在成人教育的实践中，他们还创造了几种值得借鉴的培训方式：

1. 抓住急需技术，对口培训。这是一种战术性培训，通过短期培训解决眼前生产急需的关键技术，这种形式灵活多样，针对性强，短期内便可见效。是生产部门提高技术水平和吸收新技术的重要方式。如顺德桂洲区办的水稻、甘蔗、塘鱼、瘦肉猪、多种经营的训练班，三几天一期，既传授了技术，又不误农时，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塘鱼班为例，1984年参加学习的学员，亩产塘鱼最高达2,000多斤，平均也有1,700多斤，比一般产量高出700多斤。又如中山糖厂在进行计算机煮糖试验之前，与华工合办微机培训班。受训过的工人在试验中成为技术骨干。1984年跨1985年榨季，他们使用三台微机煮糖，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2. 根据职工文化状况，抓好基础教育。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培训，旨在从根本上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素质，从而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佛山市的基础教育是从“双补”（职工初中文化、初级技术补课）开始的，这一任务完成之后，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入中级文化技术培训。在这方面工作成绩突出的企业，其经济效益也是相当显著的。如中山石岐建筑公司，经过普遍培训，使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80年的5,000多元上升到1984年的12,000多元。是我省建筑行业唯一获得国务院授与全国先进企业称号，获得金质奖章的单位。该公司高质高效建成的中山纪念堂、中山温泉宾馆、中山长江乐园、中山县人民医院等一批工程被定为样板工程。

3. 挑选生产技术骨干，进行系统专业教育，即成人教育中各种脱产的和业余的大、中专教育。这也是一种战略性培训，是地方和企业培养本地中、高级专门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为经济发展积蓄后劲、长劲的重要措施。几年来，佛山市支付此项费用已达850多万元，送出4,860人委托高校代培。现在，又开始发展自己的教育基地，走社会化办学的道路。目前，佛山市经国家批准的电大、职大等高校有8所，成人中专有6所。此外还有一批成人中专正在筹建或待批。从成人大、中专毕业的学生，虽然在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许不及正规大、中专学校的毕业生，但他们有实践经验，学习的目的性、选择性强，毕业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普遍受到欢迎。

（三）

但是，成人教育毕竟刚从普通教育中脱胎出来，它被纳入经济发展的总过程刚刚才

起步。今后，成人教育作为学校后教育或“终生教育”，如何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卓有成效地进行，看来还需要在许多方面加以总结、研究和改进。

一是要加强教学过程的实践环节。成人教育作为学校后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针对性和实践性强，其目的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使之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同时，成人教育的对象多数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最急需的东西，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成人教育要从社会需要出发，考虑到教育对象的年龄、性格和心理特征，不能照搬普通教育的一套。要改革成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加强实践环节，提倡自主性和实用性，且时间宜短，内容宜精。

二是要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纠正片面追求文凭特别是大专文凭的倾向。不然，不仅不利于真正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且将继续扩大业已存在的初、中、高级专业人才不合理的比例结构和严重缺乏技术工人的状况。因此，需要通过改变轻视“工匠”的传统观念和宣传的片面性，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和加强成人教育的宏观规划与管理。要切实将成人教育的重点放在对广大职工进行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上。

三是要调整成人教育的学科结构，加强工程技术和应用学科的人才培养。从1985年省市各种干部专修科在佛山招生的情况看，专业设置与客观需求背离的现象十分严重：文科共招生240人，理科才招生42人。在文科中，哲学、政治、文秘、团干、电大党政干部等专业均不能完成招生任务，其中报名人数与计划招生数相比，最高为60%，最低只有7%。相反，工业经济、工业企业管理、内外贸和卫生管理等专业的招生计划则不能满足需要，相当数量的报考者因名额限制而不能入学。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佛山本身统筹安排成人教育的发展结构和招生计划，还要省有关部门和高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开设专业和招生。

四是在“双补”基本完成之后，要及时把普通职工教育的重点转移到中专（技）教育方面。职工的中级文化技术教育，应以中专（技）教育为主。这样做，更有利于联系生产实际，通过技术带文化或文化带技术的培训形式，使职工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中级技术或相当的水平。这是一条捷径，它比起先读完成人高中再进行中级技术（业务）培训，要省时省钱。

五是在成人教育中，要注意抓好思想教育。成人教育不仅要传授文化技术，还要注意加强思想教育。有些地区和企业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有了专长就另攀高枝，或与本单位斤斤计较。佛山不少单位因而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和经济制裁手段。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既有专业技术又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有艰苦奋斗精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旅美作家李黎及其小说的现实主义思想

方风雷 张硕城

(一)

她为大陆读者所了解，是在小说集《西江月》出版之后。老作家丁玲为之作序，茅盾在逝世前为之题了书名，如此厚遇，对海外作家来说是鲜有的，况且是个年青的女作家。这是因为她的创作不仅在真实反映六、七十年代台湾和旅美华人的生活方面，有深刻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而且还以她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激情，以年青一代独有的对社会、人生价值的追求，以纯洁女性的敏感、真挚的爱憎，在海外作家中独树一帜。

李黎，原名鲍利黎，安徽和县人，一九四八年生于南京。一九四九年被舅父抱去台湾。一九六九年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一九七〇年赴美留学，先攻历史、政治，后改攻电脑。现定居加州圣地亚哥市，任某电脑资料出版公司“软件编辑”。

李黎生长在典型的中国式中下层家庭。亲生父母是知识分子，现均在上海。抚养她的舅父是公务员，舅妈是家庭妇女。上大学时，舅父去世，家道愈衰，她没有享过骄生惯养的富裕生活。留学时是靠奖学金和打零工维持。

少时李黎就酷爱文艺，学过绘画、舞蹈，爱读小说。高中阶段，开始试着写点文艺作品，但首先遇上的是对祖国新文化的“先天不足”。六十年代的台湾，由于文禁森严，“这些新一代的作者没有机会接触到较早时代的作品，因为鲁迅、茅盾及其它左翼作家的作品全遭封禁，他们未能承受上一代的文学遗产，找不到可以比拟、模仿、竞争的对象。因此，写作生涯变成了困苦又孤独的奋斗。”（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李黎那时所读过的，只有一本《阿Q正传》手抄本和一本巴金的《家》，后者还是别人偷偷从香港带来的。相反，六十年代，欧美现代派文学风行台岛，她所接触并借以起步的，也便多半是这类深奥晦涩的东西。大学期间她写的

作品多是仿现代派，也没有多少发表的机会。

她在创作上时来运转，是离台之后。留学的经历对李黎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首先，是眼界开扩了，她开始得以呼吸到祖国现代新文学的空气。在美国，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新文学的果汁，不仅使她在写实主义方法上得到的仿效，而且催发了她的新思想。她开始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个答案：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原是这样，难怪中国人要革命，难怪要换一个政府。（《西江月·后记》）她在留学时写的第一篇小说《谭教授的一天》就是这种思考的产物。从此，她的创作思想上埋下了现实主义的种子。

其次，她经历了一场风浪的洗礼。留学期间，她卷入了海外留学生发起的“保土爱国”运动（即“保卫钓鱼岛”）。运动持续了几年，发展为“中国统一运动”。李黎始终是运动的热烈参加者，这对她政治上的影响很深，它促使思索中的李黎进一步把目光转向大陆，把海外所遇的种种苦闷与祖国统一连系起来。盼望祖国统一的激情，催促她急切地去抒写自己的这类感受。可惜，又一次“不逢时”捉弄了她。一场席卷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给海外游子送去的是变了调的讯息。在遥遥的大洋彼岸，年青幼稚的李黎所看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全貌。她那时写的几个剧本，都受到国内政治和席卷世界的左派学生运动的影响，沾染了明显的“主题先行”、“公式化”的风气。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她后来多次对此间的创作自我反省，她说：“写《谭教授的一天》之后的五、六年里，我投身在海外保土爱国运动的浪潮中，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也处于一种动荡和摸索的状态。那几年我写了一些东西，但几乎都不是文学创作，而算是属于一种思想、感情挣扎

着成熟和探求着答案的过程。直到一九七六年之后，思想、情感和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同上)在选编文集时，她毫不痛惜地淘汰了这段时间的一切文字。所以《西江月》中，首篇《谭教授的一天》与次篇《童年》之间，足隔了六年空白。

再次，李黎创作上经历的又一个苦恼，是海外极缺发表园地，更缺众多读者。“更大的遗憾是绝大多数自己的同胞读不到自己的心曲”，她不止一次叹息道，“这种遗憾的感觉，有点象表演艺术者，面对着空无一人的厅堂，独自在台上寂寞地表演。加上离开中国的土地久了，觉得自己的根一点一点地从大地母亲的泥土中拔出来，断了，枯了。”(同上)她想摆脱这种离土断根的困扰，但在空间、文化的隔膜未消除之前，只是一个梦。

祖国的第二次新生给李黎带来了第二次创作的转折。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〇年，短短三年多里，她怀着“满是对三十年家国的激情”，先后四次回到出生的故土。她各地游览，会晤了巴金、丁玲、艾青等名作家和许多同辈人。她参加座谈会、举办讲演，同大陆同胞、亲属广泛交流。耳闻和目睹，使她认识了祖国母亲的真实面貌。许许多多的新鲜感受使她创作冲动一发而不可收，她一气写了几十篇，迈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一九七七年以后的创作中，她那现实主义的精神又复归了，而且有了发展深化，技巧、语言也较明显地趋于成熟。她说：“我感觉自己的根又慢慢地连回大地上去了。”(同上)

在台湾度过二十年的李黎，当然烙上了海峡彼岸的性格。七十年代台湾写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对她曾产生过影响。她描写台湾生活的作品中，乡土派的气息是浓郁的，明显透出了她与台湾风土人情的血肉之缘。她也象一些乡土派那样，喜欢以自己的经历串成自己的作品。《西江月》所收十篇，前五篇是以在台湾的经历写成，后五篇是以在美国的经历写成，贯串了一个飘零海岛、国外，但一直向往祖国的女儿的足迹。李黎学过历史、政治，她懂得怎么用历史的眼光和社会的尺度去看待个人的生活经历，去看待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的过去和现在，她“从自己熟悉的人身上，开始了对上一代和这一代中国人命运的思考和探讨”，由此走过了“漫长的十年心路历程”。(同上)

李黎还写过历史小说、诗、散文、剧本、报

导等。但她最引为自赏的还是《西江月》所收的作品，并引为十年创作的代表作。她编好这本选集时是33岁，于是她在扉页上写道：“写给现在的、未来的和过去的中国青年。”

(二)

从她的代表作来看，李黎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直面惨淡的现实，善于抓住最有特点的生活侧面反映时代本质，并对丑恶的世态加以无情的批判。

台湾养育过李黎。她选用的自选集封面，是一位台湾好友画的《故乡》，画的是南台湾的青山、椰树和稻田。“我爱那里的一草一木，更爱那里淳朴、勤劳、正直、勇敢的人们。”(同上)然而，她小说里所反映的，并不是青山绿树，而是灰暗的“天涯”和冷峭的“夜树”，幻想并不能代替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生活提供给她的真实素材。

《钱处长的一天》、《喜宴》、《离婚》是一组台湾上层社会的婚姻三部曲。第一篇是“订婚”的故事：台北赖委员数番电促卸任居美的钱处长，要求让在美念书的赖公子尽快同“美国公民”钱小姐订婚，好叫赖公子凭此取得移民美国的“绿卡”(永久居留权)。钱处长夫妇为此忙了一天，结果，钱小姐却背着父母同赖公子断绝了关系，并放弃家庭资助，自立去了。于是钱处长到赖委员投资的大学任教授的希望也落空，“绿卡”换“教授”的交易遂成泡影。(《钱处长的一天》)第二篇是“结婚”的故事，已有妻室的美籍华人赵教授回台湾娶了一个漂亮姑娘为妾，结婚喜宴上，老赵将白发染黑，“年轻了十岁”，但看去仍“足够作新娘的爸爸”。新娘是富家独女，屈嫁给赵老头作小，全是由于家里人要通过攀亲而移民美国。于是婚宴上新娘只好躲到厕所痛哭一场。(《喜宴》)第三篇写的是“离婚”故事，为了取得“绿卡”，“贤妻”同丈夫假离婚，让丈夫姘上一个美国女人，结果弄假成真，闹得乌烟障气。三桩婚姻纠葛，都系着一个问题——“绿卡”，这是继往常“金钱联姻”、“政治联姻”之后，台湾冒出的大怪事。怪出有因，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外交上连连失败之际，造成的社会动荡也是空前的。尽管当局提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但也掩盖不住内

部人心的涣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许多上层人士纷纷设法迁往美国，“移民”风暴席卷全岛。李黎以敏锐的直感，通过“绿卡联姻”这个看去微小的生活现象，把当时台湾社会政治思想上的绝望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李黎没有象常人那样，把批判的笔墨放到上层的灯红酒绿的现象描绘上，她要寻找的，是内在的“痛点”，她抓住了时代危机的深层——人的心理危机，于是，尽管是一个侧面，一个与政治似乎没有直接联系的“绿卡”，却将整个社会信念和希望的崩溃暴露无遗。

上层人家可以用走来逃避现实，而处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却走投无路，只能在空虚、寂寞、动荡中苦熬。《谭教授的一天》中的谭教授，是一个正义感和良心未彻底泯灭的知识分子，当台湾报纸诋毁他过去的老师——大陆的某名作家时，他先是愤慨，转而妥协、忍耐。小说写了他一天中的这种痛苦的心灵矛盾过程，一方面，反映了海峡两岸人为的文化阻隔和亲友离绝的不幸；一方面，反映了台湾的严厉的文化专制下知识分子内心的悲哀和怯懦。哀莫大于心死，谭教授的“心死”并不在一日之间，而是二十年压抑、麻木的环境所致。我们如读过茅盾早期小说《野蔷薇》，了解二三十年代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可怜的精神面貌，也就不难理解七十年代台湾的谭教授们的苦衷。

李黎还写自己童年的伙伴的遭遇，写军眷村和贫民区里那“忙累、挫折、混乱，每个人都象疲倦而饥饿的兽，一点点皮毛的摩擦就会引起一场撕咬”的家庭，写“挤着、挨着、蹲着、趴着”过日子的人们的孤独和空虚。（《童年》、《夜树》）她在短小有限的几篇文章之中，一气把台湾底层的烂疮脓水都泼出来，包括落后的“养女”习俗，公厕般的住房，横行的警车，人满为患的监狱，装模作样的“博士”，形同枯骨的“要员”，以及“看了非法的书”而“失踪”的教师……这在台湾或旅美作家中是少见的。即便是白先勇这样有代表性的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的锋芒也不及她这般犀利无忌。白先勇的创作当然是成功的，但他在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的衰败时，毕竟没能全跳出世家子弟的感情束缚，他把哀怨、惋惜的泪水过多地洒向了那垂死的阶级。李黎的同情属于她出身的下层人们，强烈的不平和爱憎，使她顾不得流连顾盼。她要写就写个痛

快，尽管，艺术并不欢迎直露。于是，她的批判往往显得过于直率和尖刻，政治思想的倾向与写实明显地交炽在一起，加上年青人特有的不恭和放肆的嘲笑，给小说增添了抗争的召唤力量。有人说李黎对现实的批判不带着泪，而带着火，我们认为，这倒是恰恰点中了她的创作的特点的。

二、李黎的写实主义充满情感和理想，深沉的爱国恋土之情和奋发乐观的希望追求，构成她小说的主调。

七十年代中末以来，爱国主义在台湾、海外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民族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构成了海外进步华人作家创作的时代趋向，“寻根”、“乡思”、“回归”的主题开始成为风气。李黎也不例外。《西江月》就是这方面的力作，作者用这个单篇题目作为自选集的总题，也足见她的心迹。这个短篇描写了前国民党官僚“陈天王”晚年旅居美国的孤独、思乡的愁苦和哀凄，哀宛之情匿于细腻的描述之中，甚是动人。一个早年仇视共产，甚至连一见大陆茶就摔杯子的政治变态狂，暮年竟喝起家乡“逆女”捎来的龙井茶，并“偷偷地”收藏大陆亲友的来信。他无以寄托晚景的孤单，天天独自去“看海”，暇想着“放一艘船，直直地往西走，一直走，不要偏，可以到上海。”他开始对儿子仿效美国文化生活而反感和震怒，斥责他忘了祖宗传统。弥留之际，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再扶他去阳台看一次海。小说丝毫没有给这个昔日的魔王留脸面，对他那至死也未觉悟的顽固的政治偏见和妄诞信仰，予以了轻蔑的嘲讽；但另一方面，她很注意去剖掘他晚年的思乡至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尖锐的内心矛盾冲突。鸟之将亡，其鸣也哀。陈天王也是中国人，怀乡恋土的人之常情，终于在临死之前冲破了长期的自我压抑而强烈地喷发。这种心灵深处的感情喷发，不仅使他为自己一辈子用政治偏见掩盖内心的痛苦而感到懊悔，也使他为再也无法如愿以偿地落叶归根而死不瞑目。李黎没有说明这是不是就叫做“良心发现”，是否就是所谓“人性复归”，任何多余的解释都将是赘笔，每一个中国血统的读者都会感应到这种炎黄子孙的细胞里所共有的感情基础是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由此而去思考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海峡两岸的人们将如何去超越政治信仰的歧异，卸下历史的重负，架起畅通的桥梁？

李黎的思乡小说，有自己的个性，就是格调

高亢。传统的思乡文学多以宛约见长，白先勇、余光中、於梨华等当代海外华人的同类创作，也无不充满感伤。当然，感伤是无可指责的，写得动人也是艺术的一种造化。况且，他们的感伤，确是现实授予作家的阴影，确是“陈天王”们迟迟无法“超越”的心境在文学的折光。然而，正如白先勇所直率地承认那样：由于这种感伤，“比起巴金笔下那批振奋人心，激励改革的人物，‘没有根的一代’无疑在产生鼓舞作用方面相形见绌。”（《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李黎作为崛起的新一代人，有意无意地要改变这种现状。偶尔，她也会感伤，但毕竟年青，没有宿仇的偏执，没有历史的十字架，悲昔怀旧、白头望乡之类的悲歌不属于她，相反，年轻的生命总是伴着希望。更主要的，是她幸逢了历史的转机，祖国大陆对外开放和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她面前展示了光明，“少小离家老大还”的现实坦途已经展现。李黎以自己回乡寻根探亲的切身体验，以千千万万海外同胞重归故园的事实依据，在创作中着力抒写着人们回到母亲怀抱的悲去欢来，倾泻着种种“近乡情怯”的欢欣。《近乡》就是这样一篇充满希望召唤的作品。小说中有一段描写读起来意味深长：当火车载着回大陆探亲的夏教授驶进故乡车站时，他首先看到的是月台上的大钟，时间正是他在美国家里的十六小时之后（时差——笔者注），他忽然想到，“这时已和台湾、大陆的亲友处在同一时刻，心中一热，眼眶也觉得热了起来。”这既是现实，又是象征和期望；时空的阻隔可以消融，亲人团聚的夙愿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说，李黎早些年就大声疾呼过：“既然曾经沧海，为什么不可以再回到大海里去呢？”那么，夏教授的选择正是对她的回答。这与“陈天王”的隔海观望恰成对照，事实上，那艘可以一直开往上海的“船”，在李黎的心中，早就已经扬帆出发了。

三、李黎的创作伴随着对人生价值的探索，她将理性的思考融入艺术形象之中，使现实主义的描写升华到较高的哲理境界。

从热血青年到“思考的一代”，李黎走着一条与大陆同龄人大致相似的路。在经历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全球性学生运动热潮之后，这一代人成熟了，开始转入了反省和思索。李黎的创作思路也转向了对中华民族以及更广阔的世界的再认识和再探索。“在这些年的动荡与反复之后，

这一代和下一代将用什么来肯定、来重建？在公元二千年的转角处，这一代中国青年将是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主人。那时迎接着我们的会是什么？我用以把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的，又会是什么？”（《西江月·后记》）沿着这样的创作思路，李黎不仅在批判现实的作品中投注了她的价值评估，不仅在“回归”题材中作出了她的唯一选择，而且，在更高的人生价值层次上，用创作回答了自己所提的问题。《天凉好个秋》可以说是她提交给这一代和下一代青年的一份答卷。

这篇小说，就题材选择而言首先就是大胆的尝试，她写了一个原先并不熟悉的领域——大陆人的生活、信念和追求。小说通过大陆老教授韩波赴美讲学，同阔别三十年的老同学严纾相逢时，两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感受，展示了他们不同的情操和价值观念。小说没有构想离奇曲折的巧遇，也没有渲染久别重逢的场面，而是用平平常常的叙旧问今，蕴埋下许多深思。

韩波是留在大陆，经历了三十年漫长的曲折和磨难的老学者，在国外的同窗旧友看来，他是不幸的，命运给他太多的不公平，他有理由抱怨和叹息，有理由自爱和龟缩，有理由在晚年要求偿还失去的名、利和一切，甚至可以因此而忏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留在大陆。然而，在海外的讲坛上，在重逢的旧友面前，他只有一句话：“为我的爱作出的选择，我没有悔。”小说没有回避韩波对十年浩劫的痛苦回忆：野蛮的斗争，妻离子散的剧创……更没有讳忌在动乱之后，他仍只是“暂栖在一间房里，守着劫余的一些书和少许箱笼杂物”这样的窘境。然而，他有比这些更富有百倍的东西，这就是对人民的爱，对祖国的爱。这种爱“没有条件，不求回报”。（李黎《家书——给一位故乡的诗人》，《清明》，1980年第3期）正因为如此，韩波才能不悔，并能在浩劫刚过，就带着创伤全心投入编书写作的拚搏中去。小说发表后，内地有个年青人写信给李黎，说韩波形象塑造得太高大了。李黎并不这样看，我们也不这样看。韩波的高尚的精神和情操，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李黎在她写的艾青、巴金等人的访问记中，也曾如实地记录过许多这样的中国人。（参见《北方的吹号者》，《七十年代》1980年第9期；《巴金访问记》，《八方》第2辑）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传统，而且，是比那还要崇高的理想和道德的结晶。

价值在对比之中更显出光耀。小说同时写了严纾。他数十年浪迹台美，功成名就，生活富有，但在退休之年，与韩波会面之后，他的洋洋自得的精神世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追悔自己一辈子的平庸，为自己对现实的“淡漠的妥协”而不安，为曾经昧着良心写“祝寿献辞”而羞惭，更为自己太早地捐弃了笔而枪然。总之，他感到“当年使得他与韩波分歧的一些所谓理想早已落了空”。严纾的懊悔和愁枪，不同于“陈天王”，而是一种人生价值失落的空虚感。在韩、严的对照之中，小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价值评判问题：一个人离开了祖国、人民，离开了最宝贵的自我尊严和爱，他还有什么！李黎在一次报告会上说：“我们是受了很多年的骗，有一些美好的东西的确是假的，可是仍然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是真的……如果你对世间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去怀疑，你已经没有剩下自己的一种价值标准了的话，你还有什么？”（《我的创作生活》，《读书杂志讲座》1980年第1期）小说的创作意旨，不仅值得海外的人们深思，对我们大陆的新一代，不也是很有启发的吗？

李黎的小说的哲理思索，没有故作玄妙的艰

涩，在平静的叙述中将思考自然地敞开，所敞开的也是很平凡的真理，然而，却与生活血脉紧紧相连，与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一块儿跳动，所以，它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性，象自由讨论或促膝谈心一样，容易打开人的心扉，这大概是这位青年现实主义作家的思辩的一个风格吧，也是她的小说富于启迪的思想力量之所在。

李黎在海外文坛算是一个新秀。唯其年青，所以才有全新的创作思想风貌；唯其年青，才使我们在阅读时往往不苛求她在艺术造诣上的欠缺。李黎有强烈的表现欲，这既带来她的热情，也带来创作上的直露和粗放；她对生活深层的底蕴的触觉敏感，并埋头深掘，但在表现时，有时却忽视了生活表土的丰富多彩；她的一些人物，有真挚明净细腻的内核，外态上却显得不够饱满和多姿。老道、圆熟，是随着创作实践逐渐生成的，我们期待着她。但这丝毫不影响她所付出的劳动的价值。她的追求是不息的，因此，她将提供给祖国和同胞的东西也定是不息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初稿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稿



余光中乡愁诗的民族意识感断议

刘学工

[1] 台港著名诗人余光中，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首创者之一。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时，便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三十多年，浪迹台、美、港各地，创作颇丰，先后出诗集十三、四种，散文、评论集七种，译作八种，以及十余种英文论著，在海外诗坛、文坛影响很大，据黄维梁先生统计，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九年二十七年间，海外有关余先生的介绍、研究文章达一百八十余篇之多。近年来，大陆学界诗界对余先生的作品亦开始介绍，赴港大陆学者、作家和余先生之间也多有交流，以沟通两岸文化艺术信息，密切同胞手足之谊。

观余光中先生诗歌创作的全部历程，私意以为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创作走的是一条由西方古典浪漫主义进入西方现代主义的道路，该时期作品，明显受西方现代哲学、文学影响，虽不乏佳句，诗风上不无虚无晦涩之弊，总的成就不敢恭维过高。他的第五本诗集《莲的联想》标志着他创作上的重大转变，进入了以乡愁为主要特征的后期诗歌创作。诗人循着回到古典的中国，进而再回到近当代的中国这样一条道路，接连写出了《莲的联想》、《敲打乐》、《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等多本诗集，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本文所论，是他后期乡愁诗的民族意识感问题，这既是他后期的诗魂，也是他本人的心曲。乡愁诗、词，多不胜数，多数所表现的是思乡怀人这类的乡土意识。但凡因为国家沦亡、民族分裂而漂零异乡的流浪诗人，往往在乡思之中更增一层忧国怀故之愤。这也是时代为他们提供了把个人忧患与整个民族命运连在一起的历史、地理、社会等方面的条件所致。余光中正是当代的这样一类诗人，他出生在大陆，顶戴过祖先祈祷过的蓝天，脚立过祖先血汗浸泡的土地，他的根原在大陆，而如今，一道海峡把他与生养他的故土隔绝了三十余年，不但如此，他还经历过浪迹海外的生涯，尝过作异邦人的甘苦。当他的思绪回到生养他的大陆，当他对故国的古往今来浮想连翩时，他不能不感受到祖国分裂局面对他的刺激。当他置身外国人之中时，他不能不感受到自己是中国人。落笔为诗，他的缠绵悱恻或慷慨悲凉的家国之情、古今之忆，就自然地超越了乡土意识的局限，升华到民族意识的高度。乡愁成为维系他与大陆，与中华民族母亲之间联系的一条脐带。

[2] 余光中乡愁诗中民族意识感首先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抗拒，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怀念与肯定。这部分作品主要作于旅美期间。身处西方现代

文明的环境之中，作者宣称：“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顽强地保持着“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硬。”不愿随波逐流。作者的这种态度，是根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上的。这种认识在《芝加哥》一诗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作者以芝加哥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把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喻为盘踞在由林立的高楼、纵横的街道组成的有形的蛛网，和由金钱、权势、欺诈、恐怖等组成的无形的蛛网中的大蜘蛛。它无情地吞食着“天文数字”般繁多的小虫，以文明的毒液消化猎物的躯体和灵魂。诗人又把摩天大楼——西方文明的骄子——喻为“文明的兽群”，诗人内心强烈地感受到兽群对自己的压迫，它们“以立体的冷淡”，以“阴险的几何图形”，“以数字后面的许多零”，压得人们濒于窒息。这种压抑感，在许多旅美作家的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它是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对人的压抑，也是蛛网代表的资本势力对精神的压力。对这种压抑的顽强拒抗，是一个由东方民族文化哺育长成的诗人的“心理本能”。在《我之固体化》一诗里作者写道：“我本来是很液体的/也很易流动、很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只有在祖国的太阳照耀下，这块冰才能还原为水，才能再玩虹的滑梯。余光中对中国的思念之情如山溪之水，委婉曲折地传递出来了。正是有了中国太阳作为希望，作者才有了拒绝融化于西方的勇气。同样，在《芝加哥》一诗里，作者面对“文明的兽群”的巨大压力，说：“压我，压我，却压不断/飘逸于异乡人的灰目中的西方地平线”。从芝加哥眺望，大洋正西就是祖国。这便是力量所在，异乡人的精神因此挺立不倒。

余光中就是这样，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抗拒态度和深广的民族意识统一于他的乡愁作品中，民族意识是抗拒态度的基础，抗拒态度使民族意识更加强烈，二者相得益彰。

[3] 余光中诗歌的民族意识感的复苏，具体反映在他的文学观的转变过程之中。早期的余光中，曾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倡导者，狂热追求和迷信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和诗歌表现方法，对传统采取蔑视和否定的态度，甚至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也一概否定，主张“降五·四的半旗”，“焚化徐志摩，在烟灰缸里”。（《天狼星》）赴美留学后，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和对现代派登堂入奥的了解，他开始对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表现方法的现代派诗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对存在主义否定人的价值，宣扬逃避现实，对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上的虚无晦涩感到不满。作为一个尊重事实的诗人，他发现台湾现代派的那些超越时空物我的诗作，在美国也不受欢迎。美国人编辑中国诗歌，总以艾青、田间等人有鲜明的民族性的诗为中国诗的代表。这使余光中意识到民族性是文学的根本，“唯有真正属于民族的，才能真正成为国际的。”（《在冷战的年代·后记》）在《再见吧，虚无》一文里，他对现代诗发出了檄文：“虚无主义否定了神、社会、文化传统，然后否定了诗人的灵魂，把一切固有的价值放弃之后，又不能建立起新的价值，诗人面对的即是毫无意义的生活，与不可辨识的灵魂。”（《蓝星诗页》三十七期）指出了现代诗的弊端之后，他说声“再见”，毅然地回到民族文化的土壤，追求和探索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他的乡愁诗，就是文学观转变后的产品，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就具体

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派的批评和反叛倾向。在回归民族传统的奠基作品《莲的联想》里作者写道：“想起西方，水仙也渴毙了/拜伦的坟上/为一只死蝉，鸦在争吵”。既然，西方诗歌精灵的水仙已死去，拜伦式的浪漫激情被埋葬，剩下的只有阴涩噪耳为死蝉纷争不息的鸦鸣，这样的文艺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对世纪末的那种时髦的迷惘、感伤情绪，作者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虚无成了流行的癌症/当黄昏来袭/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为了抵抗这种癌症，作者回答：“而我却拒绝远行，我愿在此/伴每一朵莲/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拒绝远行，表现诗人不愿再陷入现代派的泥潭。而莲，照他解释，是一个纯东方、纯中国的象征。尽管这个“东方”、“中国”带有玄言佛理的神秘色彩，但毕竟是作者生长的土壤，是他的血肉之躯的真正活力所在。这首诗成了他后期乡愁诗创作的奠基石。

[4] 告别了西方现代派，余光中把自己的诗情倾注到对祖国山川、民族历史的思恋与讴歌上，直接抒发对祖国、民族的感情。这类诗在乡愁诗中占很大比例，是他乡愁诗创作的民族意识感的集中体现。他为自己的这类诗歌创作勾划了一个广阔的范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白玉苦瓜·序》）这与现代派遁入空无的超时空观俨然对立，使他的创作根植于广泛深厚的中华民族基础之上。在这个领域里，诗人的笔触“上接九霄，下临无地”，巨伟者如祖国五千年历史，纤微者如阶前一片霜叶，无所不及。历史人物，神鬼传说，山川风物，世故人情都包容于一支笔下，塑造了一个繁富广博的诗的世界。

台湾小说家陈映真曾说：我们的民族，是富于文学资产的民族，然而，在大部分我们这一代作家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却只能在一大堆外国的、世纪末的作家中和作品中，把别人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余光中也认识到这一点。“少年时代，笔尖所沾，不是希波克灵的余波，便是泰吾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一八四二的葡萄酒……”他在乡愁诗中对祖国、民族的思恋与讴歌，是由否定自己过去而产生的自觉行为。他希望通过乡愁诗，唤起“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照见民族的骄傲、屈辱，从而寻求民族的永生。这种顽强的民族意识在《白玉苦瓜》一诗中表现得极为尽致。在这首三节三十六行的诗中，诗人以台湾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玉雕白玉苦瓜，象征民族、艺术和诗人自己。在第一节里，作者描绘的白玉苦瓜，是作为整个民族象征的有生命的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瓜的成熟，也是民族的成熟，这成熟全赖“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这乳浆的构成是丰富的，有“长臂比长城更长/胡骑奔突突不过他的臂弯”的民族英雄，也有“江鱼吞食了二千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的三闾大夫，有燧人氏的火，有孟姜女的泪，“喂了又喂，一代接一代”，从嫫母以降，这乳浆流了五千年，使中华民族有如苦瓜，经过日雕月琢，“完美的圆润呵酣然而饱”，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在第二节里，苦瓜成了作者自身的象征，描写的是诗人与祖国、民族的关系：“硕大似记忆母亲，她的胸脯/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用蒂用根去系他的恩液”。苦瓜——诗人自我，要把根须茎脉伸向祖国、民族的土壤，这土地，“每一寸都是慈爱的母体/永不断奶的是长江、黄河”。正是靠着母体恩液的哺育，诗人才和整个民族一样，

经历了“皮靴踩过，马蹄踏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的考验，以及更多一层的流落海岛、异邦的磨炼，使民族精神和自我的民族意识“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这种对祖国、民族的密切无间的依附感，在受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很深的台湾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在第三节里，诗人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诗人的民族情感做了艺术性的升华。正如玉雕的苦瓜：“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不产在仙山，产在人间”，经过沧桑变化，只这仙果的原身已经古朽了，雕刻这只仙果的巧腕也已古朽，但其精神却注入白玉之中而得以永恒。整个中华民族也是这样，几千年的业绩已成历史，创造业绩的前人亦已逝去，然而民族的精神却如玉雕的苦瓜那样永久流传。“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渴望自己的诗歌能够成为民族历史和个人遭遇的记录，使这一切中具有的价值得以恒久保存，这便是他反复咏唱祖国历史、山川、风物的根本原因。

[5] 余光中为祖国的大好河山、民族的辉煌历史而骄傲，相形之下，他不能不为祖国的分裂局面而伤感。一道海峡隔断了两岸的联系，使他不能不觉得：“所谓中国，只是一种古远的芬芳。”三十余年的隔绝使他对大陆产生了陌生感，但那毕竟是埋着他的脐带的地方，是他愿以全部生命附着其上的土地，因此，对分裂局面的不满，渴望祖国的统一，成为他的乡愁诗民族意识的核心。在他的许多诗歌里，我们都能倾听到统一的呼唤，尽管在表现上有时是曲折含蓄的，但正因如此，才更令人确信这种愿望根植于诗人的灵魂深处。在《北望》一诗里，余光中写道：“呎尺大陆的烟云/一缕半缕总有意撩在/暮暮北望的阳台”，“有意”二字恰恰托出了对大陆的眷恋之情，因为烟云的后面：“湘云后面是楚烟，山长水远/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而作者却不能置身于其间，隔深圳河北望，心中别是一番滋味，这滋味就是《乡愁》一诗所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条海峡划出的分界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情感上的，心灵上的，犹如一条伤口，横在望归人心中。诗人感到落拓：“海客满座尽是南飞的鸟鹊/无枝可依依了三十个春秋”（《中秋夜》）；诗人感到怅恨：“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江湖上》）北望大陆，诗人有时幻想着：“为了重认母亲/吮吸甘醇的母奶/张开肥沃的子宫呵/让我再重头向你投胎”。（《投胎》）有时，诗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死后：“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当我死时》）应当说，通过再生和死葬的异想表现的对分裂局面的不满是隐晦曲折的，但又是十分真切的。正因不满而又无奈，才发此异想。在另一些诗里，余光中也曾直抒胸臆表现统一的愿望。比如作于一九七四年中秋的《中秋月》一诗，他仰天喝问：“何日重圆，八万万人共婵娟。”在《老火车站钟楼下》里，诗人想着：“有一天/三十年浪子回头的快车/在此吹笛……”身在异地，诗人凭对祖国的骨肉之情，隐约听见“母性磁音的呼唤”，唤游子归家，他自信“那土地，凭嗅觉也摸得回去”。诗人坚信自己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纵有千折百回，终会流向黄河。诗人无时无刻不把台湾和大陆看作一个整体，这是一个经历过“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浊流的海外中国人的可贵之处。当然，对如何统一的问题，作为台湾诗人的余光中有他自己的见解，我们相信，诗人和每一个台湾人终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做出正

确的抉择。统一大业，势在必行，余光中以他的诗和我们共鸣。

[6] 余光中是台湾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的个人经历在台湾知识分子中（尤其是中、上层），具有一定代表性；诗人思想变化的过程（由对西方迷恋到抗拒，由对祖国、民族的疏远、淡漠到亲近、向往，以及渴望统一），也具有普遍性。诗人把这一切付诸于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因此，余光中在台港现代诗坛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成就是不可低估的。当然，在他的一些乡愁作品中，也存在一些消极怀旧的倾向，对古老文化的留恋之中，也似乎缺乏必要的分析扬弃，关于这一点，台湾的陈鼓应先生曾撰文提出批评，批评他在一些诗中沉醉于文人仕女风流韵事的描绘，指出他的怀旧蔑今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乡愁诗的价值，这样看是否妥当，我们愿向余光中先生请教。



有无之辨与自然雕饰之争

——魏晋南北朝两种审美情趣的玄学根源

袁 济 喜

《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刺绣，亦雕绩满眼。”钟嵘《诗品》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这些记载其实反映了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两种审美情趣：从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到南朝的陶渊明、谢灵运，以及标“自然之道”论文的刘勰、倡“自然英旨”品诗的钟嵘，都推崇自然天真、芙蓉出水的审美情趣；从西晋的陆机、潘岳诸人到南朝的颜延之、萧纲、沈约等人，则追求雕饰藻绘。魏晋南北朝这两大美学风潮的形成原因，除受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外，与玄学中的“有无之辨”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玄学成为整个社会的学术文化思潮，甚至影响到人们的立身行事。审美创作也受到玄学思潮的冲激，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六朝大诗人和大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无不浸染上了玄学成份，陆机、刘勰等大美学家，在构铸自己的理论大厦时，更是自觉地运用了玄学方法论。^①所以，六朝的美学与先秦两汉和后世相比，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更紧。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学说，渗入到自然派（姑且让我们这样称呼）的审美观念中；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崇有论，则为雕饰派的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这两种思想和审美情趣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融汇，越到南朝后期就越明显。

魏晋南北朝“有无之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儒道两家之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儒家推崇有为造制；老庄则倡言自然无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②“无”即自然之道，自然是精神实体“道”的最高法则，即“道法自然”。^③

老庄以自然之道来摒弃儒家的仁义礼乐和鬼神天命之说，要求人以自然真心来叩合大道，与道合一。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兴起。王弼、何晏“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④他们把“无”作为宗率万物的精神实体，无与有，道与物都是本末体用的关系，将老庄哲学演变为贵无的玄学本体论。而“无”又以“自然”为其存在方式和变化法则，审美上便倡导以自然为本，返朴归真，摈绝华丽雕饰，当时的阮籍嵇康便是把任从自然、反对礼法作为人生理想来追求，大声疾呼：“越名教而任自然！”^⑤西晋年间，随着士族统治的确立，儒学又有所抬头，《晋书·裴頠传》载：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遵儒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他的这种观点被“以儒道为一”的向秀和郭象进一步发挥了。向郭的哲学代表了世族贪竞用世的心理。针对何晏、王弼以无为为本的思想，向秀、郭象提出无不能生有，“夫老庄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⑥他们认为万物自生自灭，不存在有无本末之分。如果说，王弼把“自然”作为“无”的体现，郭象、向秀则把“自然”看做任物之性，提出：“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⑦竭力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向郭的所谓“自然”，离老庄、王弼的原义相去甚远，它成了有为造制的属性，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从哲学史角度来说，“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的最高论题，它探讨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玄学的其它范畴、命题，都统率于它，“自然”与“有为”也是从其中衍化出来的一对命题，当时人们对自然与雕饰美学问题的看法，就与玄学的“有无之辨”有直接联系。

三

首先，贵无论与崇有论在人生哲学上的差异，直接启迪、引发了自然派与雕饰派的美学观。嵇康说：“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⑧喜欢自然也好，追求雕饰也好，从根本上来说，都表现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而这种情趣又是与审美主体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相对应的，文品与人品密不可分。在贵无论看来，天地万物以自然之道为最高范畴，人应该以自然纯朴之心来冥合大道，达到与道周始、逍遥遨游的“大美”境界。庄子讴歌：“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与之争美”。^⑨王弼提出：“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⑩崇尚自然的文学家则大抵鄙弃声色和荣利，体道自然，而嗜爱山水清音。他们认为，山水自然是“道”的最好体现，“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⑪嵇康喜好“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的山水，^⑫谢灵运沉溺“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的心境，^⑬陶渊明流连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田园风光，^⑭都是这种审美情趣的表现。南朝宗炳：“好山水，爱远游”，他撰《画山水序》，极言山水自然启人神思的审美作用，提出：“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峰岫峩峩，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东晋末年画家王微在《叙画》中则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认为领略山水之美的情趣是欣赏音乐和摩玩玉器所不可比拟的。可见，审美主体的素朴与喜爱山水清音、体道会玄的情趣有内在联系。

崇有派则充分肯定人的情欲和感官享受。他们认为：“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⑮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情欲既然为人之天禀，也就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和纵任。向秀驳嵇康“养生论”，提出：“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享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⑯这种放纵情欲的快乐主义在东晋人伪造的《列子》中得到充分阐扬。作者假托晏子与管仲的对话肆无忌惮地宣传纵欲论：“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

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⑰齐梁之际，世族愈益腐朽堕落，及时行乐的纵欲思想发展为一种社会时尚。梁代官僚鱼弘直言不讳地说：“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⑱“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尽一时之绝”。^⑲生活在贵族官僚生活圈子中的一些文化修养较高的人把这种感官欲望追求导向文学创作，色情内容不可避免地浸染到文学创作领域。梁简文帝宣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⑳就是要求把立身谨慎时不敢放纵的情欲一古脑儿地渲泄在文章中。从极度追求感官刺激的审美情趣出发，他们自然不满于原来的山水清音。在他们看来，浓烈的情欲必须配上刺眼的雕饰方能厌人口味，所以，宫体诗的色情内容和它的讲究声律、词采是不可分的。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提出文章的审美标准应该是：“绮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前三者是形式，后者则是所要表达的艳情内容，这四者合在一起就构成齐梁时讲究雕绘藻饰之美的主要特征。

应该指出的是，自然派的山水清音往意味境玄远空泛，形式质朴无文，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之感，晋宋时玄言诗人的山水诗更是“淡乎寡味”。所以时间一长，人们自然对其感到乏味。雕饰派充分肯定人的情欲，赞美世俗生活，注重对自己周围生活的细腻感受和描写，将山水皐壤、风花雪月、灯烛镜台，都摄入诗境，大大扩展了题材范围。如齐梁体代表作家徐陵集中有《咏雪》、《咏柑子》、《紫骝马》、《斗鸡》、《咏舞》、《咏织妇》，庾信集中有《灯赋》、《对烛赋》、《镜赋》、《小园赋》、《竹杖赋》、《枯树赋》等。这些抒情诗赋融入了作者的沉痛悲凄之情，描写细腻新奇，在南北朝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入许多不为传统文学所重的民间作品。这些作品或诉宫怨闺思，或叙爱情悲剧，其中虽不乏色情之作，但相对于自然派放逸山水的审美情趣，更近于世俗人情，使人一唱三叹之余，其乐也融融。

三

贵无派和崇有派在辩论自然与雕饰时，不仅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还把眼光放到包括人

类在内的天地万物的生存、运动规律上去加以考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感罔之迷”，^{②0}王弼论《老子》方法论的这两句话，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魏晋玄学注重探讨事物本体和发展演变规律的理性精神。

贵无派的无为本，认为万物的运动、变化只是其现象，而本体、规律则是寂然不动的，因此，素朴之性是一切华美雕饰的本原和归宿。王弼云：“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②1}这一“运化万变，寂然至无”的动静观和方法论影响到自然派。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反对儒家的有声之乐，认为声音的自然和谐最为至妙：“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他力证远古时人们崇尚的是“无声之乐”，后来圣人制礼作乐，乃是泄导人情，虽不可废，但已不是最好的乐了，企图用合乎“天籁”的“无声之乐”来反对后世染上神学色彩的有声之乐，这同他在政治上反对“名教”对人的钳制，要求恢复人的素朴本性的思想是一致的。阮籍也认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②2}在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中，他斥责礼德之士：“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他通过对逍遥遨游的大人先生的描绘，强烈地反映了渴慕返朴归真的伦理观和审美理想。陶渊明把嵇阮的主张付之审美实践，“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刘勰也反对绮艳文风，倡导“自然之道”的审美情趣。他论文以儒家思想为宗，但也吸取了王弼返朴归真的动静发展观。《文心雕龙·原道篇》提出在天地两仪之间，“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天地万物皆有文，人之有文，亦属自然。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是某种精神本体的外化和显现。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他们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自然之道的最好体现，创作必须以这些圣典为楷模和摹本，返本归初。《情采篇》进一步把儒家的文质观和老庄的素朴说结合起来：“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提出：“衣锦褻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可以说，贵无派的动静观为反对齐梁绮艳文风的作家和文论家提供了理论方法。

崇有派的动静发展观则基于万物各有自性，

非有本末之分的理论之上。他们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着的，不存在周而复始、正末归本的规律。郭象、向秀注《庄子·齐物论》：“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时云：“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与时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注《知北游》云：“出入者，变化之谓耳，言天下未有不变也。”既然如此就应该适时应变：“夫圣人游于变化之涂，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遯之哉！”^{②3}“时移世异，礼亦宜变，故因物而无所系焉，斯不劳而有功也”。^{②4}雕饰派吸取了这种通变的思想，认为文章愈演愈华乃是必然趋势。东晋葛洪说：“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②5}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还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在分析建安以来的文学发展演变时提出：“朱蓝共妍，不相祖述”，与刘勰的“正本归末，还宗经诰”相反对。返朴归真发展观难免迂曲保守，因而就连不那么爱好华艳的萧统也反对这种说法。他在《文选序》中指出：“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他编《文选》时，把圣人经典和诸子文章客客气气地请了出去，偏重于收那些“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章，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为了追求新变，齐梁作家竞相雕琢。《南齐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于往时。”《陈书·徐陵传》载：“（徐陵）为一代文宗，……其文颇变新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趋求新变，必然离不开别出心裁，雕饰巧为，其思想来源，盖出于向秀、郭象。

四

贵无论与崇有论在宇宙本体论和发展变化观上存在的分歧，也反映到它们对社会人事的看法上，前者主张顺物自然，后者则主张有为造制，这两种实践观也影响到当时人们对审美创作问题的探讨。

由于“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②6}故自然派认为文须顺物之性，自然而发。刘勰论文，针对当时追求“讹”、“滥”、“淫”的倾向，大力提倡自然之道。所谓

“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如机矢直，洄曲湍回，自然之趣（趋）也”，“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钟嵘对齐梁文坛追求用事、声律的雕琢之风十分不满，指出：“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激烈抨击过分讲究声律、“伤其真美”的审美情趣。可以说，越是到文风大艳的齐梁时期，自然之道的美学观也就越发显出冲激浓艳华靡情趣的清新之气。

雕饰派的理论根据是郭象的“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②的思想。郭象反对王弼素朴为万物美之本原的看法，认为素与不素只能在“亏”与“不亏”的相对意义上去加以理解，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尺度，“苟以不亏为素，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苟以不杂为素，则虽龙章凤姿，情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③也就是说，只要搭配合谐，不杂外物，再雕饰艳丽也可称为纯素。这就为雕饰论者披上了一层合乎自然的外衣。与郭象差不多同时的陆机在《文赋》中便力言雕饰有为的重要性：“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从词采、声律到立意，他都力主雕饰。沈约倡导的声律论，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本来，在古代诗歌创作中早就有自然声律，沈约也承认：“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④但他认为自然声律不能完美地体现诗歌的形式美，必须加以人为地规范和制作。他和周颙等人创立了“永明声律论”，对推进中国古代诗歌韵律美的发展自有其贡献意义，但过于拘执讲求，就不免要致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萧绎的“文笔说”，也反映了雕饰派的美学观点。在萧绎之前，范曄、颜延之和刘勰论述“文笔之辨”时，已经开始把“文”与“笔”从有韵还是无韵上加以区分。萧绎在《金梭子·立言篇》中，把“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抒情文学叫做“文”、“善为章奏”的实用文体叫做“笔”。这样，“文笔”之分就比有韵无韵更进了一步。萧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将雕琢文采、锤炼声律和抒发性灵作为文学有别于应用文的主要特征。雕饰派的创作论，同向郭的崇有论的实践观显然有直接关系。

五

自然与雕饰这两种审美情趣虽然长期对峙，但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融合。从总体上来说，“有无之辨”属于玄学内部之争，具有互相发明、取长补短的反馈意义。王弼以无为为本，但又申明：“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⑤他一方面提出：“崇本息末”，一方面又主张：“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⑥这种调和“名教”与“自然”矛盾的思想在向郭那里一跃而变为“名教”与“自然”合为一体的理论。物极必反，崇有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贵无论的补充与修正。同样，在审美领域内，一味吟咏山水泉壑，总会使人感到厌倦，萧子显就说谢灵运之体“酷不入情”。^⑦实际上，谢灵运以山水诗取代“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时，已经开始追求词藻，有意识地克服玄言诗平淡无味的风格特征。就文论家来说，刘勰标举“自然之道”，但也不绝对否弃雕饰，他最推崇的圣典就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⑧钟嵘《诗品序》提出“诗之至”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同样，雕饰派在论雕饰有为时，也汲取了某些任乎自然的思想。沈约论音律时提出：“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⑨《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沈隐侯（沈约）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邢子才尝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这些，都说明质朴自然与华丽雕饰是可以互相融汇的。从我们今天来看，这两种审美情趣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具姿态，交相辉映，雕饰不能为自然之清真，自然也不能为雕饰之华美，我们不赞同韩愈那种“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的简单评语，自然也好，雕饰也好，它们作为一种审美风潮出现在当时，且并存在着深远的思想渊源，也是人们不同的审美心理情趣的反映，并不是几个齐梁文人“蝉噪”的产物。

① 参见笔者与人合作《〈文心雕龙〉与魏晋玄学》（《文心雕龙学刊》第三辑）

② 《老子·四十章》

③ 《老子·二十五章》

④ 《晋书·王衍传》

⑤ 嵇康《释和论》

⑥ 《庄子·在宥注》

⑦ 《庄子·骈拇注》

⑧ 《声无哀乐论》

- ⑨《庄子·天道》
 ⑩《老子·三十二章注》
 ⑪阮籍《达庄论》
 ⑫《晋书·嵇康传》
 ⑬《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⑭《饮酒》
 ⑮⑳㉑《庄子·大宗师注》
 ⑯《难养生论》
 ⑰《列子·杨朱篇》
 ⑱《梁书·鱼弦传》
 ⑲《诫当阳公书》

- ㉔《老子指略》
 ㉕《老子·十六章注》
 ㉖《清思赋》
 ㉗《庄子·天运注》
 ㉘《抱朴子·钧进篇》
 ㉙㉚《老子·三十八章注》
 ㉛《庄子·刻意注》
 ㉜㉝《答陆厥书》
 ㉞韩康伯《周易·系辞注》引
 ㉟《南齐书·文学传论》
 ㊱《文心雕龙·征圣》



荆 蛮 浅 释

李 默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指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

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穀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芣》：“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

(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芣》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

(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汉流域荆州楚地。《文选·王粲·七哀诗》：“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文选·吴都赋》：“包括干越，跨蹶荆蛮。”(唐)李善注：“荆蛮，吴所得荆州四郡，零陵、桂阳、长沙、武陵。”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半路上又改为朗州司马，行经江陵，见到韩愈，韩愈时为江陵法曹掾，江陵即古荆州（今湖北省沙市以西），韩愈盛情款待，刘禹锡写诗说：“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驶。今朝会荆蛮，斗酒相燕喜。”(唐)王勃《滕王阁序》：“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这些都明确地指出荆蛮（或蛮荆）是指长江中游荆州楚地。还有说为楚越之界。《史记索隐》云：“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言之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地在楚越之界”。也有泛指周朝江南扬越之地，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汉书·贾捐之传》：“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

论东晋的山水诗

李文初

在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出现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刘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研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理论家，《文心雕龙·明诗》中写到：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狗彘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这段论述至少表明三个观点：东晋一朝是玄言诗一统天下；山水诗到“宋初”才开始出现；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庄老”（玄言）与“山水”是处在对立的两个方面的。

然而，我们考察一下晋宋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却发现刘勰这些看法并不那么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

说到山水诗的创作，谢灵运的功绩自不容抹煞，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山水文学从附庸蔚为大国，并在题材上成为一种稳定的、影响深远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谢灵运之前绝无山水诗可言，更不能说谢灵运的山水诗已与玄言彻底决裂了。

事实上，东晋时期已经出现不少山水诗，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纪游性的山水诗，一种是杂糅玄理玄趣的山水诗。

二

如果说东晋时出现了纯粹意义上的山水诗，那就是以模山范水为主的纪游诗，它是伴随人们追求山水之乐的风气而产生，也是人们认识自然不断深化，从而使自己的审美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在文学上的反映。

本来，人与山水自然的关系并不自始就是和谐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控制自然“威力”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改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由原先的对立趋向协调，在人们心目中，那些充满神秘、恐怖气氛的奇山异水终于由灵异转化为富有美感的胜境了。正如《水经注》卷三十四引袁山松语云：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者。及余来践跻斯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余）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东汉以来，由于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一些失意的达官和失职的穷士被

迫离开市朝，走向山林泽藪，寻求精神的寄托。他们在与大自然的实际接触中，深感自然山水可以怡神养性，愉悦情怀，给人带来无穷的精神享受。荀爽《贻李膺书》说：“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仲长统十分向往田园山水之乐：“跨躡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①到魏晋时，崇尚自然的风气更盛，人们不仅失意时借流连山水消愁解闷，就是平日，亦以登高临水为乐事。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岷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②。阮籍“登临山水，经日忘归”^③。嵇康视“游山泽，观鱼鸟”为人生一大快事^④。不特风流名士、高蹈远遁者有此雅兴，据葛洪《抱朴子·疾谬》称，甚至妇人也有因“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而“冒夜而反”的。东晋时，北人南迁，王谢大族经营东土（会稽诸郡），浙东一带灵秀山水，吸引着许多人的兴趣。谢灵运说：“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⑤正反映了人们追求山水之乐的空前盛况。

这种风气反映到文学创作上，起先是在某些纪行赋和咏物赋中表现出较多自然山水的描写，如潘岳的《西征赋》、《登虎牢山赋》、《沧海赋》、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潘）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当然，这些赋中的“山水”，多数尚未独立成篇，所以西晋时的山水赋还很少，真正的山水诗则到东晋时才明显地多起来，那时的山水诗，倒是“纪游”一类出现较早，如李颙的《涉湖诗》：

旋经义兴境，弭棹石兰渚。震泽为何在，今唯太湖浦。圆径萦五百，眇目缅无覩。高天淼若岸，长津杂如缕。窈窕寻湾漪，迢递望峦屿。惊飘扬飞湍，浮霄薄悬岵。轻禽翔云汉，游鳞憩中浒。黯蔼天时阴，崑崙舟航舞。凭河安可殉，静观戒征旅。

这首诗写出了太湖宏廓壮美的景象。从艺术上看，诗人似乎有意从上下、远近诸种角度去展现太湖变幻莫测、神秘惊险的风貌，给人鲜明的立体感。后来谢灵运那种一句写山，一句写水，一句写远景，一句写近物，造成强烈的空间印象的写法，在这里已有先例。另外，这首诗在修辞上很注重词语的对称，如“高天”以下十句，全由对偶工整的诗句构成；谢灵运的山水诗多骈偶之句，在此亦可觅见渊源。

再如被后人视为玄言诗代表作家之一的庾阐，现存诗十余首，其中，《三月三日临曲水诗》、《三月三日诗》、《观石鼓诗》、《登楚山诗》等，都是纪游性的山水诗。试看《观石鼓诗》一首：

命驾观奇逸，径骛造灵山。朝济清溪岸，夕憩五龙泉。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如神自然。翔霄拂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日翫阳葩鲜。

这首诗除注重对偶外，还颇考究字词的锤炼。庾阐在晋文坛享有盛名，《扬都赋》固然妙绝时人，被誉为“可三《二京》、四《三都》”，致有“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三贵”的盛况^⑥，被史家称为“中兴时秀”^⑦。

此外，如苏彦的《西陵观涛诗》，湛方生的《还都帆诗》、帛道猷的《陵峰采药触兴为诗》，都是写得有声有色的山水诗，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三

东晋的山水诗，更多的还是那种山水与玄言相杂的作品。如永和九年（353）暮春三月三日，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集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饮酒即兴，得五言诗二十三首，四言诗十四首，汇编成《兰亭集》。这些诗作，尤其是其中的五言诗，大多是“仰观宇宙”，“俯察品类”，熔山水、玄言于一炉的作品。有几首写景的比重较大，更洋溢着自然山水的清新气息。例如：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孙绰）

司冥卷阴旗，句芒舒阳旌。灵液被九区，光风扇鲜荣。碧林辉英翠，红葩擢新茎。翔禽抚翰游，腾鳞跃清冷。（谢万）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孙统）

这些诗的特点，一方面是“微言剖纤毫。”诗人力求揭示宇宙中那些难以言传的奥秘。读这些诗，深感诗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时”、“空”意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宇宙的恢宏无极，万物的生灭浮沉；然而，人的生命有限，“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对于空间的无限追求与其自身的有限生命，竟是如此的不相称，难怪王羲之要大呼“痛哉”了。⑩王羲之在《兰亭诗》中说：“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正是这种强烈的时空意识，使人们领悟到宇宙万物中“神奇”与“尘滓”相互转化的客观真理，从而激起一种积极进取，勇于“造新”的热情。另一方面，在“微言剖纤毫”的时候，一些诗人并没有忘记“携笔落云藻”，在诗中摄取大自然的色彩之美，在自然物中注入了人的情味。这点，上引诸诗可以证明。读这些诗，自有一种生意盎然的大自然情趣，说明“玄言诗人”的作品也不尽是“淡乎寡味”的。

其实，山水与玄言杂糅，乃是晋宋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形态，即如谢灵运的作品也绝少例外。这种情形，与魏晋以来玄风大畅直接有关。更明确地说，我国山水诗在晋宋时期勃兴，终至从附庸蔚成大国，实为魏晋玄风从积极方面影响文学创作的结果。由于玄风弥漫朝野，崇尚自然的思潮召引人们从市朝走向山林湖海，人们在与大自然的频繁接触中，发现游赏山水是体玄适性的理想方式或途径。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说到流连山水与领略玄趣的关系：

……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思幽岩，朗咏长川。

老庄学派认为，“道”是弥纶万物的宇宙本源，它至虚、至静、至淳、至朴，概言之，“道”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自然”。魏晋人追求的玄趣，正是老庄之“道”的“自然”。在当时

人性和社会都遭到严重污损的“市朝”是无法体验的；要领悟“道”的真谛，要体味“自然”的妙趣，只有投身大自然，到山灵水秀的天地中去。正如后来谢灵运所说：“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⑩放弃了游赏山水的机会，“自然”之“理”也就无从通晓了。与此相类，在老庄学派的概念中，“性”指人的自然天性。何晏说：“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⑪“性”有时又称“分”或“性分”，如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云：“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物任其性，称其能，各得其分，逍遥一也。”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所谓“适性”、“称情”，就是说人的主观天性不为客观外物所累。魏晋时期，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来的适性之求是相当执着的，反映了当时人们摆脱世事困束，渴求个性解脱的强烈愿望。而要使精神“适性”，也唯有托体自然，寄情山水。正如谢灵运曾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⑫

既然体玄适性都离不开大自然的山水，那么，人们在用诗表现这种领悟的时候，自然要借助山水的形象了。山水诗正是在这种风气下蓬勃发展起来的。那时的山水诗，或山水与玄言杂糅，或寓玄趣于山水，完全与玄理玄趣绝缘的作品是不多的。有人说谢灵运的山水诗是玄言诗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颇近实情。它又正反映了这段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最早尝试写山水诗的人为什么多是“玄言诗人”了。

我不认为那些仅有一二句描摹山水的诗是山水诗，也不赞成将涉及玄理的诗一概不加分辨地归于玄言诗。而在晋宋时期，那种寓玄趣于山水的诗应算山水诗，那种玄理与山水杂糅的，只要它显示了自然山水之美的，也不妨看作山水诗。以谢灵运的《富春渚》为例：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廓。定山緬云雾，赤亭无淹薄。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平生协幽期，沦蹶困微弱。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

全诗凡十八句，前八句写舟行富春江的见闻，属于写景之笔；后十句抒写胸臆，主要是发议论。其中，玄理的成分多于山水，但从来没有人说它不是山水诗。再看看被历代评论家视为东晋玄言诗人代表孙绰的《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飏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羨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诗的前十句写秋天的景物和气象，末四句颇有玄味，但与前面的写景之笔并不矛盾，因为诗人忘怀世事、澹泊情志的意趣与秋天的落寞景象在情调上是一致的。这种写法，在往后许多山水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到。

由此，我认为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即使诗中夹杂玄理，只要山水自然的形象是主要的，并展示了大自然的清新之美的，都应该看作山水诗。二、东晋一些“玄言诗人”的作品，某些原先被视为玄言诗的，其实已是真正的山水诗了。三、山水与玄言杂糅，本来就是我国早期山水诗的基本形态。

四

从上述情况来看，那种把山水与玄言绝对对立的观点，那种把玄言诗的发展与山水诗的发展分割为前后两个决然不同阶段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这种情形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很深，如清人王士禛说：“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划山水之词。”^⑧著名诗评家沈德潜说：“游山水诗应以康乐为开先。”^⑨直到今天，不是也有人说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吗？显然，这都是对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一说不加分辨的结果；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明诗》注中特别指出：“写山水之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正是对刘勰论断的合理纠正。

关于我国山水诗的形成时限，钱钟书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川依傍田园，若莛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愿言”，“应璩作书”，“铜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苍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管锥编·全汉文卷八九》）

钱先生将山水文学从“附庸蔚成大国”的时代断在“东晋”是比较可信的。按他的看法，汉代辞赋中虽不乏山水，但笔墨毕竟占全赋中的小部分，且或是帝王权势气派的一种摆设，或是借喻心性德行，它引发的不是山水自然的美感。在赋家的心目中，山水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东汉至西晋，出现了一类“山水依傍田园”的作品，但其中山水的作用多是状写田园乐趣的点缀或陪衬。这与东晋时人们考盘山林，着意追求山水之美的情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专事模山范水的作品是不一样的。谢灵运所谓“徒形域之苍蔚，惜事异于栖盘”，讲的就是二者的区别所在。

由此可见，东晋的山水诗及其他山水文学与前此的“京都大赋”、“山川之颂”、田园之作的根本区别：一是表现在山水描写的分量上，东晋以前，山水在作品中还只是“附庸”，至东晋才从“附庸”蔚成“大国”，即在题材上成为一篇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二是这种描写不是起比喻、象征或陪衬的作用，而是直接诉诸山水自然本身，山水成了作家真正的审美实体，别具一格的山水诗才算真正形成。

① 《后汉书·仲长统传》。

② 《晋书·羊祜传》。

③ 《晋书·阮籍传》。

④ 《与山巨源绝交书》。

⑤ 《与庐陵王义真笺》。

⑥ 《中国名胜辞典》，1981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⑦ 《世说新语·文学》。

⑧ 《晋书·文苑传序》。

⑨ 以上引文见《兰亭集序》。

⑩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

⑪ 《论语集解》。

⑫ 《游名山志》。

⑬ 《带经堂诗话》卷五。

⑭ 《说诗晬语》。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史 能

太平天国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近年来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从而提出一些新看法；二，过去较为薄弱的专题有所加强，如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本文不拟对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情况作全面概述，仅就这些新的情况略作介绍。

新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

在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整理。这些新材料包括文字、实物和口碑几种类型。

在文字资料方面。1980年发现的有关太平天国北伐的史料，其中有林凤祥、李开芳、黄峰及其他北伐军将士的供词；洪秀全、杨秀清、罗亚贵等人联名给北京城内刘氏兄弟的书信；以及林凤祥、李开芳等人被俘押解北京的奏摺等。其内容丰富，对研究太平天国北伐、评价北伐军主要领导人功过诸方面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文物》1980年第2期）1981年发现的太平天国诰谕三件，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条约军纪、执法如山和公举乡官、巩固基层政权的情况，这对研究太平天国的一些制度和地方统治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1981年，承日本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寄来的《道光咸丰内地骚乱事实》和《避难略记》，是苏州贸易商王氏十二家向日本方面报道有关太平军的情况，对研究太平军起义以来的形势及太平军在江南地区的活动很有参考价值。（《光明日报》1981年1月13日）1982年，在广西藤县发现了李秀成亲族的“族谱”，其内容与《李秀成自述》的内容有多处不符，这对准确研究李秀成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人民日报》1982年4月9日）198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王庆成研究员在访问英国时，发现了《天父圣

旨》和《天兄圣旨》两书，这不但能订正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史实，而且对研究太平天国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金田起义前的活动及起义的准备工作、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及基督教圣经态度的变化和天京事变前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7日）

在实物史料方面。1979年6月，在南京市发现了太平天国官印和官执照，对进一步探讨太平天国后期政权制度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文物》1980年第2期）同年12月，在广西贵县发现了《鼎建渡船碑记》一份共三块，为研究翼王石达开的家世提供了实物证据。（《历史知识》1980年第5期）1981年，在邓拓保存的文物中，发现太平天国在浙江石门地区颁发的《田凭》两件，《完银串票》一件和《预知由单》一件。对研究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的税收和官职变化方面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1983年，在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了有关太平天国在浙江绍兴郡尚虞县灶户赵成歧完纳灶课钱的业户执照两件，对研究太平天国征收过灶捐一事及税收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历史教学》1983年第8期）

在口碑材料方面。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提供了关于李秀成伪降的材料。罗尔纲先生认为这个口碑，是一条足以证明李秀成学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广西日报》1981年3月2日）

此外，一些研究者还从时人的笔记和日记中发现了有关材料。如王庆成同志从黄彭年笔记（即《黎雅纪行》，这是黄彭年随四川布政使刘蓉到大渡河处理石达开事所作的沿途记事）中发现了有关石达开在大渡河情况的资料，为研究石达开失败提供了佐证。（《光明日报》1980年3月25

四) 又如在柳詒徵的日记中发现了关于李秀成自供和天京失陷情况的资料。(《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

更可喜的是, 上述这些资料一经发现, 就立即为研究者们所运用, 从而对过去一些传统看法提出了新的不同见解, 活跃了学术争鸣气氛。王庆成在介绍《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两书的同时, 就援引两书中的材料指出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关于洪秀全从广西回广东与冯云山会面的时间记载不准确, 并认为洪、冯的会面不是为起义前作准备, 很可能是洪说服冯确认洪为首领和天王这个既成事实。此外, 文章还从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态度的变化来探讨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上的变化以及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7日) 郭存孝则根据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诰谕来否定石达开抵安徽后推行了以地主分子为主体的地方乡官制度的观点, 认为他对建立乡官制度采用既公举又查三代的做法, 是十分慎重而又严肃的, 决无主观上企图建立地主分子为主体的乡官制度的事。至于安徽地区出现过地主分子钻进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事, 应另当别论, 不能挂在石达开身上。他还根据诰谕中有“世袭”两字来论证“太平天国官爵的世袭性”。(《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姚迁、王少华等则运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官印和官执照来探讨太平天国政体变化的问题, 指出, 经过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的政权体制已完成了由虚君制到君主专制制的重大转化。(《文物》1980年第2期) 由于关于太平天国北伐史料的新发现, 使原来的争论更进一步深入。如对北伐将领林凤祥的籍贯、身世及履历等问题, 有人认为他是: 广西浔州人, 广东揭阳人, 广西武鸣人; 他是本世家子; 他参加起义时已六十来岁。秦国经根据新发现的《林凤祥供词》提出新的见解, 认为林是广西浔州桂平人, 说他是浔州人基本对, 但尚不具体; 林一家生活贫苦, 非本世家子; 他牺牲时才三十一岁, 非参加起义时就六十余岁。秦文还指出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对林记载的一些错误。(《文物》1980年第2期) 对北伐的目标, 黄国盛在《太平军北伐的战略意图和失败原因新探》一文中, 运用新发现的史料分析太平军北伐战略意图有两个: 一是过黄河, 夺取天津; 二是在天津“扎住”后待援。所以认为北伐的目标不是北京而是天津。(《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舒翼在

《太平天国北伐军若干史事考辨》一文中, 同样援引新材料认为北伐的最终目标是北京, 并且指出太平天国领袖们为攻夺北京而联络京内刘氏兄弟作内应。(《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由于一些有关捐税方面文物的发现, 使太平天国的捐赋税制度的研究得到加强。吴竞在介绍新材料的同时, 就认为灶捐是田赋的附加税。他还据“业户执照”指出太平天国对灶课钱并未足征的情况。(《历史教学》1983年第8期) 缪景湖在《灶捐不是田赋附加税》一文中提出异议: 灶捐、灶税统称为灶课, 不是田赋, 也不是附加税, 它主要向盐户征收。(这一点为吴竞后来同意) 而且从执照本身看, 太平天国的灶课分两季收足。(《历史教学》1984年第10期) 牟世安在文章中, 则根据新发现的《田凭》来论证苏浙地区农民对地主的抗租斗争和农民积极向太平天国政权完纳钱粮; 根据《完银串票》探讨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官职变化; 根据《预知由单》提出新的问题: 《预知由单》列出了土地的种类和数量, 在土地的种类中又都把它分类为田、地、荡或荡滩三种, 这就使人们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太平天国后期在苏浙地区田有《田凭》, 荡有《荡凭》, 那么地是否也有《地凭》呢? 牟文认为很可能会颁发《地凭》, 只是: 一可能未发现; 二可能是形势的发展而来不及颁发。(《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

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逐渐瓦解, 资本主义因素正在缓慢地发展着。那么,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 到底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重要课题, 过去的研究显得薄弱。近年来有所改观, 展开了争鸣, 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这场革命对已经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概括起来, 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和发展; 一是认为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持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封建制度的束缚, 而太平天国革命及其思想则破坏和打击了封建制度和统治, 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郭毅生在《天朝田亩制度》的

经济背景及其性质》一文指出,《天朝田亩制度》是顺乎历史要求、合乎农民需要而提出的。其平分土地的方案对封建地主所有制予以坚决的否定,因此它将为中国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并为其发育成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历史研究》81.3)王承仁等人在《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一文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要发展社会经济,就必须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地主阶级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实际上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从这个基本点来说,它绝不是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相容,而是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所必须。(《江汉论坛》82.9)王明勋在《评〈资政新篇〉的若干经济思想》一文中,在回答《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所以能颁布的原因时指出:一,前者要摧毁的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后者是要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两者在反对封建制度上是一致的;二,前者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摧毁和平分土地,其发展前途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脱束缚,与后者所企求的显然有共同之处。(《吉大学学报》82.1)黄澄河等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与洋务运动的兴起》一文中,还从洋务运动的兴起来探讨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引起社会的巨变,逼使清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用西学、办洋务军用工业等应变措施。于是,洋务运动出现了,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华东师大学报》82.5)

持此论的第二个论据是太平天国革命造就了大批自耕农和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的温床。前引郭毅生的文章指出,从《天朝田亩制度》对农村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分配方法看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平均分配,也就是分田到户,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这样,“田皆天王之田”实际上变成了个体小农的“永业田”,仍然是变相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解除封建束缚的条件下,小农经济随时随地都会滋长资本主义。

持此论的第三个依据是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来证实太平天国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刘耀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一文中,讲的虽然是太平天国革命后的情况,但实际上是太平天国革命带来的结果。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长江中下游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自耕农增多,而且不

断分化,一部分成为富农和富裕农民,一部分成为游民、雇农和佃农。前者资金多,生产规模大,有更多的农产品流入市场,也能够较多地购买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商品市场;后者一部分人涌入城市,成为现代工人的后备军。此外,自耕农增多和变化的结果,有利于冲击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形式,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变化是永佃制的发展和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如使江浙两省棉花、蚕桑、茶叶等专业种植发展更为迅速和广泛,因而又带动丝织业和缫丝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进一步发展起来。(《历史研究》82.3)姜秉正在《洪仁玕“新政”产生的历史根据》一文认为,江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并未因革命战争而遭到破坏;相反,却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指出,太平天国占领江南后,丝茶出口不断增加;退出后,丝的出口几乎下降一半。既然太平天国占领区比清朝统治区的商品经济繁荣,那么它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也就充分有利得多。(《西北大学学报》80.1)吴智园在《太平天国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吗》一文中,则以太平天国控制的上海贸易的情况来阐述这个问题,指出,1853年,上海出口额达2582万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80.7%,其中来自江南地区的丝茶两项就占98.8%;进口额达2300万元,占全国的51.7%。上海取代广州成为首位。以后每年均大幅度增长。文章还分析了太平天国的贸易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从全国来看,1862年比1850年进、出口额增长分别为一倍和二倍,其中来自太平天国占领区的丝、茶占出口绝大部分。所以文章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不是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学术论坛》82.3)

持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论的依据主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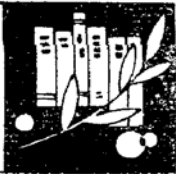
一,作为资本主义温床的小农经济必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但太平天国实行平均主义,其造就的小农经济并不是以私有制作为基础。对这一点,谢方正正在《〈天朝田亩制度〉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证,指出,《天朝田亩制度》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既不象原始公社的公有经济,也不象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更不是农业社会主义经济;它既消灭地主私有制,也消灭小生产者私有制,形成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全归国有。小农经济

被消灭了。这就彻底铲除了资本主义温床的根基，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必然不能孕育出来。（《江西大学学报》82.4）王戎笙在《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一文中认为，太平天国实行平均主义，其理想是把整个世界改造成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他们在破坏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也破坏了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其结果，取消了社会分工，破坏了商品经济，最终也就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两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83年）

二，太平天国革命及其思想强化了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进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刘其发在《论洪秀全经济思想》一文中认为，自然经济是排斥商品经济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瓦解自然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从当时的中国情况看，自然经济在加速瓦解，资本主义萌芽在加速成长，太平天国占领的江南一带尤其如此。但《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社会却是要在维护和稳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建造一个平等的乐园，使自然经济固定化。这就必然要破坏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必然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湖北财经学院学报》81.1）茅家琦在《有关太平天国失败原因和历史作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不否认长江中下游地区自耕农的大量增加。但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就使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得到加强，从而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此外，有人认为，发生在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它具有时代的特点；其经济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的集合体，有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

的；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着。所以不能把太平天国经济思想看成是单一的和固定不变的。刘其发在《论洪秀全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就指出了洪秀全的经济思想包含着上述几种因素，并且显示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843—1847年，以三篇《原道》为标志，开始孕育产生了经济平等思想；1851—1853年，以《天朝田亩制度》为标志，是其经济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并加以理论化的时期；1854年以后，以“照旧完粮纳税”政策为标志，是其经济思想从空想到比较适应现实需要的时期；1859年，以批准《资政新篇》为标志，其经济思想增加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湖北财经学院学报》81.1）同样，整个太平天国的经济思想体系，它的构成和发展，也应作如是观。张家骥在《略论太平天国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归纳出太平天国的三种社会经济方案：以《天朝田亩制度》为代表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以“除暴安良”、“士农工商各安常业”、“照旧交粮纳税”为内容的进行某些改革的、但基本上承认封建制度的方案；以《资政新篇》为代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三种方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错综复杂，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前期，为了动员广大农民参加起义，只有实行第一种方案，平均主义的经济思想强烈；但这一方案不能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定都后社会问题纷至沓来，因而转而采取第二种方案，封建主义经济思想突出；后期提出的第三种方案虽不能实施，但说明太平天国经济思想已开始渗入了新的因素，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这种复杂的经济思想则是由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位和中国近代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湖北财经学院学报》83.3）



一部有新见的外贸史论著

——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袁耀文

对外贸易史可以说是一门“边缘”学科。过去，学术界对之重视不够。最近，沈光耀著《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的问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

沈著以国内部分为经，以国别地区为纬，按照时空序列，谋章布局，自成一体。作者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对学术界中流行的许多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在历史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一）关于闭关自守是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传统问题。

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闭关自守的。沈著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实际是，中国自秦汉直至鸦片战争二千多年的漫长年代里，只在明代中期以及清代初期有过数度禁海，但也只是一种短暂的政策措施。明中期因“倭害”曾宣布禁海，但未见其利却先见其害。清初顺治下诏禁海：凡有船只私自下海，不论军民，一律奏闻处斩，货物入官。对此，马克思就曾指出，清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动因，是害怕中国人同外国人来往而危害其政权。据此，沈著认为：“闭关锁国是一个政策概念，并非一种社会经济规律。”（《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第2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闭关并

不是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特征，更不是中国历史的传统。

沈著提出，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看，对外开放才是历史的传统。自秦汉始，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发展和上升时期，拥有当时世界上高水平的生产力和国防力量。为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便采取了开放政策。如果说，两汉是准备时期，那么，到唐代是明确实行开放，并为确保这种开放而建立了相应的体制。之后长达千多年的市舶制度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隋唐宋元诸朝，不知闭关锁海为何物。这项进步的决策，经过几个朝代的相沿而成为历史传统。

作者专门论述了广州。认为广州是唐以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地区，也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城市。中国历史上的市舶制度，首先在广州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关也是设在广州。它是中国最早通向世界的大门，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

沈著指出：“开放政策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在各个历史时期则有所不同。”（第69页）我国古代开放政策概括起来有七个方面：（1）旨在通好，广泛交往；（2）招徕外商，发展贸易；（3）中国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而在国际流通；（4）立法保护外商的合

法权益；（5）提供定居方便；（6）尊重外国侨民的风俗习惯；（7）加强法治，打击贪冒。正是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开创了东及日本，西通罗马，南抵南洋、印度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北尽漠北的格局；中国的古代对外贸易，早期就形成了水陆贯通、万里相达的国际商道，地区之广，为世界所少见。

（二）关于古代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问题。

史学界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宗法关系为纲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对外贸易微不足道。沈著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的论述，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得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发达的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的结论。他提出，自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历来有轻商的观念，这不能说不是造成中国后来落后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意义非常重大，它对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对中国南部地区的开发和古代港口的形成，对丝绸、陶瓷、漆器三大手工业的发展，对陆海商道的开拓和形成，对船舶、罗盘、天文、航海、地理、海洋等学科的发展，对中外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对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产生，以及对扩大中国人的视野和中华民族的世界影响，都起了明显的作用。沈著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具体生动，材料丰富，把历史知识和历史启示熔于一炉。

有的史学家在谈到元代的对外贸易时说：“中国拿有用的物品和货币换取奢侈品，这种贸易自然是不上算的。”（第29页）沈著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交换的前提是彼此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也不能把商品的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相混淆。中国以丝绸、陶瓷、漆器、土特产、工艺品等为主要出口商品，换回了香料、药物、象牙、珠宝、木材、琉璃、珍禽异兽等物，对丰富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作用。中国把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带给了世界，促使资本曙光时代的早日到来；又将三大传统手工艺品带给了世界，丰

富了世界文明的宝库。与此同时，中国也引进了棉花、蔗糖、烟草、花生、玉米、蕃薯等重要经济作物。中国古无棉花，唐宋时期棉布还属于进口的珍品，到了明代已经遍及各地，“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从此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丝麻葛褐的局面，人民至今受益。所谓“不上算”之说自然就不成立了。

为了论述中国古代的开放、通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沈著在写作方法上也作了新探索，采用了比较法。沈著对比宋明两朝：宋代虽弱，但建炎南渡竟能“隔江犹唱后庭花”，支撑了一百五十多年；明代虽强，但朱元璋的子孙却被金人后代清人所击灭。为什么有南宋半壁而无南明残局呢？沈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明末已将唐宋以来对外开放政策和市舶贸易制度破坏了。南宋有市舶之利，因而有金宋对峙；南明失市舶之利，经济衰落，人心不稳，故经年即亡。沈著的结论是：“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同的结果，对政权的存亡和消亡也起了不同的作用。”“政治腐败固然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然而，明代后期的闭关主义的对外贸易政策也是导致它加快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个原因历来不为史学家所重视罢了。”（第44页）

沈著认为，开海通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社会效益是很显著的。如中国五代十国时，据闽的王审知政权，据粤的南汉刘宸政权，据吴越的钱鏐政权，这些地方政权所以能支撑一个时期，均与他们奉行开拓海市、以助国利的政策密切相关。王审知开拓甘棠港，钱鏐自称靠“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也就是开海通商贸易之利。清代所见的利弊就更明显。清初国内战事刚结束，经济衰落，民生凋敝，顺治宣布禁海，犹如穷汉再遭病魔；但后来政策一开，社会经济面貌也就随之变化。史称康熙开海贸易初年，清政府全部库银不过一千万两，二十年后却猛增到五千万两，所谓康熙“盛世”主要也是开海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由此，著者得出结论：“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是以采取闭关主义、停止开放政策为起点的。”（第90页）“闭关只能加快封建政权的腐朽进程，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必然导致落后、挨打。”（第92页）这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而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关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起始和分期问题。

沈著认为，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是由秦代初创，汉代正规化。这就是说，他持“始于秦而兴于汉”说，而不同意“始于张骞通西域”说。著者认为，汉代既有丝绸之路的陆上贸易，又有从广东徐闻出海的水道贸易。陆道为主，兼行海市。水上贸易实行官私并营，私商经政府批准凭许可证（“符传”）出海。汉初已设有管辖对外贸易的专职机构：大鸿胪寺掌管外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事机构。汉政府还提倡“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这标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对外贸易走上了历史轨道。

对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的分期问题，沈著认为，我国古代对外贸易是一种主权地位的对外贸易，它经历过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同封建社会的演变相一致。可以具体划分为几个阶段：秦汉时期为开拓阶段；隋唐时期为繁荣阶段；宋元时期为沿续发展阶段；明代为兴衰转折阶段；清代为开禁反复和闭关主义阶段。可见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划分法。

沈著提出历时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代贸易具有两个传统：一是文明贸易，中国历来奉行平等互利政策；二是直接由国家统制和指导，以国家贸易为主，外贸是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外交。这两个传统在各个阶段都体现出来。这个说法显然也很有见地。

（四）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机问题。

这是史学界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中国自唐宋以来，其实力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元明两代也是如此。明代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由二万七千多人、六十多艘海船组成，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远洋船队。它满载着友谊和货物，在印度洋上航行了十万余里，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章。但是，为什么郑和船队未能带来资本的曙光，却被禁锢在荒滩野地变成了一堆朽木？为什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同世界潮流同步？史学家常常把它归结为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疑难毕竟还没有解答。

沈著从国际贸易史的角度，以中外历史背景作比较，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失去了三次转机的见解；认为由于三次转机尽失，就导致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宋元之际的海外贸易未能象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那样给封建社会带来新的生机，使中国失

去了“继续作为世界强国的第一次历史转折”。（见第58页）这是第一次。

从明初郑和船队的远航直到太平洋丝路贸易时期，形势本来很好。但是由于明朝封建顽固集团采取了高压统治又使中国滑入了一条“由强转弱的叉道，失去了我国在历史上可以振兴的早期努力。”（见第33、40页）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指的是从清初康熙开海设四个关口贸易到乾隆改为只留广州单口贸易。这个时期，世界已充满资本的气息，乾隆的限制贸易政策“把封建社会中的最后一束火把消失在沉沉的黑夜之中”，使中国失去了在鸦片战争前的最后转机。（见第317页）

沈著认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教训很多，“不能仅仅从封建统治的一般道理来解释，应当把视野放到世界范围内，要紧密切联系当时的世界发展势态来深入考察统治者的经济思想及其施行的经济政策。”（第367页）沈著认为，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西方的意大利、尼德兰、英国、德国和东方的中国发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始于宋代的手工业工场，不过它象试管里的婴儿，极其缓慢地生长，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又竭力把他们所视为的一切异端扼杀在摇篮之中。明后期的闭关锁海，破坏了唐宋以来推行的开放政策，使国内孕育着的新的生产方式因素得不到顺利的发展。清代乾隆期间，中国的经济形态虽已落后于西欧，但国内也已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但封建统治者既不采取适合世界潮流的改革，又唱“天朝无所不有，原不与外夷通商”的高调，实行单口限制贸易和封建行商制度。天朝的贸易政策抵挡不住资本自由贸易政策，结果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天朝的大门，自主的对外开放终止了，换来的却是殖民主义的门户开放。这个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

（五）沈著对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演变，对中国传统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演变，对中国历史上主要港口的形成和变迁，对陆海国际商道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对中国与世界各国早期的经济贸易关系等，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且努力使这面历史镜子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提供借鉴。

在文风上，沈著也一反常规，做到史论结合，夹叙夹议，使见解和感情融合为一。并采用比较法，以佐其论。整部著作生动有神，可读性极高。



广东税务学会召开税收理论座谈会

广东税务学会于1985年10月召开“税收理论座谈会”。会议由税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磊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税收理论讨论会精神，并就当前税收理论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一、关于税收经济杠杆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杠杆的主要形式之一的税收杠杆，在调节经济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表现在：第一，税收是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工具，在经济利益上与纳税人直接联系在一起，通过征与不征，多征与少征，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宏观经济决策的要求，通过奖限政策，引导纳税人生产、投资和经营形式的方向；第二，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使它在调节经济方面更具有有效性；第三，税收通过收入分配联系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作用范围广，能够区别对待，副作用小。税收与价格、信贷等其它经济杠杆的不同在于税收主要是调节国家与企业或个人的分配关系，价格主要是调节商品供求关系，信贷主要是解决资金供求关系，工资主要是反映按劳分配的关系，各种经济杠杆虽有一定的联系，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但不能相互取代。

二、关于运用税收经济杠杆的原则和方式。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宏观调节与微观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及时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同其他经济杠杆密切配合的原则。方式：通过设置税种，规定税收的调节领域；通过设计税目，规定各种调节的具体范围；通过设置税率，规定各税调节深度；通过实施税收减免和加成征收，调整调节幅度，使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来适应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客观经济状况的需要。

三、当前运用税收经济杠杆中存在的问题。现行税制还不能适应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的需要，如偏重于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对正确处理国家与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重视不够；偏重于小型企业的放宽搞活，对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重视不够；偏重于对特定行为的调节，而对一些带长期性、普遍性的税收制度建设重视不够，涉外税收制度还不够健全等等；在某些场合存在着税收杠杆运用不当的问题；减免税这一特殊调节手段没有得到合理的运用。

要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还急需解决以下问题：①完善立法，严格做到以法治税，不仅各税种要正式立法，还要建立征收管理法，健全税收司法程序，用法律保障税收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②改革税务机构，从组织上保证税务系统的执法权不受各级行政干预，使税务部门真正能够代表国家的利益履行征税的职责；③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划分税种的财政管理体制；④改革税收管理体制，既保证集中统一又给地方适当的权限；⑤加强税收理论的研究，建立新的税收理论体系，以有力地指导实践，推动税收业务工作的开展。

会议就如何完善税制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同志认为，从收入获税有利于经济发展，改变产品税征税不合理，滞销品、废品也上税的状况，减轻企业负担，调动积极性方面考虑，并根据目前我国干部素质不高，多税种对企业及税务管理不便的情况，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所得税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强人民对国家的观念；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的财政关系，使我们的财政进入依法治理的轨道；有利于确定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真正使企业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也有同志认为，税制的改革应逐步进行，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一定的税制，就不要轻易改变，只有通过逐步增加或减少税种和税率，逐步形成新的税制。同时，讨论还谈到，办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税制不特，特区“特”不起来；地方税的建立应有地方立法权和使用权；应建立完善的法制，保障税制、税政和税务管理，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年年搞税务检查的局面。

（李小明）



广东图书馆学会召开图书馆改革专题讨论会

最近，广东图书馆学会在广州市图书馆举行图书馆改革专题讨论会。在会上交流了各图书馆改革的情况和信息；研究并探讨了改革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和在改革当中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改革图书馆的管理体制问题。与会者认为，社会上轻视图书馆、轻视图书馆工作者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不高，管理和水平、仍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整个图书馆事业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仍未从根本上扭转。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图书馆在体制上存在着种种弊端。除了条条块块分割、管理部门对其下属图书馆管得过多过死以及劳动人事制度上吃“大锅饭”等外，最主要的还是长期以来把图书馆当成一个行政机关或单纯的服务性机构，实施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一）图书馆的领导大部分是由其它部门转来的行政人员，许多没有受过图书馆学的专业训练；（二）图书馆的人员结构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从其它部门调来的行政人员和刚毕业的中学生。在他们当中存在着病残体弱、文化水平偏低等问题。而图书馆所需的受过专门培训、具有各学科专门知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太低。（三）图书馆的劳动人事管理也完全搬用行政机关的做法，调进人员不经任何业务考核，甚至成为安排退休顶职人员和拆迁户等的场所。（四）在业务方面只强调服务性，而忽视了其它方面，如怎样开拓智力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加强情报传递、图书馆学理论与情报学理论的研究、情报调研、读者分析与研究、参考咨询等工作。与会者一致认为，用行政手段管理图书馆，越来越与图书馆所具有的基本属性——社会性、学术性和服务性不相适应，阻碍了图书馆多种职能的发挥，应予以改革。

二、如何认识在改革当中遇到的各种概念和理论问题。关于图书馆的性质问题，与会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改变对图书馆传统观念的认识。现代的图书馆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事业单位，而应该是一座信息库，是社会文化、知识传播的中心。图书馆的传统职能应有所发展。它不仅仅是书刊文献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的文化机构，而应该是智力资源开发的知识产业。关于图书馆的有偿服务问题。实行有偿服务会不会改变图书馆的性质？对此，广州医药工业研究所技术情报资料室的同志介绍了他们在开展有偿服务时及时有效地向有关实际部门提供了最新科技情报资料，使这些工厂新的产品不断问世，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经验。与会者认为这种有偿服务，实际上是图书馆在参与社会生产力的创造活动中所应得的劳动价值的合理份额，因而是合理的，所以图书馆应该而且可以同时存在两种服务方式，即有偿服务和无偿的服务。

三、对目前图书馆改革提出三点意见。（一）与会者认为，目前图书馆的工作效益不高。究其原因，在于管理水平不高，在于人力物力的浪费。图书分编工作，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方式。图书馆之间各自为政，搞重复劳动，浪费很大。建议以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牵头，在高教局的领导下争取几个编制和一定经费，逐步办成图书编目中心。（二）关于现代化设备的引进和利用问题。大家认为，引进一些新设备，如缩微设备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引进前，要做好调查研究，要从广州市的实际需要出发，各馆之间互通信息，以免过多引进，造成浪费。还要做好各图书馆之间的协调工作，使各馆引进的设备得到充分利用。（三）关于人才问题。大家认为，目前图书馆界一方面是人才缺乏，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现有人才的潜力又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建议采用馆际互借和人才交流等形式。以加强协作，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

（张德馨）



我国首次社会学国际会议论点综述

我国首次“社会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国际研讨会”，近期在中山大学结束。来自我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以及美、日、西德等国社会学学者与社会工作者共四十五人，就社会学应用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讨论，所涉及的中心内容大至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人口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影响生育率的升降，既有政策问题，也有社会条件与社会环境问题。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社会环境与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生育率上是相辅相成的，人口政策的伸缩应充分以社会条件为依据。

二、老年问题。我国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的变化，必将引出老年问题；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干部终身制的废除，使老年人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林南教授建议，应把权力结构变化与职业结构变化分开，要研究老年问题对职业结构的影响。会议认为，中国的老人问题的产生，与世界各国的人口老化有所不同。中国老年人的保障问题可以吸取西方的经验，但不可照搬，而与中国传统结合，形成更好的保障制度。朱传一教授还就形成农村老人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建议，得到与会者的重视。

三、社会福利问题。应用社会学工作者指出，把理论与工作结合，是社会学应用的一大途径；政府组织与社会力量结合，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法。会议还具体讨论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贫困线的划分问题。会议一致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社会福利方面的具体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四、工业管理问题。日本学者介绍了工业社会学在日本管理中的运用情况，指出日本社会学者协助政府把美国实用方法与日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企业中建立了富有日本特色的管理制度。中大青年教师李华介绍了他应用组织管理理论对深圳特区的合资企业作了方案研究的情况。会议提出，中国引进管理方式时应考虑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适应问题。会议还探讨了经济效益与管理效能之间的不协调状况。

五、城镇发展与城市化问题。会议讨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重点在小城镇。在小城镇研究上，有的学者提出了与费孝通先生不同的观点，认为有些地区的小城镇在六十、七十年代是呈缓慢发展状态，而不是停滞，并对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作了新的估计。李梦白教授认为，城市的现代化标准不应只考虑经济因素，还应从社会、管理、心理、文化等方面考虑。会议认为，都市化的标准应该是综合的，不宜只注意人口因素。关于城镇建设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了适当控制建制镇，大力发展现有农村集镇的观点。香港学者刘创楚先生提出的卫星城镇建设中要注意中期评估的见解，受到与会者的赞赏。会议还进行了都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六、西北开发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西北开发，首先要合理使用现有的人才，在此基础上弄清西北开发对人才类型的需求，进行有计划地引进。西北开发对人才的吸引，在于自由流动。西北要造就吸引人才的引力，西北开放，西北为人才提供优于内地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机会。有的学者指出，西北开发要充分借鉴美国的西部开发、苏联西伯利亚开发的经验与教训。

七、社会指标与评价研究问题。林南教授对社会指标作了具体分类，指出一个社会在制定社会目标时，一定要弄清，有些社会指标为世界共有，有些指标为特定社会特有；有些指标与资源相关，有些指标与社会关系相连；有些指标是客观的、物质的，有些指标是主观的。不能顾此失彼。社会目标的确定一定要与提高大众生活素质联系起来。社会学家应参与规划，帮助政府将把握宏观指标与微观指标，把握远程目标与近程目标联系起来。美国学者坎贝尔认为，社会学应对政策进行评价研究，并展示了评价研究的一些方法。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学有向政府作出实际建议的责任。美国学者陈郁立教授认为，在理论之岸与行动之岸之间应架起桥梁。与会者认为，中国有社会学应用的传统。在改革过程中，在现代化道路上，社会学表现了极强的应用性。今后要注意的是，研究工作不但要围绕政策进行，还要有长远的目标，即追踪社会变迁的趋势、预测社会、规划社会。这样，才能使社会学应用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李万寿 李华)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总第七十四期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 51002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 46-64

国内定价: 每册0.50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095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